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2017年第2期

总第三期



#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 通讯

2017年第2期 总第三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 期：总第三期（2017年2月—2017年4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 辑：孟繁之 陈天传

特邀编审：管琴

编 务：陈天传 关雪 崔璨

摄 影：刘学红 郭求达 高曼士 等

装帧设计：王瑾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 目录

## 01 文研学术

### (一) 北大文研讲座

- [25] 荣新江 | 欧亚大陆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荣新江 |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 02 04
- [26] 米歇尔·赞克 | 中世纪行吟诗人——诗歌与爱情的诞生 07
- [27] 沈语冰 | 塞尚、科学话语与早期电影——论1890年代的绘画与视觉机制 14
- [28] 季哈诺夫 | 建构世界文学——英国的个案 17
- [29] 傅申 | 书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  
傅申 | 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附论书法鉴定问题 21 24
- [30] 艾朗诺 | 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 26
- [31] 约翰·贝恩斯 | 古埃及秘传知识、等级与仪式  
约翰·贝恩斯 | 托勒密时期的身份表达：以女性传记为主的考察 30 32
- [32] 格雷厄姆·默多克 | 再会马克思 35
- [33] 王铭铭 | 莫斯论文明——兼及对中国研究的启发 38
- (二) 未名学者讲座 41
- [13] 咎涛 | 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民族主义的一个视角 41
- [14] 贾妍 | 帝国图景——亚述浮雕的时空叙述与仪式表达 45
- [15] 张剑葳 | 栖于高山之巅——中国古代的山居形态 47

- [16] 王娟 | 国族建设中的“边疆”——近代康巴藏区的政治整合 50
- [17] 孟庆楠 | 儒学视域中的经典塑造——《诗经》中的心性与教化 53
- [18] 萨尔吉 | 藏译佛典集成史——文本、问题和方法 56
- (三) 北大文研论坛 59
- [19] 刘守英 | 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 59
- [20] 李孝聪 | 下鞍进房——游牧民族在中国城市规划上的贡献 62
- [21] 侯旭东 & 刘后滨 | 汉唐皇帝制度的比较：以皇帝角色与君臣关系为中心 65
- [22] Andrä Wolter | 洪堡理念与德国大学的历史发展 68
- [23] 姚洋 | 理解当代中国——宪法、政党与国家 70
- [24] 艾朗诺 | 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 73
- [25] 傅申 | 书画鉴定通则散论及举例 77
- [26] 陈志远 | 《高僧传》的文本史——兼谈佛教史传文献的性质 80
- [27] 社会底蕴与田野技艺 83
- [28] 沈卫荣 | 从密教中拯救元代宫廷藏传佛教史 87
- [29] 甘怀真 | 册封体制学说的再检讨 91
- (四) 文研汇讲 95
- [01] 许宏 | 三代、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 95
- [02] 童岭 | 贞观年间唐帝国的东亚情报、知识与佚籍——旧钞本《翰苑》注引《高丽记》研究 98

- [03] 高曼士 | 中式基督教风格：中国建筑本土化的主要工具 101
- [04] 陈国球 | 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 105
- [05] 张瀚墨 | 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结合能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早期多幕叙事的例子及其解读 107
- [06] 仇鹿鸣 | 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 110
- [07] 吕博 | 《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世界 112
- [08] 袁一丹 | 沦陷下的表微之学——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 115

## 119 专题会议

- “十九世纪美国的历史遗产”学术研讨会及对话会 120
- 学术论坛 | 唐宋官私目录三题 122
- 学术讲座 | 毕罗：孙过庭生平及其《书谱》——兼论写本与书法 125
- “‘抒情传统’论述的流播与回应”专题学术座谈会 128
- 菊生学术论坛 03 | “政教相维”：近代中国的制度因革与文教转型 134
- 读书会 | 施鲁赫特：马克斯·韦伯经典文献读书会 136

## 139 静园学术

- 文研读书 140
- [01] 洪子诚教授新著《材料与注释》研讨会 140

## 静园雅集

- [07] 韦力 | 清代版本琐谈 147
- [08] 刘昂 | 明清民国时代的文人歌唱——正本清源话昆曲 151
- [09] 颜榴 | 贝克特的目光——后现代戏剧漫谈 154
- [10] 杨浪 | 地图的发现 159

## 163 专题展览

- “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 164

## 169 文研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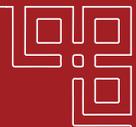
- 文研院举行2017年春季邀请学者欢迎会 170
-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艾朗诺教授访问北大文研院 172
- 著名书画理论家傅申教授访问北大文研院 175
- “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开幕仪式隆重举行 177

## 181 文研纪事





文研学术



## （一）北大文研讲座

25

### 荣新江： 欧亚大陆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2017年3月1日晚，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作了题为“欧亚大陆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的讲座，此为新学年首场“北大文研讲座”，拉开了文研院2017年春季学期学术活动的序幕。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担任评议。来自校内外的师生、社会各界人士聆听了讲座，全场座无虚席。

讲座开场，邓小南院长高度评价了荣

新江教授在中外关系史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赞其为“真正称得上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荣新江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教授著作等身，代表作有《于阗史丛考》（合著）、《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自1995年以来，主编《唐研究》第1—22卷以及学术论文集多部。荣

教授不仅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敦煌吐鲁番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在隋唐史、长安研究等方面也造诣深厚。

讲座伊始，荣教授预告了将要在3月6日举行的另一场讲座：“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由于下一场讲座将从微观的角度探讨写本时代的“丝绸之路”，故本次讲座拟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论说，从而选取了“欧亚大陆视野下的丝绸之路”这个题目。荣教授称，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持续升温带动了该领域历史研究的热潮。然而自古以来，“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便争议不断，争议点围绕在何谓“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重不重要等问题上。荣教授认为，学术界不要求观点一致，而且最好是不一致，这样才能带动学术的进步。当然，有些争论也出于学者们对“丝绸之路”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极可能与论者本身的知识结构有关。所以，我们很有必要从欧亚大陆的整体历史出发，重新审视、看待“丝绸之路”。

接下来荣教授回顾了这一思路的缘起：1985年，张广达先生在准备国际历史学大会的论文时，强调了欧亚大陆地理环境与中外交通的关系。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重农抑商的倾向，关于“丝绸之路”的汉文记载与其本身的重要性远远不匹配；而且在有限的史料中，也以反面记载居多。这些均凸显了多种材料的重要性。本讲座所要介绍的“丝绸之路”，是“蒙古和平”之前的“丝绸之路”，是还未历经全球化的“丝绸之路”，因此欧亚大陆的视野足以观其全貌。

在欧亚大陆视野下看待“丝绸之路”，需要从长时段出发，看到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结构。按照这样的思路，荣教授将欧亚视野

下的“丝绸之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罗马、帕提亚（安息）、贵霜四大帝国并存时期的“丝绸之路”，第二阶段是中古时期粟特商人垄断下的“丝绸之路”，第三阶段是列国时代的“丝绸之路”。

第一阶段从公元前2世纪持续到公元2世纪。在此阶段，汉、罗马、帕提亚、贵霜四大帝国并存，而且都处于国势的上升期。四大帝国都积极向外扩张，彼此交界，因而建立了联系，使长途贸易成为可能。目前，帕提亚、贵霜留下来的史料较少，处于东西两端的汉和罗马留下了相对丰富的资料。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钱币学等方面看到贵霜人在这条商路上的影响力。

第二阶段持续到公元8世纪中叶。在该时期，四大帝国相继崩溃，原来的商贸秩序受到冲击。来自写本学、图像学的证据表明，粟特人对丝绸之路贸易的重建，居功至伟。目前，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仍有许多工作可做。荣教授多年来追踪粟特人的足迹，现已绘制出“丝绸之路”上粟特商队的贸易路线以及粟特聚落构成的贸易网络。

第三阶段持续到蒙古帝国兴起之前。传统观点认为，这时期由于政权分立，“丝绸之路”没落了。但荣教授通过各种详实的史料，反驳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时期的丝路贸易，具备小国中转贸易的特点，体现出和前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特征。

荣教授最后强调，“丝绸之路”一直存在，不能认为政治对立、政权分立，“丝绸之路”就断了；当然，“丝绸之路”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并不存在一条始终如一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层层推进式的中转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会一路从长安“走”



到罗马，但不会由一个人一路从长安走到罗马。综合以上的论述，他强调，“丝绸之路”的存在对于欧亚大陆各国都是相当重要。

罗新教授在随后的评议中认为，荣教授对“丝绸之路”的三段分法十分新颖，可以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罗教授同时指出，研究“丝绸之路”需要新方向，不能被传统的观点、方法束缚住。在这方面，荣教授对以往受到学界忽视的粟特族群的发掘，很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与会的学者、师生、各界人士争相提问。有学者结合自身对现代商团继承关

系的研究，询问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团是如何完成代际交接的。荣教授表示，目前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详细记录。历史研究面临的一个客观问题，就是材料稀缺。当然，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商团，在进入中原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继承方面的难题。

针对历史研究上不同语言重要性的问题，荣教授强调，不要先入为主地强调某种语言材料的重要性，“胡语”和汉语同等重要。而且，我们不仅要重视文字材料，也要拓展来自考古、图像、钱币等多种类型的材料，它们也同等重要。

针对与会学者就中国在粟特语等“死语言”的研究现状，荣教授表示，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仍需迎头赶上；罗教授则结合国际学界在相关领域研究的现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撰稿：陈焯轩)

## 荣新江：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

3月6日晚，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

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在北京大学二体B102报告厅作了题为“丝绸之路也是

一条‘写本之路’”的讲座。本讲座系3月1日晚荣教授所作“欧亚大陆视野下的丝绸之路”讲座的姊妹篇，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教授段晴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担任评议。

讲座伊始，荣新江教授就选题背景作了简要说明，他表示：在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多种说法中，从未有人提出过“写本之路”的说法。其实，“丝绸之路”是一条“写本之路”。在现代通讯工具出现之前，纸笔就是最便捷的联络工具，在丝绸之路上更是如此。直到民国时期，陈万里在敦煌进行考察时，仍用纸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后来结集为《西行日记》。

简而言之，汉、元时期既是陆上“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代，也是写本最流行的时代。传统观点认为，唐宋印刷术革命之后，刻本即取代写本成为书籍最广泛的传播媒介，其实不然。根据现在的书籍史研究，商品化的书籍直到明代中叶才出现较大规模的雕版印刷；元代以前，写本仍是书籍最重要的物质载体。

当然，此次讲座所论说的写本，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书籍，也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文书。荣教授在此深入探讨了十种类型的写本，它们分别是：申请公验和过所、旅行和商务指南、会话联系簿、记账与记事文书、买卖契约、书信、携带的书籍与药方、僧人和文人的巡礼记录、文人诗草草稿、废纸的再利用等。

首先，荣教授将公验和过所类写本比喻为今天的Passport（通行证）。“公验”的形式比较简单，一般由申请者写上出行的事由，交由长官批准。“过所”则相对

复杂些。在唐代，商人在经过关卡时，需要提交获得入关资格的申请书，这一申请书就是“过所”。重重的边关使得“过所”文书丰富异常，同类文书最后汇集成“案卷”。唐代的律法严格保护丝路旅行者的的人身安全，尤其严防将良民身份非法转移为奴婢的现象。在通关时，主人必须出示买卖奴婢证件；若没有，则需有五位担保人签名。我们可以从一些买卖奴婢市券中看到这类规定的运行。唐帝国对丝路上的人员流动进行严格规范，而“过所”的发放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亚各国也有着类似的制度。

上述的写本类型是就“官府—旅行者”二者关系而言的。若从旅行者自身出发，他们也有一些必备的写本，旅行和商务指南便是如此。唐代僧人在求法的路上，需要旅行指南类写本做向导，《大唐西域记》即是具备此功用的存在。丝路上的语言交流也会成为一大难题。故此，语言类的指南书，如梵语于阆语、于阆语汉语会话练习簿也是必要的。

记账、记事类写本在商人群体中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有抄写马价的记录、突厥人请纸的记录等。而更为人所关注的写本类型恐怕还是契约，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的每一笔买卖，双方都要订立契约。书信更是行之四海。“丝绸之路”上存在有多种语言的书信，包括汉文、回鹘文、粟特文等等。而这些书信的内容，既有商务类的，比如商品如何交易、遗产如何继承；也有专门用于联络的，比如询问旅行目的地的居住问题，等等。

旅行是对旅行者身体的考验，药品是



不可或缺的。在包裹药方的纸上写上药方作用使用说明书，这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同样可以找到例证。旅行往往是漫长而孤独的，需要有各种可供学习或消遣的读物。在敦煌文书中，我们发现了中古僧人出行的形象，僧人的行囊中有各种卷轴装的写本，这类行脚僧形象可能就是日后各种玄奘画像的源头。那时，《心经》、《观音经》一类的经文由于部头短小，会被誊抄以作为旅途的读物。士大夫要读四部之书，《史记》、《汉书》即使在旅途中，也是不可废读的。所以，有的写本正面抄《汉书》，背面抄《史记》。这是一种十分便捷的选择。

旅行的过程也是创作的过程。僧人游访名山圣地时，会留下巡礼记之类的旅行纪闻，比如《慧超传》、《西天路竟》等。而文人在旅行的过程中，也会留下各种各样的诗草。我们知道，文本的形成需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草稿、誊抄、修改、成文。唐代的李贺作诗呕心沥血，出门时随身必

备一个小布袋，用于装载临时形成的诗草。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我们也会发现文人的诗草。这或许可以解释敦煌文书中的许多诗稿和传世的诗颇有差异的原因。

古代的纸是很珍贵的，所以作废的写本往往会被重新利用。我们常常发现，某一写本的正面是官文书，但背面则抄有其他类型的内容。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能看到丝绸之路上的写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废纸的再利用。荣教授最后总结道，“丝绸之路”是一条“写本之路”。它在写本书籍流传的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商人、僧侣、使者、文人在长途旅行中的用纸情况。正因为上述写本的流传，才有了今天作为正本的《大唐西域记》、《经行记》之类的书籍。

孟宪实教授随后进行评议。孟教授认为，本讲的题目可以延伸出三个问题：首先，如何用“写本”复原“丝绸之路”。必然需要利用写本讲述“丝绸之路”上的生动故事，对“丝绸之路”进行立体的复

原。孟教授接下来指出，此前所有对“丝绸之路”进行定义的基本思想，都是把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货物（如丝绸、宝石等）作为代表，所以才有了“丝绸之路”、“宝石之路”等称呼。孟教授随即强调，我们需要厘清两种“丝路”的概念：

一种是在历史的维度上真正发生的“丝路”。那条路上，真正重要的是宝石、丝绸，写本则是不重要的。另一种是研究意义上的“丝路”。写本在其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因为它能呈现出特别立体的“丝路”。综上，孟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不重要的写本，在今天的丝路研究中，恰恰是最重要的。

最后是提问环节。段晴教授首先补充道，在写本时代纸是非常珍贵的。在“胡语”



的材料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对抄经的人会像佛一样恭敬。所以，用抄有陀罗尼的写本作成的护身符，也是一种重要的写本类型。

随后听众提问热烈，荣教授就行脚僧图中主人公携带何种写本、写本在宋代的地位等问题，同与会的学者、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撰稿：陈焯轩）

## 26

### 米歇尔·赞克： 中世纪行吟诗人——诗歌与爱情的诞生

2017年3月18日，“北大文研讲座” 第二十六期在北大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

厅举行。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米歇尔·赞克教授（Michel Zink）作了题为“中世纪行吟诗人——诗歌与爱情的诞生”的演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主持讲座，远东学院代表杜杰庸先生（Guillaume Dutournier）致辞，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致欢迎辞，北京大学法语系周莽副教授担任翻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法语系秦海鹰教授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者，希望赞克教授在不远的将来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来到文研院。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杜杰庸先生在致辞中表示，非常荣幸邀请到赞克教授来北京讲学，他称赞赞克先生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之一。中世纪是法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中世纪的法国文人首次开始脱离拉丁语的影响，并使用法语从事文学写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世纪的法语和现代的法语区别很大，一般人只能通过翻译和研究者的阐释才能充分理解文本。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中世纪的负面评价也增加了现代人对中世纪的隔阂，但正因为这种隔阂，中世纪文学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被重新发现。例如在浪漫主义时期，它就成为浪漫派进行创作的源泉。杜杰庸先生称赞赞克教授是发现中世纪文学的不可估量价值的学者之一，他对中世纪文学的研究总能给人以很大启发。杜杰庸先生还称赞赞克教授不仅醉心学术，而且是一个有趣的人，很善于讲故事，课堂也总能吸引很多听众。最后，杜杰庸先生分

董强教授开场致辞称，赞克先生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中世纪文化专家之一，荣膺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公学院中世纪席位，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终身秘书长。董教授感谢远东学院对本次讲座的大力支持，并感谢文研院为本次讲座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支撑与交流场所，同时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中国诸位杰出学者参与对话。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作了开场讲话。他代表文研院邓小南院长和北大师生向赞克教授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敬意，盛赞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是崇高的学术殿堂，大师们的作品为人们照亮了远久的历史星空。他们为我们呈现的中世纪图景使得现代人能够不仅用当下的方式来理解生活，还能欣赏到人类历史的完整图景。渠教授也介绍道，北京大学在中国现代史变迁中再造传统，以学术担当天下，为中国学术汇入世界潮流起到很大作用。渠教授表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集聚海内外学

享了一个近来的趣事：前几天他陪赞克教授在老胡同散步的时候，教授突然兴致大发，朗诵了一大段中世纪的诗歌，把北京胡同变成了现代游吟的场所。

在正式演讲之前，赞克教授表达了他深受触动的欣喜之情：北京大学是一座久负盛名的校园，更是一座颇为契合他内心的校园，因为北大给予人文学科研究如此重要的位置，并如此重视法国研究——毕竟与中国相比，法国只是一个很小的、遥远的国度；他也为自己受到如此的盛意而深感触动，觉得是自己这样一个谦卑的人所不配得的；他为法语系主任、文研院副院长所对他致以的溢美之词，为杜杰庸先生对他详尽而细致的介绍，为广大师生的热忱欢迎深感触动。与此同时，就个人的经历而言，他也很激动——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北京。他第一次来京时才20岁，那是1965年的夏天。

赞克教授继而开启了演讲的主题：中世纪的诗歌与爱情。赞克教授称，这个主题似乎显得有些荒诞——恐怕很少有人觉得，中世纪是一个出产诗歌与爱情的时代。但他所希望呈现的，恰恰在于中世纪是欧洲文明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中世纪出现了语言的革新，早已存在的日耳曼语经过拉丁化出现了书写文字，拉丁语进一步演变形成新的罗曼语；中世纪也是变革、延续古典文明的时代，而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正是欧洲文明的根基；最令他感兴趣的，正是在中世纪——确切地说是11世纪末12世纪初——出现了最早的由欧洲现代语

言所写就、并得到完整保存的诗歌。

赞克教授进而阐述了这一诞生于中世纪的诗歌之所以值得重视的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这一诗歌的独特性在于，在拉丁语依旧通行的中世纪，它不是用拉丁语写就的，而是由最古老的欧洲现代语言写就、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诗歌；其次，这一诗歌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所给予爱情的位置、赋予爱情的特质，及其内含的诗歌与爱情的关系，这是最为核心的一点，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世纪的文学，还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文明，甚至我们今天的生活；最后，这一诗歌是抒情的、用来吟唱的，而非叙事性的。虽则如此，它却通过对诗歌的传播与阐释，以诗歌或诗人为主题所创作的故事，将其传诵并写就于手稿当中，从而激发了叙事的兴起，并促使我们不断思考两个看似相悖的主题，亦即诗歌与叙事之间的关系——诗歌并非为了叙事，却激发了叙事的兴起。

赞克教授简要地阐述了第一点，即如何理解这是最古老的、用欧洲现代语言写就、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诗歌。在罗马帝国的不同区域，各个民族的口音是不同的，拉丁语的口语从而分化为不同的版本。8世纪末，罗曼语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来，并被视为与古典拉丁语不同的语言。罗曼语文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但稍晚一些。人们不仅需要这种语言的存在，还需要用这种语言开始书写，毕竟一直以来，拉丁语是唯一的书面语言。至于日耳曼语，虽然它早已存在，但直至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

时期，人们采用拉丁文的字母系统来记录日耳曼语，这才出现了日耳曼语的书面文字，亦因此出现了日耳曼文学的记录。我们所知的西欧文学记载之所以相对迟一些才出现，是因为在此之前，文学语言与书面语言都是拉丁文。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新出现的语言很快就演变为书面语言或文化语言。之所以说是令人惊讶的，主要出自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整个中世纪，拉丁语仍在知识界、学院、大学与教会礼拜当中通行使用，新的文学语言也不断地参引拉丁语。新语言虽仿效拉丁文学，却奇妙地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其次，拉丁语是教会的语言，教会没有兴趣推行、甚而谴责民众使用俗语传唱歌舞、讲述故事，认为其中渗透着与基督教相悖的异教迷信。但与此同时，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在掌握拉丁文读写的同时，也需要援用民众的俗语，以使教义被民众理解与接受。因此，最早用这种语言写就的诗歌是宗教诗歌亦或誓约。最有趣的转折时刻，出现在被基督教所笼罩的中世纪，人们开始用这种语言写作与宗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诗歌或故事。11世纪末，在南北方都出现了用新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北方出现了由奥依语（langued’oil）创作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南方则出现了由奥克语（langue d’oc）创作的抒情诗，其作者被称作行吟诗人。在此之前，即可寻觅到由方言创作的诗歌的踪迹，即被教会所谴责的“女性之歌”。“女性之歌”吟诵恋爱中的女性，以一种纯朴、天真、多情、庄重的方式讲述她的爱情，

这种基调在整个中世纪得到存续，行吟诗人进而创设了一种新的表述爱情的形式。

赞克教授由此切入对第二点进行讲述，即行吟诗歌对自身的界定。它所给予爱情的位置、赋予爱情的特质，尤其是包含的诗歌与爱情的关系，成为最为独特的一点：诗歌与爱情紧密相连，甚而将诗歌视为爱情的源泉。对我们而言，诗歌与爱情之间的关联与其说是独特的，不如说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在陷入爱河时作诗再平常不过了。但史实并非如此，中世纪所承继的古典遗产中，希腊罗马文学里占主导地位的题材是史诗与悲剧，爱情题材所占的位置是比较次要的。当然，其中不乏有关爱情的描述，例如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之作《艾雷克与艾尼德》（Erec et Enide）中所讲述的爱情故事。

此外，这一诗歌现象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诞生的。然而基督教在原则上并未赋予人类的爱情、以及因爱而生的激情一个重要的位置，更别说情欲了。因此，这一氛围似乎并不利于吟诵爱情的诗歌的发展；但奇怪地是，它却促进了这一诗歌的兴起。最初，诗歌遭到基督教的贬抑：在古典时期，诗歌是通向神灵的，诗人亦受到诸神——如阿波罗与缪斯——的启示，并被诸神所支配；但在基督教当中，上帝道成肉身，人们能亲眼见到耶稣，聆听其教诲，评注其教谕，这就更需要能够与神直接沟通的诗歌。基督教对于诗歌的贬抑出自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

在圣经缺失的古典时代，诗歌所承载的宗教是错误的，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法文当中，诗人是异教的祭司，诗歌则意味着神话寓言，这内含双重的错误：它讲述的故事是虚构的，与其相关的宗教本身亦是错误的。其次，诗歌的语言过于雅致矫饰，未能直言其事。从词源学上来看，韵文诗句源于旋转曲折，而传教所用的散文则意味着直言其事、直见人心。面对这样的贬抑甚或谴责，为何还要写诗呢？虽然诗歌不能源自古典时代诸神的启示，但它可以源自爱的灵感，爱取代了阿波罗与缪斯。诗的真义在于，人们虽然杜撰虚构故事，但故事的意涵是真的；人们可以用隐喻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但在隐喻之下亦有真的义理。这得到了基督教的宽允，经过这样一番曲折，诗歌的声誉得到恢复，即以爱为灵感的诗歌得到认可。

这种以爱为灵感的诗歌是一种打动人心的诗歌，简单地说，它尝试呈现这样一种理念：爱激起欲望，欲望期待被满足，但同时又害怕被满足，因为欲望在被满足的那一刻也就消失了。这使爱的情感内孕这样一种悖论，抑或一种内在的紧张：令人愉悦，却需忍受痛苦。再不幸的爱情，也有兴奋的一刻；再幸福的爱情，也不可能没有一丝焦虑。而诗歌正是为了吟诵这种痛苦又愉悦的、内蕴悖论与紧张的感情。在奥克语中专门有一个阳性的名词来指称这种痛苦又愉悦的感情，它与法文当中阴性的愉悦（joie）一词是不同的。赞克教授为我们吟诵了一首12世纪初描述这种感情的诗

歌，大意是：我陷入痛苦，为痛苦所折磨，这因爱而生；夜不能寐，梦幻中的夜色，装点这一刻，绝妙的痛苦与愉悦。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体验到最美好的愉悦。

如何在诗歌当中呈现这种内在的悖论呢？如何用诗歌的语言来体现这种痛苦又愉悦的情感呢？对此诗人们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比较寻常普通，即爱的真挚可以促使诗歌臻于完美，最好的爱人，即最好的诗人。一位诗人曾言，如果我吟唱得更美妙，是因为我的心臣服于爱的指令。第二种方式则更艰涩一些。在中世纪有这样一种观念，诗歌的形式应当与其内容相契合，二者之间应当保持某种相似性。赞克教授举了一个比行吟诗歌稍晚一些的例子，13世纪有一位诗人为了描述自己贫穷困窘的悲惨境遇，采用了一种实质上很灵巧、却极为简单的形式来呈现一种怠惰粗糙的表象；为了表述其困窘，他尽其所能地使其诗显得粗陋不堪。同样，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诗人们开始思忖：应当用怎样的形式来呈现这种悖论而紧张的爱的情感呢？于是逐渐发展出一种紧张、有时甚而晦涩的形式来创作诗歌，人们称之为封闭的创作形式，内涵艰奥、内敛、晦涩的意思。

这种艰奥晦涩，一方面与诗人本身内在的悖论性相关：诗人所倾吐的是自己最为隐秘的心事，但与此同时，又感到犹疑，甚而拒斥这种吐露，诗人是腼腆、含蓄而羞涩的；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甚至让许多诗人都无法领会，这是一种紧张、艰涩的形式，伴随诸多复杂的、

跳跃的、不合逻辑的句法，尤其是同时使用考究与简单的词汇（甚至是地方性的词汇），追求某种粗陋的形式，音节不再悦耳。它也有智力上的追求，韵的重复已经不能从听觉上感受到对应，



诗歌在故意制造距离与隔阂。诗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复杂而艰涩的形式，来表达难以言说的、痛苦而愉悦的悖论性情感。这些诗歌往往通过呈现自然来开启。这不难理解，因为爱情本身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与自然是和谐的。但人类的爱情又是紧张的、充满悖论的，因此，它又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与自然关联在一起：春天虽然美好，我却是唯一不幸的人；冬天虽然冷风凛冽、万物凋零，但它依旧是美的，因为坠入爱河的我是如此幸福。这种与自然不协调的关联，同艰奥晦涩的形式彼此混合、相互强化，生动地呈现了这种痛苦又愉悦的情感。

随后，赞克教授阐述了第三点，即抒情的诗歌如何悖论性地激发了叙事的兴起。行吟诗歌兴起于11世纪末，延续至13世纪中期，13世纪末走向衰落。中世纪没有大城市，其社会形态为城堡庄园，诗人们四处吟唱，彼此认识，其写就的诗歌亦相互呼应，并被誊抄于羊皮卷上。13世纪末14世纪初，行吟诗歌开始衰落，

人们搜集整理诗歌的手稿，在此过程中，诗歌之旁，往往附有诗人生平叙事，有的也附上关于诗歌的创作情境的叙事。诗人生平有杜撰的成分，而诗歌的创作情境则几乎是幻想出来的，却也呈现出诗歌创作是如何开启的，也有助于澄清一些仅就诗歌本身似乎无法解释的东西，挖掘出痛苦往往源自对他人欢愉的嫉妒之情。

最后，赞克教授以若弗雷·吕德尔（Jaufré Rudel）的远方之爱作为总结。吕德尔是法国南方布拉伊的王子，出身高贵的他得知地处遥远东方的黎波里有一位美丽的公爵，虽未谋面，却爱上了她，并为她创作了动人的诗歌，饱含美妙的旋律与哀伤的诗句。为了与她相见，吕德尔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不远万里抵达黎波里，却一病不起。女公爵得知王子为她谱写吟唱的诗歌以及为她所做的一切之后，也开始想象“远方的爱”，并与王子相见。吕德尔感谢上帝赐予他这次相遇，然后在她怀中死去。这个故事不仅在中世纪取得极大的成功，也令

后来的浪漫主义者心驰神往，曾被多次援引。

讲座结束后，赞克教授展示了诗集以及诗集中诗人的肖像，奇特之处在于肖像竟是诗人的背影，这意味着诗人是谦卑的，他诗歌中所吟咏的爱是秘密放在心底的。这种谦卑的姿态也是赞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

在随后的互动交流环节中，北大历史系的荣新江教授表示听完讲座后非常受启发。作为研究唐朝历史的学者，他在敦煌的卷子里看到唐人的诗卷，他们也到西北征战，其诗卷一面是书信一面是诗，很像行吟诗人，不过他们思念的不是未曾谋面的佳人，而是家中的妻子。赞克对荣新江教授的分享表示欣喜，他幽默地阐释道，中国人离开时还会想着夫人，而法国人留下爱人就走了。当然也不尽如此，例如一位少女不舍出征的未婚夫，以及卡佩王朝君主圣路易（Saint Louis）的朋友在伴随君主出征时，也表达了不愿回望家乡城堡的恋恋不舍之情。北大法语系的秦海鹰教授留法时曾在图卢兹大学听过赞克教授的课，她的导师是百花诗赛的秘书长，于是询问赞克教授百花诗赛在诗歌发展承继当中的位置。赞克教授回应道，奥克语行吟诗人传统在13世纪就衰落了，但在图卢兹有七位行吟诗人，组成了一个诗会叫“快乐的知识”，他们想要延续诗歌的传统，建立爱情法则与爱情法庭，对男女的情爱故事进行决疑论。这个诗会一直存在，与黎世留建立的学院以及铭文美文学院均有关联。

在董强教授的建议下，赞克教授向听众介绍了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他首先澄清，身为该学院的院士是一种荣誉，而非一个职位。该学院主要负责的研究领域为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考古学等，包括古典希腊罗马的研究，这是学院成立之初最为重要的职能，法国尤为重视这一古典的根基；它还负责研究法国中世纪的历史、文献学与文学，也涵括对东方文化，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埃及等的研究。至于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历史，路易十四与黎世留主教创立法兰西学院以规范法语，约30年后，即1663年，路易十四与科尔贝创立铭文与美文学院，主要研究古典时期、法国王室建筑与奖章上的铭文与名言。法国革命期间取缔了王室设立的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亦未能幸免。1795年，由144名成员组成的法兰西学会成立，由三类组成：数学与物理科学、道德与政治科学、文学与美术，铭文与美文学院属于第三类，拿破仑亦为法兰西学会的成员。复辟王朝时期，又重新恢复了学院，但同时也保存了法兰西学会，铭文与美文学院得以复名，它享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仍与法兰西学会和其他学院保持着复杂的关系。院士们的制服上有绣花和佩剑，当年拿破仑把将军的衣服赐给院士们，这让他们引以为傲。

（撰稿：朱诚达、潘丹）



27

## 沈语冰：塞尚、科学话语与早期电影 ——论 1890 年代的绘画与视觉机制



2017年3月23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沈语冰教授作了题为“塞尚、科学话语与早期电影——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绘画与视觉机制”的演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淞教授担任评议。

沈语冰教授此次讲座主要介绍了他近年来研究法国现代艺术、尤其是塞尚的心

得，展示了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首先，他向大家展示了塞尚晚年的作品——创作于 1900 年前后的《松石图》。他指出，这幅作品融合了现代派绘画强烈的平面性，古典主义严谨的结构感和印象派的笔触。中间石头部分的条带状区域有很强的立体感和清晰的聚焦，而条带前后方则用大量有色彩的笔触构成了所指不太明晰的部分。这种矛盾的存在说明塞尚有着聚焦和模糊的双重视觉，他希望大家对这种创作手法的形成原因进行思考。

随后，沈教授对塞尚创作画风的变化进行了简要总结。1860 到 1872 年，塞尚自学成才，其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的色彩，使用厚重颜料，其强烈色彩和宏大构图为后来表现主义作家所仰慕。之后，他曾短暂师从毕沙罗，受到印象派画家画风影响，并参与了 1874 年的印象派画展。印象派画风的影响使得塞尚画面结构的整体感削弱，他也开始将印象派用色方法与博物馆内注重结构的作品结合起来。1880 到 1890 年间是塞尚画作的成熟期，在这期间他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风格。1890 年后，塞尚的画作走向了带有更强的探索性和实践性的风格，主题愈渐模糊而感情色彩愈加强烈。

沈教授特别针对塞尚晚年的创作母题作了详细分析。塞尚晚年创作了许多风景画，在将风景变为艺术画作时，他对风景做了神奇的转换，但在转换的过程中保持了对风景的感受，即对母题的感受力，这与采用数学公式、排除感受力的立体派有很大区别。沈教授以塞尚晚年以圣维克多山为母题的数幅作品为例，进行具体分析，说明了塞尚画作将山晶体化，将风景简化变形，但仍然保持了画家对母题的感受力的特征——同样是这座山，天气不同，光线不同，因而色彩关系不同，但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画完，画面都呈现出稳健的三等分构图，山顽强地伫立在画面中，结构感和层次始终清晰。母题有时会渐渐隐退，变得抽象，但画面依旧具有视觉的感受力。近景的松叶和远景的山联系在一起，有强烈的张力。沈教授还将其与中国山水画家黄宾虹进行对照，从画家的手稿

速写入手，展现了塞尚画作从大自然中提炼母题，用简单的笔触表现出来的“莫名的生动和喜悦”。

随后，沈教授对塞尚研究的主要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作为塞尚研究的先驱者，罗杰·弗莱（Roger Fry）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主要方法是形式和风格分析，研究纹理，造型等美术史的基本内容。塞尚作品目录的主要制定者雷华德（Rewald）则是采用了传记研究和作品分类目录的方法。法国现象学家、哲学家梅洛·庞蒂所著《塞尚的焦虑》一书是现象学的研究，认为塞尚用婴孩的眼睛看世界，直面事物本身，将其视为现象学派个案，阐释现象学及其还原过程。

从迈耶·夏皮罗开始，塞尚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夏皮罗使用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现代艺术》中有《塞尚的苹果》一篇，揭示了塞尚与印象派的画作的产生与当时法国社会生活、城市体验的变化息息相关，阐释了印象派显著的道德侧面和政治内涵。克拉克（T. J. Clark）则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印象派与法国城市重建计划、娱乐业的变化发展相关。夏皮罗还采用精神分析法，以塞尚画作中的苹果为例，论述素描《帕里斯的裁判》主题有误。塞尚中学时期阅读的拉丁诗歌，描写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苹果与他个人幻想颇有关联。塞尚在其苹果作品多放入爱神形象，与洋葱在气味、形状上进行对比可知，苹果可能象征着爱情，包含与两性相关的内容。

接下来，沈教授介绍了此次讲座的重点——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 视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这位哥伦比亚讲席教授在其著作《观者的技术》中论述了暗箱成像技术如何影响古典绘画, 在《知觉的悬置》中借用弗洛伊德研究, 选择了三位画家, 研究 19 世纪最后三十年视觉艺术的变化, 塞尚正是其中之一。受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 他将现象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在内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对塞尚进行研究, 同时超越了知识考古学, 增加了“视觉”的维度, 通过主要的机械发明与绘画对照, 将 17、18 世纪维米尔与暗箱技术、19 世纪 30 年代库尔贝和立体视镜、70 年代马奈和恺撒全景画、80 年代修拉和雷诺“前”电影, 以及 90 年代塞尚的绘画与早期电影结合起来。他指出, 在摄影和电影发明前, 画家不会意识到绘画的过程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电影的挑战下, 绘画中问题空前凸显。

最后, 回到开篇所展示的塞尚的《松石图》, 沈教授试图解释塞尚绘画中为何会有立体性极强的刻画和松散笔触交融的两种视觉的问题。他指出, 1900 年前后, 哲学、心理学都在讨论人对于外部世界感知的丧失和人对于外部世界的选择所进行的干预。正如弗洛伊德所言, 人对现实的认知已经经过了人的心理的重重修正。此时, 早期电影的发明给予了欧洲人全新的视觉体验。以美国电影《火车大劫案》为例, 电影影像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已没有明显的主客体之分, 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变为双方互动的关系。沈教授指出, 塞尚并未看过早期电影, 但在他 1906 年写给儿子保罗的信中, 已经表达出很多与早期电影观念相似之处, 这使得塞尚作品中有呼

吸, 有吐纳, 有活生生的生命的艺术感。沈教授展示了塞尚在河边的画作, 具体阐释了叶子、波光中的空灵、纯净。他解释说: 一方面, 塞尚依旧保留着由暗箱成像所代表的古典视觉, 对古典绘画的忠诚; 但是也越发受到 20 世纪早期电影等新的视觉机制的影响, 导致了更多的松散的色彩和笔触, 这便是他双重视觉形成的原因。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李淞对演讲作了评议。首先, 李淞老师阐述了对于中国人学习西方艺术史的意义思考。塞尚是自学的, 没有主流文化传统的背景, 因而如现象学所言, 更能直面视觉世界, 这在 20 世纪是受到肯定的, 但与古典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学院派的有色眼镜与他的本能产生了冲突。他不满足于印象派的不确定性和消解了时间的片段性, 因而他在表现不确定性时超越它, 用绘画的语言表现出来。李淞老师赞同了双重视觉的观点, 认为这是塞尚画作中普遍性的问题。他发现, 确定性和模糊性共同构成了塞尚的认知: 稳固、清晰的结构相对是“不动”的, 只是色彩和清晰程度的变化, 而模糊的东西恰巧是在流动空间难以被固定住的、轻的、容易变幻的部分, 这与中国美术中“实”和“虚”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用“实”的方法表现“实”, 用“虚”的手法表现“虚”。

此外, 李教授也传达了几点困惑。他感受到了塞尚作画的迅速, 塞尚的画中也充满了“未完成感”, 作画的程度不尽相同。这之中或许有被迫的因素, 也有主动的可能, 难以界定。接着, 李教授指出, 塞尚画作中, 树干是确定的, 有边线和体

积; 而树叶没有边线和体积。实际上许多画家画树叶是有体积的, 将一大簇树叶分为几面, 这是塞尚绘画笔触的一个不同点。其次, 李教授指出, 沈教授强调了塞尚身处过渡时期, 因而共具古典和现代的因子, 然而稍作推广, 任何画家其实都处于过渡的阶段, 如若这一理论适用于所有画家, 也就失去了理论的价值。

沈教授回应道, 90 年代普遍关心的知觉的不稳定性和人对外部世界的不稳定的感知的问题, 是把塞尚的问题放在了思想史和知识考古学中, 界定塞尚画风的成因; 这其中更多的是解释塞尚画风成因的方法, 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既然每一个画家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过去和当下的问题, 艺术

史领域也还尚未形成相关理论, 或许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同时, 沈教授也肯定了李教授“虚实关系”具有启发性, 并表示这说明了中西美术间有着相互启发和对话的可能。沈教授表示, 19 世纪末三十年间的快速更迭, 不仅是艺术史内部的原因, 也与社会史、西方现代文明的变迁息息相关。敏感细腻的艺术先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 无意中流露出了对时代变迁的直观感受, 因而以美术史为窗口的相关研究, 对 19 世纪文化史乃至一般历史而言, 有着非凡的贡献。

(撰稿: 冯子涵)

## 28

### 季哈诺夫： 建构世界文学——英国的个案

2017 年 4 月 6 日下午,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英国伦敦大学女王学院讲席教授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比较文学系主任季哈诺夫 (Galina Tihanov) 作了主题为“建构世界文学——英国的个案”的报告。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

系张辉教授主持讲座,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秦立彦教授担任评议。

季哈诺夫教授首先介绍了英语世界“世界文学”的相关研究。他指出, 现代有关世界文学的思考始于文学理论发生交替的前夜, 其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仍然盛行而后结构主义方兴未艾。乔治·斯坦纳教授





入了文学“自我反射”的视角，这构成了他对“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阐释。

首先，就时间性而言，在以往的论述中，“世界文学”常被想象为全球化和跨越国家化的产物。然而，季哈诺夫教授认为除了以

面对当时文学翻译的热潮，提出了自己对于“世界文学”研究的关怀：“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巴别塔式的文学作品隔阂，并且当文学将翻译作为自身的核心时，什么领域将发生危机？”在世界文学研究发生之后，学界出现了众多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其中引发季哈诺夫教授注意的是在英国文学研究界流行的自由市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文学是文学作为世界市场之一部分的产物，这一现象促使读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解释下，世界文学便成为了自然而然的力量。然而，季哈诺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将“世界文学”处理为一个随历史变化的建构，对其性质演变历史做出条分缕析的认识，这是首要的问题。在这种思路下也产生了众多对于“世界文学”解释的论述，但大致可以归为讨论其时间性、空间性和语言问题等几种视角。季哈诺夫教授吸收了以上对“世界文学”研究的视角启发，并在时间性、空间性和语言三种视角之外，加

上两种视角之外还应该加入第三种，即把“世界文学”作为前现代国家时期出现的缩减国家间文化差异的现象。弗朗哥·莫雷蒂曾指出，在18世纪早期即出现了国际性的图书市场，由此推动了书籍的快速流通，同时他也发现18世纪也是文学领域出现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时期。他结合演变历程研究和华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理论，提出了自己对18世纪特殊情境的认识。而在莫雷蒂之前，俄罗斯汉学家和日本学家尼古拉·康拉德(Nikolai Konrad)在其研究中，已经提出了有关文学的审美视角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流转的研究。从公元8世纪开始，中国出现了古文运动，之后在伊朗，15世纪在意大利，均出现了“文艺复兴”式的复古运动。晚近时期，发端于欧洲的现实主义思潮也经历了由中东到远东的相反流转过程。这种视角似乎已经为莫雷蒂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准备。不同于前者，哈金森·波斯奈特(Hutchenson Posnett)在其188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已经提

出将“世界文学”作为现代国家文学之前的一个阶段，并将之作为政治形态演变产物的论述。这种观点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二战爆发前后才在中欧文学界有了回应。匈牙利作家米哈利·巴比茨(Mihály Babits)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一书中，同样将“世界文学”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同时认为应将欧洲各国的文学放入到一个以“古希腊—拉丁语”体系构成的语言文学框架中。但他同时也悲观地认为，在一战之后，由于各国独立并创设自己的文学，各国陷入争论，世界文学不复存在。接续巴比茨的研究，匈牙利犹太作家安塔尔·塞尔布(Antal Szerb)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共享性“世界文学”的消亡和国家主义的兴起，但同时又对各国文化的出现抱以乐观的态度。季哈诺夫教授认为以上五位学者的研究个案启发我们在全球化视角之外探讨“世界文学”的历史，从而对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流行的全球化理论提出修正。

其次，有关“世界文学”的研究还涉及“空间性”研究。季哈诺夫教授提出，世界文学包含“世界”和“传播”(circulation)两种暗喻。虽然广受质疑，但是“世界”似乎更近乎于一种描述性的暗喻，相比之下，“传播”另含意味。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视“传播”为一种由自由经济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多语境或去语境情形，但季哈诺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用更加广阔的视野分析这种暗喻。由此，季哈诺夫指出应该通过一种“地区性”(zonality)的视角对英语“世界文学”思考作出修正。“地区性”(zonality)

这一概念，来源于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迪奥尼斯·杜里申(Dionys Durisin)，他认为区域性文学是基于语言亲族关系产生的。季哈诺夫教授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却受此启发，认为区域性传播的宗教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印度、阿拉伯和波斯之间，几个世纪以来就存在着这种交流。而在英语世界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中东欧地区也已经存在有一个以德语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区域。这些发现重新使我们思考“世界文学”包含着众多区域性或历史语境的互动，因此也应该被理解为更为多元的现象。

再次，“世界文学”包括极为重要的“语言”视角。在“世界文学”中，双向语言的定位是焦点问题，由此我们需要讨论翻译及其认同的合法性，而在英语“世界文学”理论以外，也应该追溯现代理论的源头——俄国形式主义。季哈诺夫教授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翻译在有关阅读和分析文学合法性问题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现行理论中流行的有关文学作品是作为一种语言范围内的作品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性”作品之争论来源于古典理论的争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有关文学文本性质的争论中，存在两种对文学文本不同的认识。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其“文学性”只能通过母语才能够表达，但是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艾肯鲍姆(Eikhenbaum)、提尼亚诺夫(Tynianov)等人认为文学性的表达并非只有语言一种媒介，可以通过翻译得以实现。大卫·达姆罗什(Damrosch)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翻

译文本在阅读和分析时具有合法性，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可以在母语和多元的译介语言中得到反映。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是基于多种语言的操作才产生的。他更进一步认为，在文学研究中，语言的社会性相较于语言的生产来说更为重要。这种思考促使我们有信心对英语这样一门世界性语言所引起的“世界文学”进行有价值的研究。

除了以上三个视角之外，在季哈诺夫教授看来，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还应该加入文学的“自我反映”视角。在他看来，文学的自我反思性不能被忽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理论广受重视，其时流行的论述在于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从其艺术伦理主义当中抽离出来，而克里斯蒂娜更用一种具有中立性的装置，试图通过引用、借鉴等方式来重复、转用另外一个文学文本。这种互文性理论应该和世界文学相区别开来，这将有助于我们捕捉到一些不同的现象以重新认识“世界文学”。在这一方面，季哈诺夫教授将相关文学作品个案作为研究探讨的重点。在德语世界中，“世界文学”概念来源于维兰特和施洛泽的创造。1868年，施洛泽提出了包含冰岛文学在内的世界性文学体系，这一体系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只将西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季哈诺夫教授认为，这指出了现代世界文学的基本论调。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小说《强光》中，不乏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嘲讽。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基恩作为一个汉学家、文学家，将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介绍到西方，卡内蒂将这一人物形

容为“没有哪一个人人类文化的分支是他所不知的”。但面对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基恩也没有陷入歌功颂德式的赞赏，而在其思考中蕴含了一整幅世界文学地图。以此为基础，作为学者的基恩可以和其他专家进行对话。然而，对于世界文学所蕴含的人文主义色彩，基恩认为，异文化文学文本的介入，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另外一种文化的大门，从而使读者从自身的道德空间中解脱出来，造成迷惑，这类文本因此成为危险的作品，应该为现代国家所禁止。在小说中，基恩对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批判态度可以充分体现出这种思考。卡内蒂的小说提示我们，“世界文学”内部包含了一种历史的时空构造转换，也可以称为这种转换的一部分，其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力量可以在转换过程当中体现，可以作为转换的辅助品。由此我们可以对世界文学作为全球化副产品的简单论述作出修正和回应。

在讨论环节中，秦立彦教授就提亚诺夫教授对“世界文学”的回顾做出精彩的总结和点评，并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为例，提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走向世界与季哈诺夫教授展开对话，并就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场的其他老师、同学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请教季哈诺夫教授。讲座在热烈和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中结束。

（撰稿：玉书涵）

## 29

### 傅申： 书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



2017年4月7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九期之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傅申作了题为“书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的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并担任评议。

傅申教授是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之前担任台湾大学艺研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等职，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此方面学术权威。

演讲开始，首先，傅申教授提到自中国绘画中心南移之后，书画家的交通便以舟行为主。宋代的米芾即有“书画船”。

明清以降，文人士大夫几乎人人都有私人游船。因而在船上创作、鉴赏书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画船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山水画中“水上山水”风格的形成。现在这些传统即将消失，明代钱穀淮安城外所画的情景，已无法再现。隋唐书画家主要在黄河流域，到了明代，书画家则主要分布在南方。南方书画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书画船。关于书画船的形制，明代版画有所夸张。但中国的书画船历史悠久，也很普遍。如顾恺之的楼船、清明上河图中送别场景的船、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中的各类船只等。还有苏州园林的旱船（在园林水塘中不动的船，以怀念行舟的乐趣）、高士齐的书画船、颐和园昆明湖上的石舫等。西方也有类似的书画船，例如莫奈的作品，



在讲到赵孟頫的《重江叠嶂图》、《吴兴清远图》和《水村图》时，傅申教授指出欣赏作品要多看原作、多看风景，最好能从事创作，只有经历过才懂得欣赏。现代人不容易超过古人，所以要注重创新。李流芳曾作诗：“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一闸走一日，守

闸如守鬼。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坐船走大运河时间较长，文人在船上作诗、写字、画画。明代书画家姚公绶曾书“书于葑门泊舟处”，题跋曰：“舟中赖此能消日，半匹溪藤意趣多。”姚公绶的很多枚印中，“沧江虹月”用了米元章的典故。可见他在舟中也喜欢流连书画诗文。他在一幅作品的最后一行注明“云东逸史坐虹月舟书付仲子旦”，这是写给他第二个儿子的，也就是在这条叫“虹月舟”的船上写的。

以上所述，都是董其昌之前书画船的代表作品。董其昌是松江人，家乡河流纵横，出门就要坐船。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董其昌虽官至高位，但他对做官并不热衷，他有诗云：“余结念泉石，薄于宦情。”他画山水，也喜欢旅游，对山水很有感情。台北故宫有一套早期的董其昌的册页，说他“舟中冥坐，阻风待闸，日长无事”，就想到过去看到的山水

但只是定点画，和我国流动的画不一样，周围也没有山水风景。美国游行时的五月花游船也可算作一例。黄庭坚《戏赠米元章》一诗称：“万里风帆水著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米家书画船”就是从黄庭坚的诗开始的，后人也经常用“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刻图章。苏轼作《赤壁赋》，也是因赤壁之游而起，“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船上的文人活动很多。米芾的儿子米友仁画云山，景致也是坐在船上看到的。手卷好比一个移动的胶卷，画家一面走一面看，这在西洋画里是没有的。再看《落水兰亭》：赵子固舟过升山，风浪漂舟，子固立水中手持兰亭曰：“至宝在此，余物不足关矣。”传为佳话。《兰亭十三跋》里有一段：“廿八日济州南待闸。”大运河的南北水位不一样，一路行来要过闸，一般是等很多船一起到了才放水，就像现在过三峡，有时候要等很久，在船上就只能读书、写字、画画、作诗。

来画。最后的题跋又写道：“阻风长日作画数帧。”船遇风浪临时停靠，又无访客，因而长日作画。《夜村图》上则写得很清楚：“戊午八月十一日昆山道中写。”意思是他在昆山道中绘了一套山水册页。另一册页中写有“乙丑九月自宝华山庄还，舟中写小景八幅，似逊之老亲家”。“逊之”即王时敏，与董其昌是亲家，这是董其昌在舟中给他画的。董其昌名作《秋兴八景》中也题有“庚申九月朔京口舟中写”，说明那是在镇江的船上画的。立轴《延陵村图》上则题有：“癸亥二月画于丹阳舟中。”还有一张提到了陈继儒：“己亥子月泛舟春申之浦，随风东西，与云朝暮。集不请之友，乘不系之舟。”“不系之舟”典出老子，说明他是跟老朋友陈继儒在一起，并画了这张画。

在一幅描绘洞庭湖的手卷上，题有“记忆巴陵舟中望洞庭空阔之景写此”。董其昌所画与他实际看到的景色不无关系。船慢慢走，景致也自然而然地移过眼前。从这点上来看，中国的长卷很有意思，国外就没有这种形式。董源的《潇湘图》经董其昌一题再题，他记录道：“余丙申持节长沙（吉藩），行潇湘道中……”他所看到的景致“如此图”“令人不顿步而重作湘江之游”，看到了《潇湘图》，就好像又重新到潇湘道中去游了一次。事实上，当他看到这张画的时候，世人已经并不知道这画的名称了。但是，因为董其昌之前曾游历过，故而一看认出图中所画即是潇湘的景致，这张画就是《潇湘图》。今天我们说的《潇湘图》，其实是董其昌再命名的。因此旅行跟鉴赏也有关系。他“丙

申持节吉藩，行潇湘道中，越明年，得此”，第二年才得到这张画，“北苑潇湘图，乃为重游湘江矣”。“今年复以校士湖南”，又到湖南去一次，“秋日乘风，疾雨初霁，因出此图”“良可兴感”。

董其昌之后，中国的交通手段没有发生变化，“书画船”的传统仍在延续。陈继儒一套木刻版的书，乃“题于凝碧舟中”。他题道：“旧词六阙归舟吴门，书于雨篷之下。”米万锺号称自己是米元章的后代，他曾写道：“辛酉春分书于湛园之书画船，石隐米万锺。”现在的北京大学勺园就曾米万锺的私家花园。米万锺的印里有一枚“书画船”。董其昌的晚辈、朋友李流芳曾写道：“戊午八月廿八日，风日清美，邀西生上人同泛六桥……倚船作画，意思闲逸”。他们在船上画画。还有个手卷是“泊舟断桥”，船在断桥边停下了，主人无事，便画了这个手卷。另有记为：“丙寅冬日泊舟阊门，书唐人五言二首。”题在一个书法的卷子上。而“碧浪湖舟中坐雨作此遣兴”，表示这件作品是标准的书画船上的作品。

由“水上山水”与“山中山水”可知，坐在船里看到的风景跟在山里旅行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明皇幸蜀图》的作者和画中人一样，骑着马走山路，可以看到栈道、悬崖峭壁。而米友仁的画就是在船上看到的山水。赵幹的《江行初雪》藏于台北故宫，于画上也能看出视角乃是出于船上。将《潇湘图》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对比，也能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溪山行旅图》画的必然是走在山中所见的景致；而《潇湘图》所画的，让董其昌一下

子就感觉好像身在湘江舟中。两幅作品的构图、技法都不一样。

最后，傅申教授总结道：到了20世纪中期，由于生活和交通的革命性改变，全世界独有的“流动画室”——“书画船”

这一传统在历史上消失，也在全世界消失。艺术总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这一条却永远也不会消失。

(撰稿：卢雨枫)

## 傅申： 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附论书法鉴定问题

2017年4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九期之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场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傅申作了题为“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附论书法鉴定问题”的报告。报告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主持，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出席了活动。

傅申教授首先介绍了对于黄庭坚《砥柱铭》研究的缘起。《砥柱铭》因于2010年拍出天价而备受关注，而傅申教授关注《砥柱铭》是源于他从写作博士论文以来一贯的学术兴趣。在对《砥柱铭》作了简要的介绍后，傅教授介绍了海内外所藏黄庭坚真迹，并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作了解说，以确定黄庭坚墨迹的鉴定标准。魏徵《砥柱铭》是唐宋文人都乐于书写的作品。黄庭坚以敢于直言进谏的魏徵为榜样，执政者参奏他所编《神宗实录》为多诬失实，



三次审问时他“皆以实对”，不为所屈，因而被贬。黄庭坚坦然面对，书写《砥柱铭》以明志，且多次为后学晚辈书写该铭。黄庭坚书写《砥柱铭》，一方面是尊重铭文作者魏徵的品格，一方面也是推崇大禹治水大公无私的精神。据考证，黄庭坚《砥柱铭》有泸州石刻本、王观复本、欧阳元老本、徐师川本、为杨明叔书二本。今日所存墨迹即黄庭坚为年轻学者杨明叔所写的《砥柱铭》之一。黄庭坚遭贬谪期间，杨明叔对其照顾有加，今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黄庭坚与杨明叔书二封，是其证明。

傅教授随后探讨了黄庭坚《砥柱铭》的鉴定问题。他从“也”字的上钩和利如刀刃的长捺入手、多方楞或另起一笔的折肩、“爲”字从“彳”“糸”部不连笔以及横笔和撇笔的斜度等等黄庭坚书迹的特征入手，认为这些是黄庭坚书法个人的习惯，从而证明《砥柱铭》是黄庭坚真迹。有人质疑黄庭坚不应写错字，例如《砥柱铭》中“禮”与“祝”皆从“衣”，为错字。傅教授回应道，王羲之、颜真卿真迹中都有将“衤”写成“衤”的错字，因此不能以此否定《砥柱铭》是黄庭坚的真迹。也有人认为《砥柱铭》中有病笔，傅教授认为不能要求书法家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字都写得非常好。《砥柱铭》中有些字有补笔和修正的痕迹，这在黄庭坚其他晚年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傅教授指出，很多书画鉴定者在鉴定时都有心理上的成见，一旦认定一个作品是真是伪，都可以找出很多证据。

《砥柱铭》的收藏与题跋也可以证明其真实性。《砥柱铭》卷诸跋，最早者距黄庭坚去世不到半个世纪，肯定此卷为黄庭坚真迹，也提供了对此卷为黄庭坚早年书风的观点。在鉴藏史上，南宋中期的王

厚之和后期的贾似道曾先后将此卷鉴定珍藏，更保证了此卷的真实性。明代《砥柱铭》被黄庭坚八世孙及其族人题跋保存，后入明代最重要的鉴藏家项元汴之手。清代时，此卷入广东藏家之手，稍后为南京籍的伍福所藏，再辗转流入日本，近年返回国内，遂为两岸国人所共赏。

在讲座的最后，傅教授探讨了《砥柱铭》的书写年代问题。与不同年龄的人相貌不同一样，一个书法家不同时期书写的作品也会存在很大差别。通过与黄庭坚其他书法作品进行比较，并对黄庭坚所用毛笔进行分析，傅教授认为《砥柱铭》的书写年代应在1094—1095年间。《砥柱铭》为黄庭坚大行楷书书风转变初期的重要作品，对认识黄庭坚的书法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在傅申教授的报告之后，尹吉男教授谈了自己的感想。尹教授认为，傅教授今天一方面回应了自己过去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学界关于黄庭坚《砥柱铭》墨迹本的质疑。书画鉴定之难，在于它们绝大多数是传世品，出土的作品很少。另外，在书画鉴定领域，推断其是真是伪很难，找出疑点从而全盘否定很容易。傅教授在样本稀少的条件下，全面考察了黄庭坚《砥柱铭》，非常不易。傅教授所讲的笔画的斜度问题，尹教授认为特别重要，因为斜度是个人写字习惯所致，很难复制或模仿。尹教授也指出，傅教授的研究没有从章法、布局等角度进行分析，若能从此角度分析，则会更加全面。

(撰稿：熊峰)

## 30

艾朗诺：  
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

2017年4月1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担任评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鸣出席了此次活动。

苏轼的题跋作品往往探讨书法家的生活与个性、书法家与书法作品之间的关系，不仅展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强烈热情，也寄寓着他对不同书法家的见解与评价：饶有回味，遗憾叹惋，抑或有所期待。艾朗诺教授回顾了东坡题跋在书法界的地位。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历经隋唐一直到北宋初年，在苏轼之前业已出现大量探讨书法的文章，体例丰富、内容多样，但并没有专门探讨书法创作的题跋作品，更没有人系统地创作和整理题跋集。但苏轼的题跋作品无疑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和思想价值。苏轼之前探讨书法及书法理论者，大多是书法专家，而非苏轼这种广泛涉猎美学思想与哲学领域的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这也使得苏轼同前人相比，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宽广的范围。苏轼的探讨对书法的发展，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后，艾朗诺教授以苏轼的题跋作品为焦点，从北宋朝廷树立书法模范与对书法历史特定看法的尝试、迅速发展的北宋印刷业、北宋末年的政治党争和新党对元祐党人苏轼的迫害、北宋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作品商品化四个角度，结合北宋当时的社会现象，探讨了苏轼的书法思想。

早在992年，宋太宗就将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交由翰林学士王著编辑，题名《淳化阁法帖》。太宗、真宗、仁宗皇帝通常将《淳化阁法帖》的印本赠予高官，这使得《淳化阁法帖》在国内一度广为流传。不过这一法帖“真伪相杂至多”，编订得十分粗糙，作者、年代上错误频出，内容上也明显偏重“二王”的书法作品。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暗示过他对《淳化阁法帖》及其编订的不满，但并没有给予直接的批评。苏轼则大胆地指出，《淳化阁法帖》只是一部品质低劣的作品，并主张“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强调历来的各种书法体例各有其特点，不同流派各有其价值。苏轼对法帖的批判和不满，显然展现出他独立于官方评判之外的审美观点：这一部原本用于确立书法模范的集子，在苏轼这里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苏轼这一做法，无疑保证了文人在书法方面自由讨论和自主评判的空间。

苏轼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印刷技术



迅速普及的高速发展时代。不同于我们的想象，苏轼同时代的文人和学者并没有对图书市场扩大的现象感到高兴，反而展现出了一种保守的怀旧之情。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苏轼回忆了自己年少时抄书、读书的经历。然而印刷术的发展，在普及图书的同时也导致“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也和苏轼“乌台诗案”的个人遭遇有关。艾朗诺教授认为，正如监察御史何大政所说，苏轼“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如果不是书店未经许可便大量刻印刊行苏轼的诗集，“乌台诗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而其他御史收集到的“罪状”苏轼三卷《钱塘集》，也正是由杭州书店所收集刻印的苏轼在杭州期间所写的文章。这样的经历，使得苏轼尤其反对他人收集、刻印他的文章。苏轼也逐渐意识到，刻版印书技术会导致作者与其作品相互隔离的问题。一方面，书

籍一经刻印发行，其传播便往往超出作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另一方面，新型机器与技术生产出来的书本，反而会产生一种疏离之感，缺少真实性。艾朗诺教授在此对苏轼书法作品的工拙观念进行了更深的探讨。苏轼在题跋中经常会论及书法同笔者二者之间的关联，可见他并没有完全脱离书如其人的观念，但这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美学批判。苏轼化用了论语中“仁者其言也讷”一句，并主张书法作品和作者本人的性格、精神息息相关。而机器生产出来的印刷本则往往抹煞不同作者之间笔法的差异，缺少真实感。这种观念同样被他用来反对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措施。《送人序》中认为，王安石经学教育改革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日渐趋同，好像同一个模子印刷出来的书本，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被抹杀，这种做法在苏轼看来不值得肯定。

艾朗诺教授认为，苏轼注重书法并尽力抄写自己的文章，往往是他遭到政治迫

害的重要原因。苏轼曾一度仕途多舛，屡遭放逐，而他在放逐途中所写的任何文章，无论主题，都会被当做他对流放的抗议，进而遭到更深的迫害。艾朗诺教授再次引用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的观点，主张苏轼抄写其旧作《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政治抗议，一种相对安全的表达心事的方式。两篇赞美酒的赋文，本身并无深意，旨在抒发饮酒之乐，俨然酒后大有超越人世、升天为仙之感。然而苏轼抄写时的心境，显然不同于当初创作之时，乐观情绪转变为对个人前程的迷茫和焦虑，这种情感变化也是见诸跋文的。苏轼晚年处于政治迫害之中，不得不通过相对委婉的方式抒发心绪。艾朗诺教授强调，尽管苏轼并非每次书法创作都有这种含义，但我们仍不能忽视书法在其生活中的意义与作用。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文人之间的往来向来回避谈及金钱或物品的货币价值，否则就会被看作是一种不敬，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将金钱和腐化堕落相提并论。艾朗诺教授强调，钱财固然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但不能排除苏轼等人在从事书法等艺术创作时的钱财考虑。而我们也应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钱财上的考量固然是创作的动机之一，但远非创作首要或者唯一的因素。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通过自己的书画创作帮助扇子滞销的小贩偿还债务，这一事件是《春渚纪闻》中所载的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无从考证，但足以证明，苏轼本人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及其货币价值是有清晰判断的。而根据美国圣母大学杨晓山教授的研究，苏轼有时会直接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当作钱币使用。苏轼为从苏州前来惠州探望他的居士卓契顺抄写《归去来



辞》并赠与后者，在他的题跋中便有“公此幅字自是为酬契顺路费计”——这显然并非文人相交的礼物，而是抵偿旅费所使用的商品。从这一点来说，苏轼显然是知道自己的书法作品广受欢迎，并具有一定的商品价值。苏轼赠给僧人昙秀的药方，也另有目的和期盼，希望后者能够为他带来杭州的草药。

艾朗诺教授最后作出总结，他指出，苏东坡的题跋作品为我们观察宋代以来文人书法创作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在宋代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影响。然而北宋以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书本泛滥现象与书法商品化的趋势，也引起了苏轼和许多文人的不安，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人们疏于精读文本，文本也同作者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密切关联。反观当下，书法手稿成为艺术作品与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象征，这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当某一种文化活动受到威胁时，它便产生了新的意义。由此来理解苏轼的题跋、诗歌和文章的创作，在如今文字日趋式微的时代，也能以全新的眼光来发掘书法的别样意蕴。

在随后的互动交流环节中，朱青生教授认为，艾朗诺教授的报告对苏轼的书法思想有着深入浅出的探讨，听后深受启发。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及其价值标准同以德国标准建构起来的西方艺术史标准并不相容。书法并非一种“模仿性”的创作，其本身并不反映时代的面貌，这使得书法不能成为当时社会的图像证据；另一方面，文字意义也并不通过书法流传。但对苏轼书法观念的探讨，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以书法作品为视角，

探讨书法家对自我、对他人、对外物、对世界的体认。艾朗诺教授的讲演涉及艺术史学的四个重要问题：首先，苏轼对淳化阁帖的批评实际上是批评国家意识形态，这反映了宋代知识分子的某种自觉，也是艺术形态与精神环境之关联的展现；其次，作为先进的技术，印刷术改变了艺术的发展，也影响了人们对艺术的看法；再次，作为一个范例，苏轼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具体方法，他不但是艺术史中的大家，也是政治史上的关键人物；最后，以经济史来观察艺术史，打开了艺术作品的社会面向。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拓展，为我们探究书法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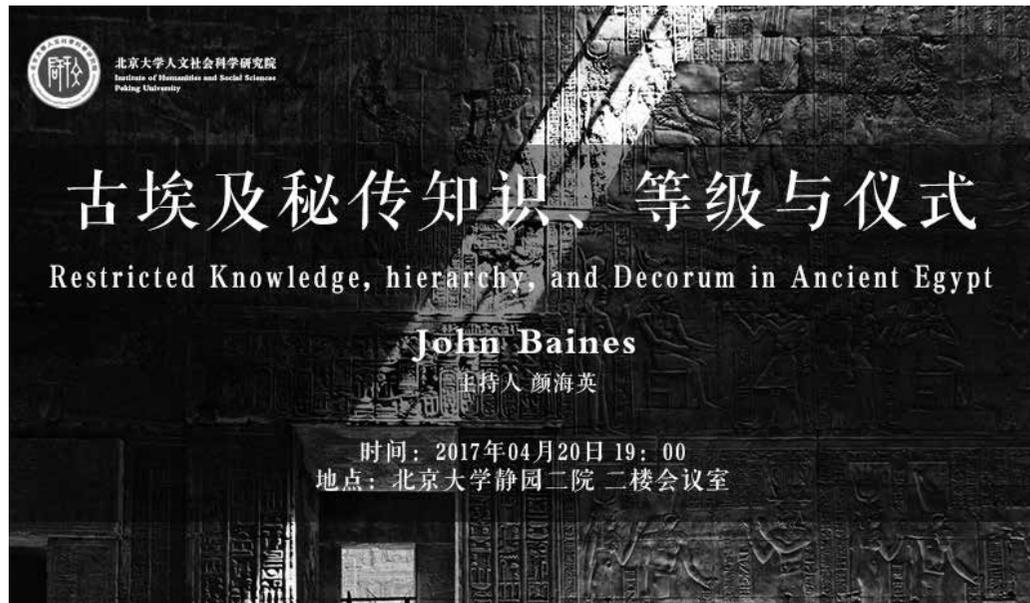
张鸣教授随之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苏轼的书法在其生活的年代兼具实用性和艺术价值，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区别。艾朗诺教授做出回应，认为实用文字和书法创作截然不同，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而难以界定的。考察书法作品并进行优劣之分，是苏轼所处年代的常态。而实用作品兼具艺术性，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甚至苏轼作为书法家，在撰写信件、公文时，也是有所自觉的。而这一评价方式的新变化相应地引发收集和鉴赏信札的新热潮，甚至一度视书法家的个人信件高于其艺术作品。

（撰稿：孟熙元）



31

## 约翰·贝恩斯： 古埃及秘传知识、等级与仪式



2017年4月20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一期之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著名埃及学家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以“古埃及秘传知识、等级与仪式”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拱玉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曾庆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黄庆娇出席。

贝恩斯教授自1976年至2013年在牛津大学任埃及学教授,著作等身,是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他擅长吸收多学科的方法论,综合利用考古材料、文献和图像进行埃及艺

术、文献、宗教、自我表达等方面的研究。他不仅在埃及学的多个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还经常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埃及学界的里程碑式人物。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贝恩斯教授对他多年前关注的问题——秘传知识和社会等级的一次回归。1990年,贝恩斯教授在美国埃及研究中心期刊上发表了《秘传知识、等级和仪式:现代观念和古代制度》一文,此文是埃及学界秘传知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次讲座中,贝恩斯教授把目光转向与宗教仪式和神祇形象相关的神圣图像,进而利用这些材料讨论如何理解秘传知识,谁能接触秘传知识、如何设计这类视觉材料等问题。

贝恩斯教授的讲座以讨论神圣图像的隐藏与展现开篇,分别从神圣图像中的身体表达、神圣图像的环境场所以及这类图像如何隐藏、如何控制其公开程度这几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首先,贝恩斯教授利用埃及史前时期、古王国时期和欧洲16世纪早期的图像材料,简要说明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将具备神圣意义的图像隐藏起来的情况。比如公元前3400年左右赫拉康波利斯墓地中出土的面具,可能是在葬礼仪式中使用,目的在于将人的面孔隐藏起来,从而凸显身体的重要性。又如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赫拉康波利斯出土的铜鹰,被埋在一座小神庙中心的房间中,深藏在坑内,上面用石板封死。在铜鹰制成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它又经过多次修复和改装,鹰头用金子制成,头上有金冠。铜鹰立在一根铜柱上,人们可能用铜柱举着它参加游行。这样严密的隐藏和贵重的材质暗示我们,这个铜鹰很可能是一个神圣形象,也是一个祭祀物。

身体形象是神圣图像中的重要元素。人和神的身体形象在不同文化的祭祀中有不同侧重。涅伽达二期期间,出土了几乎与上文提到的面具同时代的真人大小的雕像,这种规模的雕像是前所未有的发现,虽然衣物极少,但已展现出埃及人的关注点逐渐开始从身体转向身体上的种种装饰。假发、珠宝、颜色、纹身和衣服等,都为身体附加了种种象征意义。约一个世纪后,人们发现了更为巨大的敏神雕像。雕像身上仅有一条多股腰带,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神的阴囊和勃起的阴茎。神的阴茎用单独的一块石头雕成,可以在雕像上自由拆卸。敏神巨像可能竖立在神圣区域的入口,保护着神圣区域内的神

龕。赤身裸体可以展现生命的激情与活力,是一种完美的理想化身体的表达,但也是很多文化中被征服、被打败的符号。埃及精英阶层在大量浮雕和塑像中展现出来的形象,都穿戴着精美的长袍和头巾,可见将身体包裹起来的人比赤裸身体的人地位更高。然而那些裹紧长袍的法老雕像也不是人人都能看见的,这种“看见”依然是秘传知识的一种,也是彰显权力层级的一种特权。

作为神圣图像的承载环境,神庙建筑的设计也展现了秘传知识与等级之间的关系。神庙围墙是对内部神像、神秘知识和祭祀仪式的保护。作为举行祭祀仪式和保存神秘知识的场所,神庙对人员有严格的准入限制。祭司们必须在身体和心灵都完成彻底清洁之后,才可以进入神庙。只有极少人能够进入神庙内部最深处的神殿,而且进入神殿的入口也被设计得狭小而神秘。神庙内部的祭祀活动就是这样被保护起来的,普通人看不到这样的仪式。埃及人对死者和葬礼仪式也有类似的保护措施。死者的木乃伊被埋葬在墓葬地下深处。生者对死者雕像献上供奉,而这雕像却放在享殿的小房间之中,被隔绝在生者视线之外。雕像和生者之间的墙面上有一小孔,为这种隐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公开展示。

这种对死者雕像的极力隐藏是一种对死者的保护。同时,布料也为这类保护提供了重要材料。死者的身体需要被层层亚麻布包裹,雕像也经常被布料覆盖。神庙日常仪式中对布料的使用也在浮雕中体现出来。阿拜多斯的塞提一世神庙中,神像在封闭的神龕中度过整夜。每日清晨,祭司们打开神龕,解开神像身上的包裹,为神像清洁全身,进



而献上供奉。这种对神像的包裹实际上是一种将神和人隔离开来的措施。普通人没有资格与神接触，他们对神的祈祷都通过高级祭司传达给神。人神之间的交流一方面依赖人们制作的各类祭祀物，正如上文提到的铜鹰等物，一方面受限于等级社会中对秘传知识的控制和传播。

本次讲座获得了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反响，形成了交流讨论的热潮。在深入交流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张悠然)

## 约翰·贝恩斯： 托勒密时期的身份表达：以女性传记为主的考察



2017年4月26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由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著名埃及学家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拱玉书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黄庆娇以及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玛丽亚·坎纳塔（Maria Cannata）出席。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贝恩斯教授近些年

来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2004年，贝恩斯教授的《埃及精英在托勒密统治环境中的自我表达》一文收录在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埃及与希腊间的亚历山大里亚》一书中。本次讲座中，贝恩斯教授将目光聚焦于托勒密时期的埃及本土贵族，通过解读这一时期墓葬中的数个女性墓碑，来分析和揭示当时本土贵族如何构建其身份表达。

贝恩斯教授以介绍埃及人从新王国初期到托勒密时代之前进行身份表达的方式

为开端。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解读了托勒密时期的数个女性墓碑传记和孟菲斯大祭司家族的一对夫妻传记，以此分析这一时期埃及本土贵族身份表达的模式和特点。首先，贝恩斯教授利用古埃及十八王朝前期到托勒密时代早期的一系列贵族的传记和雕像，来展现古埃及贵族身份表达的传统方式和特点。新王国时期，刻有传记的碑铭或者雕像在贵族墓中频繁出现。这种贵族的自我表达通常是图文结合的，图像的主题往往与埃及的神明及宇宙观相关，铭文则由墓主人的名字、一系列头衔及生平故事组成。头衔非常重要，它们可以彰显墓主的地位和声望，在托勒密时代后期，贵族传记中可能只有一系列的头衔，但是却能提供大量的信息。在第二十到二十一王朝左右，属于女性的碑铭开始大量出现。在这之前，女性通常只出现在其丈夫的碑

铭、传记之中，成为男性的附属。至于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大量出现以女性为主的碑铭，学界尚未有定论。这些碑铭往往色彩鲜艳，人像肢体动作栩栩如生。图像的主题主要包括供奉神祇、入葬仪式以及众女哀悼。由于自十九王朝起，埃及人逐渐抛弃在地上建造纪念性坟墓的习俗，而是开始建造大量地下墓室。因此这些碑铭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并不是立在墓中的墓主纪念碑，而可能是在入葬的一系列仪式中使用的必要工具，然后作为陪葬品藏入墓中。

关于托勒密时期的材料，贝恩斯教授选取了五份贵族传记，这五份传记的主人以女性为主。贝恩斯教授先对其中三位贵族女性的传记铭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深入分析。可见这一时期的女性传记是改编自传统的男性传记模板。并且由于传记的实际写作人往往是墓主人的丈夫或者儿子，



文中也会出现这些男子的头衔。但传记也表现出女性偏好的一些特征，例如贵族女性更倾向将自己的生平与女神联系在一起，譬如与爱、生产和繁殖有关的哈托尔女神等。这些传记选择使用当时已经不再是通用语的圣书体进行书写，可能是希望通过文字对能看懂铭文的生者群体进行限制。传记以第一人称为主，但是也偶尔出现第二人称，例如铭文中出现呼唤他人的句子，死者希望有来访墓葬的生者能够大声地念出铭文。这说明这些碑铭可能在墓葬仪式中使用过。

接下来，贝恩斯教授展示了三个碑铭和棺木上的图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明显带有希腊特征的人物出现在供奉神祇以及死者接受供奉等场景中，这说明此时埃及传统已经逐渐渗透到希腊贵族中。在典型的埃及场景中，希腊贵族希望作为埃及人进行埋葬，接受埃及人的信仰和传统。这一时期，大多数贵族的身份表达都类似于亚历山大里亚发现的霍尔立像，霍尔立像的正面是典型的希腊人物，身着希腊式的裹身袍子，但在其背面，则是埃及式的石碑，碑上用圣书体刻着他的传记。这类雕像铭文通常描绘贵族是如何修复神庙的，并且背靠神庙墙壁，很难被人看到。这大概说明人们会念诵这些铭文，仪式上的大声诵读可能正是这种设计的意义所在。这类文本对其主人所属的贵族集团有更广的认同上的意义。

最后，贝恩斯教授分析了泰姆霍特普和舍瑞普塔夫妇的传记铭文。这对夫妻来自孟菲斯大祭司家族，孟菲斯大祭司家族在托勒密时期十分显赫，最后几乎成为托

勒密后期埃及本土文化的代表。夫妇两人每人拥有两块墓碑，一块以圣书体书写，可能用于公开展示，一块则以世俗体书写，被埋葬在墓中。后者可能与墓葬仪式直接相关。在妻子舍瑞普塔的石碑上，女神以及墓主本身的形象都被清晰地刻画出双乳，这是完全违背埃及传统艺术原则的，可能是当时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一种妥协。而丈夫借妻子的铭文，表达了与埃及传统死亡观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对死亡的恐惧、厌恶和对享乐、生命的渴望。除此之外，妻子的铭文详细记述了夫妇二人如何得到伊蒙霍泰普神的祝福而获得了第一个儿子。丈夫的铭文中大量的头衔和对孟菲斯大祭司职务内容的描述，包括为托勒密国王加冕、国王驾驶着战车进入神庙的描述等，这都是与埃及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元素。

综上，贝恩斯教授利用大量详实的考古、图像和文献材料，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展示了托勒密时期埃及本土精英如何在两种文化共存的社会中构建出具有希腊元素的身份表达，以及希腊精英的自我表达如何展示了埃及传统文化特色。这种认识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隔离”说和“双面社会”观点的反驳。讲座结束后，在座老师同学纷纷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提问，问题多数集中于托勒密时期埃及和希腊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传记碑铭的观众群体和主要功能。贝恩斯教授十分热情地为大家解答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撰稿：郝仁娜）

## 32

### 格雷厄姆·默多克： 再会马克思

2017年4月2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二期之第一场在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部文化与经济学教授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作了主题为“再会马克思”的讲座。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靖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能教授出席。

默多克教授以两个问题开场：我们如今为什么读马克思？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对现代传播有什么了解？紧密联系的两个问题也贯穿了默多克教授这次系列讲座的线索——指引我们如何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当下价值。

进入讲座主体部分后，默多克教授以思想发展史的思路梳理了马克思的生平经历。他首先强调了马克思家乡特里尔市（Trier）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特里尔市是法德边境的一个小城，在拿破仑时代曾长期处于法国治下，马克思和其他当地人一样，天然有一种对法国思想传统的亲近，尤其是关于理性主义和法国大革命思想。马克思一生都牵挂着法国的政治形势，并写出了三本关于法国政治的杰出的小册子（pamphlet），这些都体现了他与法国思想的深刻渊源。后来，法国浪漫主义式的马克思转变为经济学的马克思，但最初的

道德立场却是一以贯之的。18岁时，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学到柏林大学，接触到当时由黑格尔哲学主导的德国哲学传统，开始对历史哲学和辩证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辩证法日后成为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他还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并因此深受共和主义和无神论的影响。在18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开始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其中有关“林木盗窃问题”中私人积累的，也有表达对新闻自由的理想的。这些文章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引发的伦理危机的思考，这些思考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成型。

马克思对“林木盗窃问题”的相关评论使普鲁士政府不满，随即《莱茵报》报社被查封。失业期间，马克思遇到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9岁时就写了针砭资本主义剥削的文章，二十多岁时，他将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给马克思过目，马克思当即震惊于两人思想的契合。两人一拍即合，从此成为了终生的战友。这个时期，撰写报刊文章的工作使马克思更关注国际时事。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方兴未艾，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让他和恩格斯看到了从封建社会中创生出新事物的可能。这种希望最终灌注成1848年出版的《共产



党宣言》。《宣言》出版后没几天，革命在整个欧洲爆发了。事态似乎在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然而革命却惨然收场，旧制度又恢复了往昔的力量，法兰西第二帝国更是缔造了一个令今人赞叹不已的辉煌时代。革命的坍塌对马克思等革命者的冲击是根本的，此后十多年马克思一直退居政治行动舞台之外。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再度失望，工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中流连，并没有承担起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大革命后不久，一切恢复了常态，这让马克思开始踏上一段漫长的探索旅途，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为何如此有韧性。同时，他也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蕴含的根本矛盾：“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随着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大量工人聚集起来，他们更容易意识到自己被剥削的处境，也更方便他们组织起来反对资本家。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巫师，却无法控制自己召唤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

的另一个根本矛盾在于，虽然它确立了一种进步史观，但资本主义实际的发展历程却遍布危机。默多克教授提示我们，今天仍需要牢记这个重要的洞见。

马克思不仅是写《共产党宣言》和政治小册子的马克思，更是写《资本论》的马克思。默多克教授指出，《资本论》一张封皮下实际上是两本书，它一方面用戏剧性的语言精彩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夸饰下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详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资本论》期间，马克思在伦敦过着贫困落魄的流亡生活。伦敦作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为马克思提供了观察和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佳窗口。这段时期，马克思每天在大英图书馆里发奋阅读和写作，从报纸和他人的讲述中汲取着信息，但却几乎从没有和工人阶级直接接触。流亡期间的马克思始终处于一种疏离和变动的状态。默多克教授提醒我们，这一生平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作品和思想的动态（dynamism）。在写作那几部重要的手稿时，马克思就在不断检验、发展自己的思想。那么，“批判”

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默多克教授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批判不只是对现实的批判、提出新的方案，还是和自己的争论、对自己的批判。马克思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思想确立下来、封闭起来，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Doubt everything），他总是不断地检验自己的思想，向新的发展可能性开放自己。马克思从来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完成的体系，他始终在考虑自己的体系应如何应对新的情况、如何容纳新的观点。

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下仍十分相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开放的。当今西方人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与马克思深入了解的现实仍是非常相似的。马克思逝世于19世纪80年代，此时直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爆发了各种为争取权利



和更好条件的社会抗争。如今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马克思逝世时相差无几，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一切公共的东西，马克思构想的共享的、责任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完全被破坏了，保守主义支配了西方社会，我们的社会似乎退回到了马克思逝世的年代。这些就是我们如今仍然要读马克思的原因。我们回到马克思那里，不是为了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和他一样努力去理解现实的复杂性。

接着，默多克教授从他的专业——传播学角度为我们指出一条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当代社会传播的道路。传播系统是一个大规模工业系统，因此支配西方经济的大公司往往是传播公司，例如谷歌和脸书。在网络世界中，传播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连接的，传播构造了我们的生活，它也是我们交流的象征性场所。以手机为例，手机不但是一个国际化大生产的最终产品，还是我们连接世界的工具，手机的种种功能甚至还构建了我们的生活。默多克教授预告说，他将在下面几场讲座中，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洞见将现代传播系统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统合在一起，为我们勾勒现代传播系统的基本形态。

最后，现场师生就自己的疑惑和针对默多克教授所讲演的内容踊跃讨论，默多克教授一一予以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撰稿：谭振洲）



## 33

## 王铭铭： 莫斯论文明——兼及对中国研究的启发

2017年4月27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三期在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作了题为“莫斯论文明——兼及对中国研究的启发”的主题演讲。演讲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哲学系教授李猛担任评议。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周飞舟、助理教授田耕，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娟，以及远道而来的著名人类学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罗兰出席了此次活动。

首先，王铭铭教授指出，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法国人类学大师莫斯的学说、特别是其文明论的梳理，并从中发现对中国研究的重要启发思想。1872年，莫斯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涂尔干的外甥和最为重要的学术继承人之一。在涂尔干的启示下，莫斯早年学习哲学，1896年后来到巴黎学习梵文和比较宗教学，在这一时期他同时受到圣西门的影响，对其社会主义学说产生浓厚兴趣。1901年，莫斯出任巴黎大学宗教与未开化民族的历史学教授，奠定了其早年研究的基础和声誉。一战之后，他和同人共同创办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成为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的创建者，并利用这一平台开

展研究、努力教学，直至1950年去世。莫斯一生著述丰富，《论礼物》一书更是世界人类学少有的经典之作，而其最为主要的著作均被列维·斯特劳斯编入《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广惠学林。王铭铭教授认为，莫斯早年著作《论献祭》（1909）一书探讨了通过献祭手段在圣俗世界之间建立交流的“人—神关系”的基本论说；《论爱斯基摩人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1909）则着重强调了人和物质世界相适应的“人—物关系”结构；《论礼物》（1925）从礼物研究入手，分析了社会对于中间之物的依赖，并从礼物的交换层面展示了“人—人关系”的内涵。这三篇著作构成了莫斯社会学论说的完整体系。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莫斯学说既注重物质也重视心灵的两面，既研究古式社会也关心现代社会的双重取向。杨堃先生认为莫斯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中间人”，较为准确地概括了莫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立场。

然而，在莫斯漫长的一生中，他除了对“社会”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之外，也关注到了“文明”的论说。2003年，英国考古学家史朗格将莫斯有关技术、文明、技艺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同时也使中文世界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莫斯的这一研究。王铭



铭教授指出，如果想理解好莫斯“文明论”的特色，首先要对“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作学术史的清理。西方语境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初是一个不可数的概念，其内含强调“文明”是一种过程性的教化之结果，这种理解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后至今为中国学者所沿用。而从18世纪起，“文明”一词出现了可数的概念，卢梭在其论著中提出了“文明”和“文化”的区别，并将“文明”作为一个贬义词加以排斥，而人类终究要回归到“文化”。这一思想为德国哲人赫尔德引申诠释，提出了“习俗”（life style）即是“文化”的概念。上述理解在19世纪也对古典人类学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化人类学派和传播人类学派均在文化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三圈说”理论，但无一例外均将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作为近代“文化”出现之前的落后“文明”形态。受到这种思考的影响，20世纪诞生的民族志研究也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设定在了“社会—文化”内部，但正是在同时期的1913年，涂尔干和莫斯在法国《社会学年鉴》上发表《关于文明的札记》，认为“有些

社会现象不那么严格地归属于确定的社会有机体，他们在空间上超越单一国族的领土范围，在时间上超出了单一社会存在的历史分段，它们的存在方式某种程度上是超国族的”。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事实，包括技艺—技术、审美、语言、政治组织、家庭组织等。相对于孔德在意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单一文明，涂尔干和莫斯

认为文明应该是多元的，而其主张文明自身具有整合体系，也使之区别于人类学传播学派的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莫斯延续了“文明”论述主体。从1930年莫斯发表的《诸文明形态和要素》一文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莫斯文明论的五个要点：第一，文明既包括物质创造，也包括精神创造；第二，所谓“文明”，具有在不同群体间相互借用、共享、相通的特征；第三，包括民族在内的社会单元，不是一切整合体的形态，在社会整合体层次之上，还存在若干规模较大的“文明体”，这些“文明体”总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延续，因此人类学有必要和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相互借鉴、开展研究；第四，文明之间并非相互隔绝，而有着频繁、密集地互动，互动的主体包含技术、贸易、故事和观念、宗教特别是秘密宗教等几个大类；第五，尽管社会和文明之间的互动频繁密集，但是单一文明从未成为现实，迄今为止，文明是多元的。

王铭铭教授认为，就现今的中国研究来看，国族文化不等于文明，文明要素的分布、文明的有机联系线条超出国族的疆域。在一些情况下，数个国族共享一个文明，



在另一些情况下，一个国族兼收数个文明。中国约等于一个文明体，但这个文明体内部区分为地区和民族，这些地区、民族与“朝廷”一样，长久以来与不同文明打交道，其“地方性知识”具有莫斯所定义的“文明”的属性和特征。这一论述的启发无疑是深刻的：从纵向关系上，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仪式实践关系研究和民间宗教研究；从横向关系上，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内外关系、文野关系、“三皇”传说中文明始祖作为技术师和帝德承载者的双重身份等问题。因此，通过莫斯“文明”论反思中国研究，应当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在评议环节，渠敬东教授认为，王铭铭教授的讲座体现出一种对非单一文明人类学研究和中国人人类学现状的深切关注，其核心议题仍然包含着古今对话、中西对话的内涵，令我们反思中心和边缘研究中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李猛教授认为，王铭铭教授的讲座指出人类学并不是只关心未开化的社会的学科，而是关注人类文

明整体的社会科学。这种有关“文明”的人类学关怀有助于我们突破国族社会学限定的视野，突破政治设定的限制。在中国研究方面，文明人类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构成对话，希望从多元视角对之进行反思。李猛教授同时认为，文明固然具有交流和多元互动的特征，但文明的一体化和自我中心主义才是文明的根本特征，文明的过度交流，可能导致文明冲突与解体。因此，文明互动研究之推进，必须观照文明维持自身边界的内容，文明的实际状态处在一种封闭和开放的辩证法之内，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守护文明才是其职责所在。

讲座的最后，董强教授和来自京内各高校的老师、学生积极提问发言，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援疑质理，深化并丰富了本次讲座的内容。

(撰稿：玉书涵)

## (二) 未名学者讲座

13

### 咎涛： 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民族主义的一个视角



2017年3月14日晚，文研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三期，此为兴全基金赞助新学年该系列之第一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作了题为“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民族主义的一个视角”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担任评议。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出席。

咎涛老师首先定义了历史书写的广泛性，不只是文字，也包括图像、声音、建筑、艺术、纪念物、博物馆、展览等等，甚至包括抹杀、毁灭、掩盖或隐藏。随后他以三句话概括了本次演讲的主题：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乔治·奥威尔

伟大的革命很自然地会力图把他们之前时代的历史也革命化。

——费正清

人并未记牢历史；人总是在构造它……他没有把过去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象北冰洋冷藏住百万年之久的猛犸象似的，他从现在出发，他总是通过自己来认识和理解过去。”

——吕西安·费弗尔



晷涛老师谈到，从孔子盛赞的良史到崔浩的国史案，再到近年来围绕台湾“二二八事件”的不同解释，甚至炮制“孙中山是韩国人”的假新闻，历史书写无一不伴随着权力之争。而当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的时候，就需要用一种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神化自己、团结民众，美国早期史家关于美国建国史的书写（如启蒙之子的叙述）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土耳其 20 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史观是我们考察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关系的主要分析对象。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土耳其人被定义为圆头颅的种族，有近万年文明史，它自中亚某个地区向世界各地迁移，影响甚至创造了包括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在内的世界主要文明。土耳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史观（Tarih tezi），除了政治权力的因素外，还需要深入到土耳其近现代历史的脉络中，梳理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变迁问题，以此考察政治权力在当时推广这个史观的目的，仅仅停留在了解政治权力对于历史的利用这

个一般性的结论是不够的。

一个民族都不能只靠“战败失地”这一个理由来解释现在领土的现状，它需要在战后重建民族自信与自豪感。一战战败后的土耳其同样如此。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但自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其所面临的大问题与当时的许多其他的没落帝国类似——“在 1850—1918 年间，

帝国的主要困境有两个方面：一、维持拥有广阔领土、众多人口和权力的国家；二、通过满足民族主义的、民主的和经济进步的要求来调和上述现实的局限性。”

许多奥斯曼精英尤其是基督徒臣民成为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掮客，而随着战场上的失败，他们对本文明 / 帝国的自我反省和学习西方的认识逐步加深。最初学习西方都是从军事战败开始的，军事改革就会引起对政治变革的思考，随后就有文化变革，乃至全盘西化的要求。

1904 年，在埃及开罗的报纸《突厥》（T904）上，优素夫·阿克储拉（Yusuf Akçura）发表了其著名的政论——《三种政策》（Uç Tarz-i Siyaset），分别指出了在帝国存在的三种政治思潮（亦是三种政策）的缘起、内容及出路，这三种思潮分别是：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他认为，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要想保住帝国原来的版图格局已属痴心妄想，追求建立统一的奥斯曼民族这种做法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因此，谁要是还在追求奥斯曼主义，那简直就是在浪费时

间；谋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建立统一国家的泛伊斯兰主义，尽管听上去浪漫而诱人，但是，不仅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和民族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政策也必将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强大阻力。在各个拥有穆斯林公民的国家中，它们绝对不会任由国内的伊斯兰分裂势力发展。基于种族特性而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影响很小的“新思维”，谋求建立从土耳其到中亚的统一的突厥国家，但阿克储拉对此也不抱很大信心，这一政策的最大对手是俄罗斯，这一政策的实施同样也是利弊参半。阿克储拉作为一个泛突厥主义者，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为了引出自己的主张，他对其他另种意识形态的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他的这个作品在土耳其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到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国名里出现 Turk 这个词根的独立主权国家。国名的选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不过，这个国名对应了西方人长期对土耳其的称呼，也对应了语言的构造，-iye 有土地的意思。共和国建立后，泛突厥主义者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国家来之不易。在独立革命之初，甚至一度出现了寄希望于英国或美国托管的想法，可见当时大部分土耳其人对前途并没有信心。后来，苏俄的帮助对土耳其有很大意义。

对于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如何从意识形态上确立对新领土的主权很重要。早期历史教科书中的那种土耳其史观便应运而生——它不满足于 1071 年突厥人来到小亚细亚这个史实，而是想要诉诸于更加久

远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历史性主权。这是土耳其版本的“自古以来”说。反映了当时土耳其人面对欧洲史观对自身合法性的忧虑。在政治领导人亲自挂帅推出新史观下，赫梯人成了土耳其人，当时在西方学者主持下紧张进行的赫梯考古，因应了政治需要，至今土耳其还可以看见当时树立于公共场所的赫梯文物巨型复制品。

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时期业已发生的“族史重构”，虽然外在地表现为对自身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或研究，但它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这一貌似学术研究的进行考察，也就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为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学术史问题。实际上，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族史重构更多地被置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且已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解释模式或理论模型。霍布斯鲍姆与安德森等学者都极为关注民族主义对“过去之神圣性”的强调，以及把这种神圣性与未来相联系的特征。对于文化一族裔民族主义而言，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共同起源亦非常重要，这实际上会顺势提出一个所谓共同过去的问题，亦即要求有共同的英雄、史诗和祖先，这最终导致要求有共同的历史。人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历史由是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据，亦成为民族国家存续“合法性”（legitimacy）之重要来源。历史给人一种确定感，一种永恒性，甚至是一种不朽感，使人在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中不致迷失自我。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民族，都需要历史来提供这样一种确定性的支撑。正如阿塔图尔克所说：“我

们的共和国就像一岁一样年轻且充满了活力，我们的共和国也像一千岁一样源远流长、充满力量。”

阿克储拉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成为历史协会的主席。他在重要的、政治挂帅的史学大会上，通过界定历史学与民族的关系来理解土耳其史观：“历史不是一门抽象的科学。历史是为了生活，为了民族和部落的生活、过去的保存，以及为了发展其力量。”阿克储拉说，欧洲列强经常使用历史来使其对所谓“低等民族”的控制合理化，并证明其优越性，但是，阿克储拉对欧洲的这种帝国主义史观表示坚决的拒斥。他指出，土耳其历史大会上提出和阐发的观点中带有明显的种族因素，但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最早就、是由欧洲人提出来的，它服务于欧洲的霸权主义，没有任何科学的价值；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为了反对欧洲人的偏见，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历史观，但土耳其史观不是服务于殖民主义的，而是为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尤其是要实现与欧洲人之间的平等。因此，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对与土耳其史观相似的诸种个案报以同情之理解。每一个历史观的提出，都有它的不得已之处。“土耳其史观”不只是为了增强自信而想象和创造“伟大的”土耳其民族神话，整体上也服务于凯末尔在国内所领导进行的现代化变革。赫梯人不只是土耳其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很长时期就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对当世的土耳其人来说，那是世俗的文明。在20世纪30年代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奥斯曼帝国被看作是土耳其人所创建的诸多国家

之一，而土耳其共和国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1919—1922年的“民族斗争”（milli mücadele）时期被当作共和国的“准备期”。这样的民族历史叙述，一方面把土耳其共和国置于某种伟大历史性文明的谱系之中，也为当代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包括向欧洲学习）提供了看似坚实的历史依据。

最后，咎涛老师还指出，政治权力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不止是如何建构历史，也包括如何毁灭历史（毁灭也是一种变相的建构），新闻中多次出现所谓“伊斯兰国”疯狂破坏占领区的文明遗产，除了经济利益驱动外，也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

在随后的对谈中，李强教授对 Nation 和 State 作了梳理和区分，并指出帝国的继承者一般都有宏大的梦想，所有人都会从历史中找到令人向往的过去，以此激发新一代人追求美好伟大的动力。那么埃尔多安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他的大目标是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恢复他的梦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作为回应，咎涛老师详细介绍了当代土耳其官方出的所谓“土耳其梦”的详细内容，他对此曾做过话语分析（参见咎涛《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

（撰文：董雨）

## 14

### 贾妍： 帝国图景——亚述浮雕的时空叙述与仪式表达



2017年3月21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无名学者讲座”第14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贾妍助理教授作了题为“帝国图景——亚述浮雕的时空叙述与仪式表达”的演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拱玉书教授主持讲座，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担任评议。文研院学术委员李零教授、工作委员李猛教授、历史学系颜海英教授等出席了活动。

贾妍老师首先谈到，艺术史研究的图像资料，即使没有文字辅助，也读出图上的大体内容并进行诠释。讲座选取的两组叙事性的浮雕，关注点在于讲故事的过程，即其叙述模式。本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来自她在哈佛大学攻读时期所作的博士论文。

贾妍老师首先简述了古代近东和亚述的地理文化概况。真正成为帝国扩张姿态的是新亚述时期，其中有三次迁都。尤其在亚述王 Ashurnasirpal 二世的阶段，将都城迁到尼姆鲁德，开始了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对外

扩张。讲座通过这两百年中首和尾两个材料，来管窥亚述时期的图像面貌。

从结构上分析，叙事图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叙”，一部分是“事”。“叙”有两种：连续式和节点式。节点式是采取一个时间点，抽取压缩事件；另一种是连续式在同一件事中捕捉多个时间点。古代两河的图像记叙在最初已经达到了相对完整的模式。在新亚述时期，Ashurnasirpal 二世时第一次用浮雕的方式装饰宫殿，并且有了更多样的排列组合的方式。

第一个个案是 Ashurnasirpal 二世时巴拉瓦特（Balawat）的浮雕大门，共有三扇。尼尼微是后期都城和军事要塞，曾作为行宫使用，小宫门、大宫门和庙门都是双开门，由青铜浮雕装饰，每一个门条都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从门上出现的图示来看，可将其分为征战、狩猎、战俘、纳福和立碑祭祀等几类。战俘只在小宫门和大宫门上出现，也是一个门所独有的题材。

浮雕中亚述王都是朝向门轴的方式，并

且都是对称构图。图像排列的逻辑背后是否有一个观念逻辑？门上文字有释图榜题和边条铭文，为什么要在图像上加上榜题？空间信息和地理信息是图像无法告知的。把地理信息复原在地图上，按照三扇门的建造时期排序，就能看到地图上这个圈是在逐渐扩大的，这种扩张也可以和文献相印证。但这不仅仅是亚述扩张的地图，还表现了扩张的观念。所有的王都是向外的，占领的地区是在门轴。这像是文字所不能展示的、用门竖立起来的纪念碑。

另外在方向上，也有一些视觉表征。所有的王都向外侧门轴运动。这些事件也具有运动感：向外行的运动，如征战、纳贡。真正向内的只有朝贡，只出现在庙门上。内向型“迎朝受贡”是代替神的立场。从考古报告上看，门的日常状态是一扇闭合，一扇呈九十度开启。把这个阖的门放在空间中，人站在门前朝向主神殿，庙门上的王面朝着来访者。对照两河历史上其他的材料，这个布局意味着王与神的一致，王在人神之间面朝来访者。亚述时并没有把王神化，但是通过这种微妙的方式，王和神得以靠近。

新亚述时期，门道下常有护门神，铭文写着：“善者进，恶者出。”王也是迎善除恶的直观表达。门也有仪式性功能和文化隐喻，可以作为分割时间和空间的符号。两河很早就把门作为文化符号，标注着内和外、进与出，比如在伊施塔入冥府的神话。门前会有特定的仪式活动，往往与杀戮有关。以空间为关键词作为分析，通过门的开合变成了有仪式意味的空间。“图景”展示出了亚述帝国在刚刚兴起的空间概念。闭合时象征中心与周边，打开时进入了神的领地，代表

身后的神来纳贡护佑的文化深意。门的开合展现了以亚述为中心的帝国世界观。

第二组材料是尼尼微宫殿的花园宴饮浮雕。亚述王的视线正对的树上高挂着一颗头颅，这让一个普通的花园宴饮变成了历史事件。Ashurbanipal 的编年史中不断地重现这一主题。如史诗所述，这是埃兰王 Teumman 的头颅，史称 Ulai 河之战。整个叙述的线索沿着一个半环形的路线行进。古代两河有猎“头”的母题。这种杀戮方式也是仪式性的，锤头杀本来是神的方式，这是对神话母题的仪式性效仿。在连续叙事方面，Ashurbanipal 时有著名的猎狮浮雕。狮子出现了很多次，在时间上，敌人的死亡过程被扩大了。亚述后期征战和狩猎的题材用了同样的图像语言。这种叙事模式和仪式功能的互通，在伊利亚德看来，表明时间是有密度的。周期性的再现、重复、永恒的在场，是三大巫术宗教时间的标志。最早连续叙述都是用来记录仪式事件的。后来引入了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也有了仪式事件的时间感，有了永远的、循环的、在场的方式。

贾妍老师通过阐释，展示了两组图像背后的观念和古代亚述王国四海会通的帝国景象。她最后引用了一个比喻：我们常常面对的材料都是物质性的，只能看见乐器却看不到乐音。而艺术史学者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眼光的投射，让古代的东西不仅可以说话，而且可以“歌唱”。

在随后的对谈中，各位老师表示十分震撼。郑岩教授认为，贾妍老师以非常巧妙的角度展示了什么是美术史。美术史的研究是物的本身，不完全是过去的历史；美术史也

出反思：在同期的中国是否有类似的图像叙事的模式，又该用什么样的语汇来表达？李零教授表示亚述浮雕的军事装备令人印象深刻，古代文明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杀戮性表现，研究中使用的空间视角非常有启发。

贾妍老师回应，亚述人确实常以杀戮的

方式向神致敬。如果埃及是以不变应万变，亚述像是万变不离其宗。贾妍老师表示，她在努力通过图像的形式，去追寻古代文明的精神内核。

（撰稿：梅琳）

## 15

### 张剑葳： 栖于高山之巅——中国古代的山居形态

2017年3月28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五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剑葳助理教授作了题为“栖于高山之巅——中国古代的山居形态”的演讲。文研院访问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系高曼士(Thomas Coomans)教授担任评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主持讲座。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等出席了活动。

张剑葳老师首先说明了本次报告将集



中介绍中国古代的山顶建筑，而更为丰富的山居形态会是他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在正式开始之前，他展示了几组照片，由照片可见，从世界范围看，圣山崇拜与山顶神庙（或其他具有精神性、纪念性的建筑）

建设是许多文明共有的行为。那么中国建筑是否也有这样的形式呢？汉族传统风水理论讲究“藏风聚气”，山顶并非理想的建筑场所，但山顶建筑（如在云台山主峰茱萸峰、北京平谷丫髻山、京西妙峰山等处的遗址）却比比皆是。为何易县老奶奶庙香火极其旺盛？平坦的北京城内有“五顶”，“顶”的概念又从何而来？张老师表示，围绕着山，有深厚的文章可以做。

具体到山和建筑的关系，人类学家对此有敏锐的观察，他们认为企图在山顶盖庙或以山为庙，是代表民族文化差异、具有巨大理论思考空间的问题。世界上多个文明都有关于圣山的传说和论述，人类学和宗教学对建筑与山的关系非常重视，可以上升到历史宇宙观的高度。如宗教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就认为山是人文世界中人赋予周边环境秩序与意义的媒介。

切换到中国的认知体系可知，中国古代对山的概念，其实是站在空间的关键点，赋予了周边环境秩序和意义——“岳”和“镇”就是典型代表。《禹贡》把中国分成九州，为九州配了五岳四渎；开始是五岳四镇，后来是五岳五镇。镇和岳也会有变化——《尔雅》中五岳就有两种排法，分别代表秦和汉的疆界思考，这一点李零老师有很好的解释。各地都有自己的“岳”或“太山”，承担着地方文化和空间认

知中的关键位置。

关键点确立之后，如何使用这些山巅来表达对山或者说对天的崇敬呢？秦皇、汉武的方式是巡狩和封禅，如《史记·封禅书》记录，秦始皇祭祀主要是东西两部分，西方是秦雍四畤，东方是五岳四渎、齐八主祠；汉武帝祭祀西方雍五畤、长安太一、甘泉太一、汾阴后土，东方同样是五岳四渎、齐八主祠。后来王莽的办法是在首都郊区立坛，郊祭天、地、日、月、社稷、祖宗等。投龙是与此相关的仪式。张老师举了甘肃鸾亭山的考古资料，并结合《汉旧仪》等文献，指出鸾亭山山顶和半山的祭坛建筑有可能是秦、汉的西畤。然帝王封禅、投龙，却不在山顶盖大庙。岳庙、镇庙一般都在山坡、山脚或城中。这与使用者的目的有关——祭祀这些被视为自然与神界交界之处的神圣山川，象征性地宣告对建立王朝和创造世界的掌控。帝王的实际目的是政治性的，达到其目的即可，却不必在山巅进行大规模建设。

接下来张剑葳老师指出一个现象，即我们现在对山顶景观的印象，似乎与之前



所列的汉唐以来的山顶景观都不相同。这是因为，元代以后，中国的这些山顶建筑景观发生过比较大的改变。我们现在看到的山巅神庙等山顶建筑，基本都是明代帝王推崇以及民间流行的真武信仰、碧霞元君信仰的反映。不仅小区域的山巅，就是东岳、北岳、中镇等重要的山也不能“幸免”，山顶都按上述信仰建了庙宇。

燕王朱棣夺位后，真武信仰作为他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被发扬光大。永乐年间开始修筑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明代动用国家力量一次性规划营建的规模最大的建筑群，其中金殿是点睛之笔。受此影响，此后许多山顶都建造铜殿，称为“老爷顶”或“金顶”，成为该地区的真武信仰中心甚至跨区域朝山进香的所在。相关信仰人群、香会的来源地分布及其组织，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权力运作。金顶（山巅金殿）的符号功能渐渐超越其建筑形式本身，与之类似的还有万历时期皇家推崇信仰的碧霞元君信仰。这也解释了之前的问题，北京的两个著名金顶和五顶，其实就是早期的坐标观念加上明代以来流行信仰的反映。

梳理清晰历史时期山顶建筑的脉络之后，张老师进行了方法论的总结。他指出，在观察山顶建筑时，我们先认识到建筑本身抗风、增强顶部平台的坚固度和可用面积的这些物质技术层面的需求，但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关注到山顶建筑作为精神中心的意义。其代表的信仰有着各不相同的辐射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着消长演替，交织成立体的网，反映并影响着人与社会的进程。由此最终可以归纳出一套由“物质和技术→精神的中心和网络

→人和社会”逐级深入的认识框架。他希望能用这样的认识和分析方法，对早期建筑考古研究有所推进。

带着这套方法论，张剑葳老师回过头来分析青铜时代的山顶建筑，重点分析了陕西辛庄和李家塔两个早期山顶遗址。最后，张老师播放了山顶考古调查的航拍视频，他感慨道，在研究山顶建筑时可以感受到从古至今一层层的累积，同一座山巅，从龙山的石砌遗址到商周的夯土建筑，还有历史时期晚期的石头小神庙立在山顶。

“一探铲下去，三千五百年，我们知道山巅建筑的传统就在这里代代相传。忽然就很感动。”

随后，评议人高曼士教授介绍了西方经典的山顶神庙形式，以及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东、西方山顶建筑的碰撞和融合。提问环节气氛活跃，许宏研究员等多位听众来宾提出了关于山顶建筑问题的学术见解，与主讲人和评议人进行了充分的互动。

在最后总结时，张剑葳老师表示这几年持续爬了不少山，他的基本思路是想根据地理单元来做长时段的研究。当我们看清楚长时段的历史传承叠压后，才能明白其中的价值，并思考该怎样去延续这样的传统。当下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延续，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加入，一起周行天下，一起看大山大河，一起勇攀高峰。

（撰稿：卫珉璇）



## 16

王娟：  
国族建设中的“边疆”——近代康巴藏区的政治整合

2017年4月13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娟助理教授作了题为“国族建设中的‘边疆’——近代康巴藏区的政治整合”的讲座。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担任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社会学系田耕助理教授等出席了活动。

王娟老师从“何为中国”的问题切入，首先探讨了边疆对于理解“中国”的重要意义。她通过三张地图分别展示了“作为方位词的中国”（五服图）、“作为天下王朝的中国”（国朝天下輿地全图）和“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图），并以此说明：“中国”的概念在产生之初就离不开对“边”的理解；在漫长的历史中，“边疆”始终是理解“中国”的重要线索。

之后，王娟老师说明这次讲座的内容所关注的是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形态的转型，也就是在从“作为天下王朝的中国”转变为“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的过程中，中心—边缘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关涉到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政

治合法性问题。她指出，这个过程是更广义的“国族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对于从“多族群帝国/王朝”脱胎而来的现代多族群国家来说，“国族建设”的过程会包含两个维度：纵向维度是国家力量伸入基层社会，横向维度是边疆一体化，可以将其对应为中国社会科学中两个重要的研究传统：“乡政”和“边政”。

王娟老师着重探讨了如何理解“边政”的问题。她指出，不应将“边政”狭隘地理解为治理术，而更应关注其思想基础。在王朝时代，无论是天下的想象，还是羁縻的原则，所关涉的都不仅仅是治理效率的问题，还反映了华夏对于合理的天下秩序的理解。同样，在中国的近代转型中，“边政”应该被视为在新的内、外环境中尝试如何“在普遍性中安置特殊性”的努力。

此后，王娟老师描述了一个具体的边疆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边康区——在清初以降的边疆形态转型过程，由此来展示上述对于中国近代“边政”问题的理解。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边政被比喻为一场实验，实验的目标是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给边疆和边人寻找一个合适的定位。这个定位的过程并非单一国家意志的体现，而是一个多方参与、互动的过程。

川边康区的定位过程被分为四个阶段。



清代的体制代表了王朝时代的边疆形态，可以概括为“普遍性秩序+制度化的特殊性”。具体而言，在清廷的“内地—藩部”体制中，康区一半属内地，一半属藩部，并无独立行政地位。川边康区属于内地体制中的“土司辖地”，没有官方认定的“活佛”世系。同时，它是清廷土司制度的最远端，土司权力最大，流官影响力小，且改土归流的时间最晚。清廷对康区的定位是“联结内地与卫藏的通道”，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是从属于王朝的“西藏战略”的。这一定位决定了在文化等级上，川边康区被王朝中央视为蛮夷，其藏传佛教传统并未受到尊崇和重视。地方上的民间传说反映出地方社会亦认可自身的通道角色。同时，川边康区的地方社会上，最重要的力量是土司、头人和寺庙，遵循内部竞争的行为逻辑，地方首领都善于通过与外部力量的“周旋”来维持自治乃至扩大势力。川边康区的通道地位和地方社会的内部竞争逻辑

促使其成为此后边政实验展开的舞台。

晚清普遍性秩序的丧失导致上述体制解体，从1905年改土归流开始，川边康区的边政实验先后尝试了三种国族建设的模式：

改土归流代表了第一种模式——全面消除特殊性，体现在行政体制、文化定位、身份塑造三个方面的全面华夏化措施。改土归流的强制性行政、文化改造虽然没有长期持续，但带来了地方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土著精英阶层的分化，出现了出身平民、接受现代教育、在中央政府担任官职的新精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刘文辉主政川边康区后的边政措施，代表了第二种模式——“新的普遍性秩序+随机的特殊性安排”。“新的普遍性秩序”是全国同一的行省体制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随机的特殊性安排”反映的则是多种力量——国民政府、中国共产



党、地方实力派、旧精英、新精英、内地知识分子——参与这一时期的定位过程。这一时期的定位在行政体制体现为将土著改造为流官的努力，在文化地位上体现为内地知识精英对边疆文化的全面重评，在人群身份上体现为地方实力派和新精英对康人身份的塑造和利用。这一时期的边政实践更像是一场进行中而没有得出结果的实验。

1950年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制度和政策，代表了近代边疆整合的第三种模式——“新的普遍性秩序+制度化的特殊性”。在以阶级解放和民族平等为新的普遍性秩序的基础上，新政权在行政体制上取消汉官制度，并通过民族识别、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土著社会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的文化地位与人群身份予以制度化的确定。这表面上结束了民国时期的漫长实验，但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秩序，

尤其体现在对阶级解放和民族平等两个理念的矛盾关系上，后来又进行了多次的反复。

最后，王娟老师以三句话对讲座的主旨进行了总结：对“中国”的理解离不开对边疆的理解；边政是一种对合理的内外秩序的探索；中国近代的边疆整合是一场漫长的实验，目标是在现代国家体制中给边疆和少数民族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positioning），这同时也是在重塑“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内外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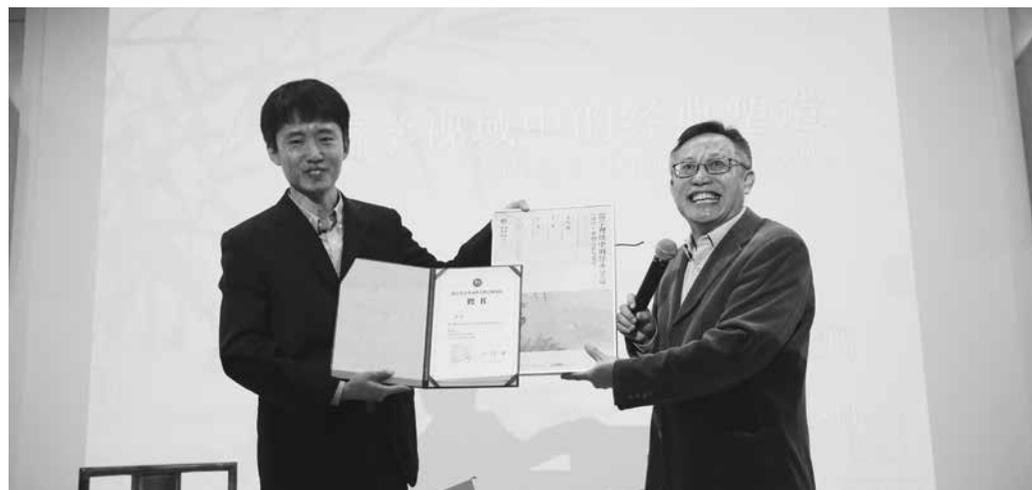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王铭铭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评议。他认为，讲座非常精细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由“天下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尤其可贵的是分析了地方精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关注到了当地社会结构这一内生性的因素。同时，他还从如何定义边疆、如何看待康巴地区的政治—社会联结方式以及如何区分新旧精英等三个方面提出问题，展示了人类学对于人类理想社会状态的思考。王娟老师援引康区自身发展的历史和当地精英成长的实例，回应了以上问题，并强调边政实验、边疆整合并非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进程，而是各类行动主体根据社会形势、自身利益等社会情境不断互动的过程。

（撰稿：唐元起）



## 17

### 孟庆楠：儒学视域中的经典塑造——《诗经》中的心性与教化



2017年4月18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庆楠副教授作了题为“儒学视域中的经典塑造——《诗经》中的心性与教化”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张辉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常森教授评议。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出席了活动。

孟庆楠老师的演讲从一个问题切入：《诗经》是怎样一部书？按照中学语文教材的解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收录了《关雎》《蒹葭》等缠绵悱恻的诗歌。这构成了大多数人对《诗经》的第一

印象。但同时，现代生活中残存的一些印记表明，《诗经》是与德行的确立有关的，对《诗经》的谄习关乎家族的长久传统，故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而这样的功能并不是一部诗歌集所能承载的。事实上，在古代学术谱系中，《诗经》并没有被归入“诗赋略”或“集部”，而是作为六艺之书或经学典籍出现的。孟老师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一则材料，进一步说明了古人对六艺经典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诗》《书》是“义之府”，礼乐是“德之则”。六艺之书汇聚着古人对于天道、人伦、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是“王教之典籍”。在这个意义上，《诗经》才具有“继世长”的功用。而《诗经》的文学意义与经学意义之间的张力，也暗示着



《诗经》的经典意义是一个被塑造的结果。

儒家作为《诗经》最主要的传承者，对其意义塑造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孟老师随后简要介绍了儒家兴起及其传承六艺之学的背景。孔子之时，礼废乐坏。经典之书既然承载着礼乐所维系的社会基本秩序与价值，礼乐的废坏则必然导致经典的破坏。面对这样的礼乐传统及其现实危机，诸子各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坚定地采取了维护周代礼乐文明的立场。孔子言称“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便是表明此意。而维护周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手段，就是传承那些凝聚着礼乐基本秩序与价值的文化典籍，“以六艺为法”。当然，儒家对于周礼及经典的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要应对礼废乐坏的危机、应对其他学派在理论上的挑战，就必须对周礼及六艺经典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作出深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周礼有所损益。

在这样一种理论诉求之下，《诗经》的特质受到了儒家的重视。在儒家看来，

每一部经典都有其特色。而《诗经》的特色就在于能“言志”。“志”的含义十分丰富，心之所持的各种情感、意愿皆可称“志”。而《诗经》就是众多诗人内心志意的真实呈现。因此，《诗经》成为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而儒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切正是其理论展开的重要方向。孟老师接下来即从儒家所探讨的礼乐之原与王道教化两个问题着手，分析、呈现儒学理论对《诗经》意义塑造的深刻影响。以早期儒家对《关雎》的诠释为例，可以看到，儒家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探讨外在的礼乐规范得以确立的根源或依据。上博楚简《民之父母》中提出了“礼乐之原”的说法，对“礼乐之原”的阐发是通过“五至”说完成的。所谓“五至”，即是物、志、礼、乐、哀依次展开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次第中，志是对外物的应激反应，而礼乐则是对志的某种安顿。因此，如何在礼乐中安顿人的情志，就成为了儒家思考的重点。早期儒家对《关雎》的某些解读即体现了这方面的思考成果。以上博楚简《诗论》

及马王堆帛书《五行》为代表的儒家文献，明确将《关雎》所言之志理解为君子思求淑女的“好色之愿”，但二者并没有对这种自然情感采取压制的态度。《诗论》要以琴瑟、钟鼓之用，将“好色之愿”引导、收纳于礼的规范之下。《五行》说文则是强调在思色甚急的情况下，喻知对礼法的畏惧，从而自发地克制思色之心。《诗论》《五行》对《关雎》的解读，体现了儒家在安顿人情方面的细腻思考。

儒家的另一个理论特色，在于教化学说的提出。在儒家看来，要让百姓接受礼乐、道德的规范，并不能依赖于强制性的要求。以刑法、政令要求百姓，只能使百姓在言行上符合规范以避免惩罚，却无法形成内在的道德意识。儒家主张为政者自为典范，以自身对道德、礼法的遵守来影响百姓，这也即是所谓“风化”的作用。百姓自觉地效法模范，才能形成内在的对道德、礼法的认同。对《关雎》的另外一种解读，即体现着这一教化思想。《诗序》将《关雎》之义理解为对“后妃之德”的表彰。《关雎》所言“窈窕淑女”不再是一般的女子，而是后妃，后妃与天子的关系构成了天下夫妇的典范。具体而言，《毛传》《郑笺》的解读又有所不同。《毛传》认为，“窈窕淑女”即指后妃，后妃有“幽闲贞专”之德，是君子的好的匹配。君子思求淑女，不是思其色，而是思其德。《郑笺》则认为，“窈窕淑女”是指能为君子合好众妾之怨者的贤女。而寤寐思求贤女的不是君子，而是后妃。在毛、郑的解读中，《关雎》所表现的“后妃之德”在具体内涵上呈现出很大差异，但二者都借用了诗中固有的

思求之意。无论是君子思求后妃之德，还是后妃思求贤女，都发自于内在的真诚的用心。这使得《关雎》的典范意义不只是言行上的，而是深入于天子或后妃的用心。

孟老师最后总结指出，《诗经》作为经学典籍的意义，在于它规范着社会的基本秩序与价值。而这一意义的形成，有赖于解释者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深刻思考。正是由于《诗经》承载了儒家对于心灵、秩序与价值的根本性理解，《诗经》才有了王教典籍的意义。

随后，常森教授对演讲内容进行了评议。常老师表示，讲座能结合出土文献和存世文献来讨论传统和现代对经典认知的落差，十分难得。如何解读经典的意义，如何面对经典意义的塑造及其背后的动机，确实是经学史研究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常老师还就演讲中所涉及的文本释读，与孟老师展开讨论。最后，在场听众对“后妃之德”的具体内容、“思无邪”的含义以及经典阅读的意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孟老师和常老师作出了回应与解答。

（撰稿：孟庆楠）

## 18

## 萨尔吉： 藏译佛典集成史——文本、问题和方法

2017年4月25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萨尔吉副教授作了题为“藏译佛典集成史：文本、问题和方法”的演讲。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段晴教授担任主持，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评议。

萨尔吉老师首先谈到了选择讲座题目时的心路历程：最开始拟将《甘珠尔》和《丹珠尔》作为讲座题目，但担心大家对这个名称不是很熟悉，又担心用汉文“大藏经”的说法不很严谨，最终采用了较为中性的“藏译佛典”这一名称。之后萨尔吉从文本、问题和方法三个大的方面，为大家系统梳理了藏译佛典的集成。他指出，藏译佛典的构成有两大部分，即《甘珠尔》和《丹珠尔》，“甘”指佛语，“珠尔”是译文的意思，一般称之为“佛语部”，即三藏中的经和律的部分。《丹珠尔》即论典的译文。本次讲座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甘珠尔》和《丹珠尔》的集成，但更为侧重《甘珠尔》的部分。

藏地译经的历史十分悠久。从7世纪

开始，中间经历了两次高潮，到18世纪基本结束，是一个跨越千年的伟大工程。翻译所依据的底本大多是印度梵语，唐代的时候也使用过汉语底本，同样还有一些其他语言的，比如于阗语和巴利语，但这两种都只有相关记载，并没有发现相对应的底本。在译场组织方面，藏文材料中虽没有像汉文译经史上那样详细的记载，但应该也很严密，大多数翻译都是由印度和西藏两地高僧合作完成，并且会经过多次校订。翻译到达了一个量就会出现一些统一规划，这就产生了9世纪的《翻译名义大集》以及《声明要领二卷》，书中对梵藏佛教用语翻译的词汇以及一些翻译原则进行了规范。这些规范影响巨大，从吐蕃时代一直影响到了后弘期。吐蕃时期没有对佛典集成的完整记录，只能通过当时的经录，从侧面了解译本集成的历史情况。现知的经录共有三部：《旁塘目录》《丹噶目录》

和《青浦目录》，目录的题名都是以吐蕃赞普的行宫为据，所以这些经文的储存地点即赞普行宫。《丹噶目录》一直流传至今；《旁塘目录》失传了一段时间，后有一个抄本在西藏档案馆发现，2003年出版；《青浦目录》已彻底失传。之后萨尔吉老师对这三个目录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这些目录的分类基本上是根据大小乘、藏、及部帙为原则，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汉译目录学的影响。虽有了大致分类的框架，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些部类是根据标题来划分，像禅定书；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区分佛语和注疏，比如《法句经》从名称和内容都像是佛所说的，但按照记载是一个印度僧人记载的佛语录，这一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同经异名的处理方法，当时采取的原则是，只要是属于同一个部类的都放在一起，但这种原则后期被打乱了；第四个问题是对密教典籍的理解和编目的问题。随着敦煌文献等古文献的不断发掘，我们可以不断去发现其中有效的信息。

从朗达玛灭佛到10世纪期间，藏地佛教发展是一片空白。从后弘期开始，佛教逐步复兴，这期间有影响力的目录共有两部——“菊登日比热赤目录”和“布顿目录”。萨尔吉对这两部经典的结构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菊登日比热赤目录”的分类原则与吐蕃时期基本一致，略有细化。“布顿目录”则自成系统，从法的角度分了四个部类。这两个主要目录构建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大致雏形。之后萨尔吉对《甘珠尔》和《丹珠尔》的产生进行了梳理。据藏族史书《青史》中的记载，《甘珠尔》

和《丹珠尔》的编撰与菊登日比热赤有关，是他带着徒弟对那塘寺以及周边的佛经进行编目整理的。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成立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出现不无关系，由于元朝皇帝派人对接藏目录进行对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藏译经典，这个举动可能影响了整个西藏的佛经编纂。

接下来萨尔吉着重介绍了《甘珠尔》的各种抄本、刻本。最早的是那塘古本，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编订的藏译佛典集成。也许是因为仪式的需要，从那塘本开始，《甘珠尔》和《丹珠尔》开始分立。《甘珠尔》写本包括蔡巴写本、藤邦玛写本、内府写本以及一些地方写本，每一个版本都有独特之处。蔡巴万户长以那塘古本为底本，对佛语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并增加了前弘期的旧译密教经典。藤邦玛写本是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主持抄写的，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及蒙古国乌兰巴托国家图书馆都收藏有这一版本的复抄本。内府写本则包括明景泰年写本，康熙、乾隆年间写本，其中又以康熙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最为精美。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写本。

《甘珠尔》刻本主要有永乐版、万历版、理塘版、北京版、卓尼版、德格版，以及一些近代版本。其中永乐版最早，但其原板已经被毁。万历版在波兰的班铎藏品中发现了部分印本。北京版各个印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日本影印出版的北京版是德格版正式出版以前学界利用率最高的《甘珠尔》版本。德格版是清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一年由德格土司丹巴泽任在德格刊刻的，



共 103 函。刻板现存德格印经院，是刻板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基础。到现在印经院依旧还是在用传统的方法印制经文。德格版的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晚的经典是在乾隆时期翻译的。

《甘珠尔》分为六个部类，《丹珠尔》分为十八个部类。对于《甘珠尔》诸版本之间的关系和谱系研究，萨尔吉介绍到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诸版本有一个共通的源头，一种认为早期版本之间是平行关系。

对现在待研究的问题以及我们可以采取的方法，萨尔吉进行了一个总结。问题主要有五点：第一是入藏所采用的译本，虽然藏译佛典中很少有同本异译的情况，但也存在，译本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会反映出编撰者的取向；第二是对于同一部类中单经的处理；第三是入藏的标准，比如宁玛派的经典究竟是否应该入藏；第四是具体部类的归属；第五是同一个部类中经典的顺序。在具体研究中可以从三个方面入

手：第一，从宏观方面入手，检视与经论集成有关的历史文献，包括教法史，传记及目录；第二，分析每一传本中经典的分类、排列，以及单经的组织形式；第三，从微观层面入手，通过校订单经的形式，尽可能多地搜集经典的不同传本，运用传统的文本批评的方式解决文本中存在的异读，并给予合理的解释。

最后萨尔吉对今后的研究任务进行了展望。现在地方写本的调查基本都是国外学者的成果，国内还有很多寺院存有重要的版本，如果能够以联合调查的形式公开资料，会有助于学者们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另外可以在进行微观层面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交叉研究，这是一个迫切的任务。萨尔吉鼓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为藏译佛典集成史的研究奉献自己的力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沈卫荣对本次讲座作了评议，他认为萨尔吉的讲座内容非常详实丰富。写本研究在藏学界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题目，很多学者一辈子都在作相关研究。萨尔吉的讲解让大家对藏译佛典的集成有了一个最全面、最前沿的了解。藏译佛典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对整个佛教研究都有着重大意义，学界应该更加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沈卫荣也希望萨尔吉未来能够开设相关课程，让大家有机会进行更加全面的学习。

(撰稿：李晓楠)



### (三) 北大文研论坛

19

#### 刘守英： 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



2017年3月13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九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为新学期该系列第一场，此次论坛以“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研究所王小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中国农业

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王健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路乾博士等莅会并参与了讨论。

刘守英教授在主题发言中，首先对“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这一主题作了解释。所谓“城乡中国”，是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转变的中间过程。他认为，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大变迁，中国社会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城乡中国将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城乡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同；另一方面，关于当下中国土地问题的争论陷



人极端化，这源于长期以来的土地问题意识形态化、对乡土中国土地制度特征的长期误传和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认识不足。

刘教授认为，乡土中国的土地问题有如下几个特点：人地关系都落在土地上，家本位所有制的小农经济，田面所有权为大的产权结构，土地复杂功能下的土地市场，小规模农地经营制，村庄制度规范公私秩序，皇权只收皇粮不犯地权。总之，中国既从土地中长出光荣的历史，也受土地的束缚。在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乡下人的离土和出村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国家工业化时期，农民被合作社困在土地上，为城市提供需要的一切。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兴起，内地工业化开始衰败，农民开始出村，传统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地域的大规模流动，“农二代”成为迁移的主力军，回流的农民也并未回村。“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乡土成故土，乡村成为不舒心的记忆。农用地经济重要性下降，非农用地价值大幅上升，因此政府与农民争夺土地发展权成为城乡主要矛盾。1998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堵塞了农民自己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乡村发展权丧失，

政府垄断了土地的发展权，并获得了巨额的土地收益。在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面临考验，城市化从单向转向城乡互动。刘教授认为，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一是固守乡土中国的土地本位理念，二是以城市中国思维配置土地。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历史使命，它为农民自我革命、为实现畅通的城乡互动、为农村转型、为乡村演化提供制度支撑。急需进行的土地改革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城乡土地权利体系与城乡互动，农地制度与农村转型，宅基地制度与村庄再造。

讨论环节，周飞舟教授认为，刘教授突破了把单个农民和他对土地的产权作为思考的重点的“农民个人主义”的视角，体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思路。王小鲁研究员认为，在土地改革之后，粮食产量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特别是走到高级农村公社之后，农业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原因主要是农业合作化没有尊重农民的利益。包产到户在没有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了农户，根本改变了农村的激励机制，粮食产量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大幅度增长，但是随后增长开始减慢。现在农村面临的问题是农村经济不足以养活农民人口。如何将农民转变为城市人口，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宅基地和土地仍然对农民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轻易否定。一些人鼓吹重新集体化，其实背后可能有既得利益的问题，不一定真正代表农民利益，集体已经徒有虚名了，再强化集体显然是不合适的。农民的土地权利应该坐实，

并且土地可以转让，否则农村该振兴起来的地方振兴不起来，农民该有的权利得不到，闲置土地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我们很多政策尽管是以保护农民的面貌出现的，实际上却是在损害农民利益。总之，农民的土地权利应该明确。开放农村土地市场，长远来看有利于农村的振兴，有利于农民利益的保护。

党国英研究员赞成刘守英教授揭示的农村发展的趋势，并针对刘教授的主题发言提出了一些问题：第一，现在谁种地需要更具体地判断，田野经验表明似乎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不种地，很多地方是由专业化的年轻人种地。第二，家庭本位肯定不是集体主义，可能仍属于私有制的一种。中国是多子继承制，相比于中国，欧洲的这种传统似乎更强。第三，关于最后提出的改革，现有制度下，效率、平等、稳定三条施政准则都没有达到目的。建国以来历史上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区别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权力配置的问题上还需要重新思考。

应星教授针对刘教授的发言谈了几点体会：首先，“城乡中国”的概念值得思考，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是两种逻辑，现在的分歧是要么回到乡土中国，要么用城市中国来改造。刘教授告诉我们传统的乡土中国已经回不去了，但是用纯粹城市中国来改造也有巨大的问题。“城乡中国”其实可以概括为“城乡之间”，给我们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其次，土地产权具有模糊性，20世纪80年代的模糊性曾经带来了一种活力，但是这种模糊性的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这种产权的模糊性已经面临新

的考验。再次，农民的公平是多层面的：第一是农民自己生活的公平，第二是农民之间的公平，第三是农民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公平。第三种公平在过去不被农民重视，但是今天“农二代”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城市的，农民的公平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最后，经济学家重视土地和农民，对农村关注较少。村庄不仅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一个习俗、生活方式等多重的世界。

张静教授认为，农村的变化最重要的还不是效率问题，近年来耕地的减少并没有带来粮食安全。乡村制度的变化主要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政治问题。一切辩论最终都会归结到制度问题。最近这些年，农民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定，不应从动机出发，而是应该从结果出发。很多具有保护性动机的政策，都在伤害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应该认清什么才是农民的真正利益，什么才是农村发展的方向。

路乾博士认为，刘教授的发言超越了经济学与社会学，而是从观察出发；借用了费孝通的研究方法，又超越了费孝通的若干概念。现在的辩论常被一些概念误导，例如“三农”问题将农业、农村、农民捆绑在一起，就误导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再如资本下乡的概念也非常复杂，用一个概念把他们涵盖，整体地肯定或否定，也是粗略的。王健博士认为，将土地权利分为三种较为粗略，分法应该进一步地细化。

（撰稿：熊峰）



20

## 李孝聪： 下鞍进房——游牧民族在中国城市规划上的贡献



2017年3月16日晚，“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期“下鞍进房——游牧民族在中国城市规划上的贡献”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邓小南院长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辛德勇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文研院邀请学者许宏教授等学者莅会参与讨论。

邓小南教授表示，“下鞍进房”是谈游牧民族在中国城市规划上的贡献，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历史地理学、民族史、都市史等，都是跨学科的重要学术领域。希望借助本次“文研论坛”的机会，提供

一场眼界开阔的学术盛宴，也非常期待各位学者，包括我们的与谈教授，组织一次启人心智的精彩对话。

李孝聪教授就论坛主题发表引言：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现象，可以从形态和功能上来给予阐释。城市的形态和功能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人的互动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环境、城市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反之，我们也可以通过历史城市的解构，去了解过去时代的城市的社会结构，探究当时人的活动。城市是从氏族社会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似乎是农耕社会的专利，但是在中国几千年都城发展史上，三个具有划时代的都城形制却是由马背上的民族所创造，为都城规划和管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迄今依然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三个划时代的都城形制分别是：鲜卑人创造的封闭的坊市制都城（从平城到洛阳）、蒙古人设计出街道胡同式都城（元大都）、女真人施行满汉分治式都城管理（北京城）。

首先，鲜卑人的都城通过规划里坊区、构筑坊墙来对城市生活进行封闭式的管理，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阶段性形态特征的开始。北魏移都平城之前，多数鲜卑人以毡包游牧为俗。这个过程并不因营建平城而马上改变，随后北凉沮渠氏和北燕冯氏属下的汉人迁居到平城地区从事农业耕作，

才促进了北魏城市的营建，也正是这批汉人，将中原、河西和江南都城的营造范式传递过来。北魏营造平城时，曾以汉、魏、晋邺城、洛阳和长安等中原都城为蓝本，但也融入了鲜卑民族的旧俗。在城市内划分里坊进行管理，用坊墙来隔离，正是实现拓跋鲜卑君主意念的绝好方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希望遵循“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的中原汉式统治术，但是因为洛阳旧城狭窄，宫苑、官署已占据相当多的空间，无法再容纳更多的市民，遂将众多平民安置在旧城之外居住，以里坊划分身份、物业，而不以胡汉种族相别，并加筑外郭城。显然还是希图用划分里坊、修筑坊墙进行封闭式的管理，以控制和保护城市编户。这一制度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完全赓续了北魏洛阳城、北齐邺南城在郭城内划分若干坊、市的规划和管理，并从法律条文上对都城管理加以制度化的肯定，使封闭的坊市制都城达到鼎盛。李孝聪教授指出，我们不应仅仅从社会形式上解读隋唐城市空间形态对北魏、周、齐的继承，更应该看到用坊墙封闭的坊市制度这种城市规划的目的，是为适应隋朝和唐朝这种律令制国家的法律制度，便于登记户籍，对城市实行有效管理的措施。

其次，蒙古人设计出街道胡同式都城。元大都城门内的大街构成全城主干道，主干道相交形成若干长方形居住区，居住区中又有等距离东西向排列的若干条胡同，组成整齐街道体系。过去曾经有学者推测胡同的含义是蒙古语“巷子”（Qudug，

Gudamj St.）或“水井”（Hudag），二者的蒙古语发音很相近。李孝聪教授结合自己在蒙古共和国的考察经历，指出元大都里的胡同指的就是横的小巷。历史上每当马背上的民族迁入城市，转变成定居的住户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平均分配宅基地纳入户籍管理的过程，我国的城市管理可以对此有所借鉴。

再次，女真人施行满汉分治式都城管理。清朝在同一座城市内实行满城和汉城分治，用栅栏封闭街巷，置汛兵守卫，所以北京才有大栅栏、二栅栏、四栅栏这些名字。李孝聪教授指出，清朝实行八旗制度，凡是有旗籍的人，无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住在北城，就是原来的西城区和东城区；而没有旗籍的人，无论官品多高都得在南城居住，即原来的崇文区、宣武区。清朝的满汉分治，依然是马背上的非农耕主体民族征服中原后在心理防范上的回声，故采用此种措施来强化城市社会管理。清朝能够获得王府府第者，必须有八旗旗籍，所以王府全部座落在内城里。清王朝解体以后，原来属于皇亲国戚的王府纷纷改作机关、学校，绝大多数的政府机关、学校、公共部门就集中在东城区和西城区，数目远远超过南城。以王府为代表的北京旧城功能空间的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影响到北京的房地产。

讨论环节，辛德勇教授认为，所谓马上民族或草原民族对中国古代城市设计规划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是在特殊的民族关系下的一种军事镇压功能，辽的投下军州可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将这一课题



放至长时段看,对它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更加清晰。辛德勇教授以汉代长安是否存在坊门和宵禁制度以及出土文献中所见地方城市和乡村的门禁制度为例,指出北魏创立的里坊制度之前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属于量的或实质性的变化,还是一个创制性的,值得深入思考。这样看的话,北魏鲜卑人对坊墙可能有进一步的规整。同样的问题还涉及元代的胡同制,胡同制肯定跟蒙古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在对之进一步分析时,还是应将它放长一个时段,追溯北宋打破坊制后的街道形态,以此分析比较宋代街道形态和元大都胡同形态的相似之处。此外,辛德勇教授还强调应从更广的视角——如内亚视角,来考察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外在因素。

杭侃教授指出,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流启发和研究方法的阐述是非常重要的。探讨地方城市有没有墙,实际上涉及方法论的问题。考古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未经考古发现的事物也并非不存在。正因如此,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文献、制度、考

古等知识很重要,常识也很重要。杭侃教授指出,元大都胡同制度方面的重要文献《析津志》的作者熊梦祥是南方人,胡同很可能就是南方的“弄”。随后杭侃教授以苏州和福州古城为例,推测从里坊制到打破坊墙之后的长巷式,认为这种形态也有可能存在于中原地区甚至南方地区。

党宝海副教授从三个方面评述以元大都为代表的街道胡同式都城。首先,游牧民族对都城的理解与汉人是不同的。蒙古帝国皇帝待在都城中很短,很长时间围绕都城巡游。真正把游牧帝国的首都发展到一个顶峰的人是忽必烈。忽必烈营建元大都,是结合《易经》及民间信仰来进行设计的。就总体格局而言,元大都是一个汉式的城市,忽必烈也能够接受这种设计。不过,忽必烈每年待在元大都的时间最多半年,他对城市的理解仍然秉承他的祖先。其次,元大都的建立与游牧民族皇帝的个人喜好关系密切。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讲,忽必烈选址元大都不是偶然的,在此选址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游牧、狩猎的生活。

同时,元大都的真正中心是在今天的北海和中海,以此为中心建立皇城,核心区的确立跟游牧民族皇帝个人喜好是有关系的。游牧国家的都城设计有两个维度:从微观角度看,都城的整个基调和格局是汉式的,其中存在一些游牧民族痕迹(如清代的堂子、元代的巴扎);从宏观角度看,整个都市的基调还是由游牧民族的视野、眼光决定的,如元代的都市圈——大都市之间分布很多行宫园囿宏观的一个区,所以应跳出汉式都市固定的视野。再次,党宝海

副教授表示同意李孝聪教授的观点,认为将“胡同”解释为水井是错误的,《析津志》中记载的“胡同”,可能出自方言。

许宏教授最后发言,他指出自东汉洛阳城以后,都城形成了三个特点:纵贯全程的大中轴线、严格的里坊制度和齐备的城郭。“大都无城”显现了华夏族团历史上上升期的文化自信,北方民族的都城反而重视防范。

(撰稿:李灵均)

## 21

### 侯旭东 & 刘后滨: 汉唐皇帝制度的比较:以皇帝角色与君臣关系为中心



2017年3月17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一期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汉唐皇帝制度的比较:以皇帝角色与君臣关系为中心”,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作主题发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国学院张耐冬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江龙博士、张祎博士、孙正军

博士，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张雨博士，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孙梓辛莅会并参与讨论。

叶炜作为本次论坛的召集人，首先阐释了本次论坛的意义：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史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学界对于皇帝、皇权制度的研究相对减少。而近年来很多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构造社会结构上占有重要权重。同时受到西方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影响，皇权问题再度被学界关注。总体来看，对于皇帝制度的研究，主要有抽象的研究与具体的研究两个视角。抽象的研究如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以及部分礼制研究等。具体的研究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政治史为主的对皇帝个人的研究，以人物传记为代表。这类研究重事件，轻制度，在欠缺比较的情况下，体现不出时代的政治文化与制度环境对皇帝的影响。另一类是制度史的研究，这类研究大部分以皇帝为背景，而不是将其作为主角，但是对于皇权运作的揭示更为深刻。近些年来关于皇帝制度的研究又有一些新的亮点，例如对空间的考察、对政务信息流转问题的关注、对日常政务中皇帝与皇权问题的重视和对制度环境与政治文化的研究等等。他认为，理论上各个时代皇帝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技术层面又多有不同。本次论坛邀请了研究中国古代史多个时段的学者，希望能够通过讨论将皇帝制度



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侯旭东从王莽的肉羹和惠帝的肉糜谈起，认为皇帝看似在国家政治中是一个支配者，但很多时候也会被官吏蒙骗。皇帝的空间除了以往所理解的静态的宫禁制度外，还有动态的即出行时的空间。一般情况下，一个王朝开国伊始，皇帝还能够四处巡行，但是到了王朝中叶，皇帝能够巡行的范围就越来越小，即使能够巡行也被千乘万骑包裹着。巡行在当时的官员和后世的史官眼中都是被批判的，官吏用他们的口和笔塑造者皇帝，皇帝也有被支配的一面。总之，皇帝与编民是对立统一的：皇帝既是支配者，也是被支配者，与编户齐民的生活范围和自由度具有一致性。

刘后滨更偏重于从文书行政的角度看待皇帝角色的变化，着重探讨政务运行中的皇帝权力。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首先，皇帝是文书行政中信息与权力的最高分配者；其次，对信息的分配与处理机制决定着皇权的行使方式；再次，文书行政的发展趋势与皇权走向处理国家政务前台；最后，文书行政中的君相权力分割与制约机制。



在两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之后，论坛进入自由讨论阶段。孙梓辛认为，既往对于皇帝与皇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中能够阐发的问题是多重。对于皇帝，可以从名号、职位、个人、观念等不同角度加以认识。而对于皇权，学界的定义也不甚清晰：有的研究将皇权理解为皇帝个人的权力，研究其与相权、宫廷侧近、外戚、宦官等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将皇权理解为中央集权的代表，这种对皇权的定义与国家较为相似，在研究中常与地方相对应。无论哪一种定义，对皇权的研究都围绕着权力斗争。近年来对于皇权有一些新的视角，例如将权力理解为一种关系、从决策权的角度理解皇权以及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对皇权进行分析，等等。

吕博认为，以往对于皇帝的理解多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注重君主身份具有天子与皇帝的二重性，并且多从国家祭祀的角度展开研究。天子与皇帝的二重性制度是在汉代出现的，汉代继承了周代的天子和秦代的皇帝，将二者合而为一。历朝历代都在塑造皇帝的神圣性，但是相对于汉代，唐代皇帝制度的一个变化就是通过世系的神化、相貌的神化和生日的神圣化将皇帝塑造成宗教偶像，唐代的皇帝其实具有三重性。

赵冬梅认为，从文书行政的角度来理

解皇帝制度是以官制研究的方法为中心的，而官制研究方法最核心的就是循名责实。但是在政治中很多政务是实质性的，不同时期应对这些政务所使用的词语是不一样的。皇权是相当自由的，其表达权力的方式有很多，制度性的内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微妙的关系需要研究。

针对名实问题，张祎进一步阐发道：历史上很多事物，名词概念不同而实质上却是一样的；也有一些事物，名词是相同的但是实质上已经出现了变化。想要摆脱陷于名而惑于实的窘境，应该重新建构一些理论概念。过去史学界比较忌讳建立理论概念，认为这是后人强加的，很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古人的概念出发来理解古人。但是古人的概念有时会误导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跳出古人的概念，大胆地建构一套理论概念模式。

方诚峰认为，对于文书运行的研究，首先应该探讨当时行政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其次再讨论时人如何应对的问题。他还认为，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治体制来说，“以一治众”的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个基本的结构；赋予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特殊性的，并不在于行政方式，而在于意识形态或者说古人所谓的“治道”。

在论坛最后，叶炜指出，皇帝制度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本次短暂的讨论只是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一个开端，希望以后能够在此基础上就皇帝制度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撰稿：熊昕童）



## 22

## Andrä Wolter: 洪堡理念与德国大学的历史发展



2017年3月24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二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主题为“洪堡理念与德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德国洪堡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Andrä Wolter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担任主持，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曹卫东等参与了讨论。

陈洪捷教授作为本次论坛的召集人，首先阐述了本次论坛的意义，指出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生及建立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所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学成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典范，影响了现代大学的发展

进程，中国也深受其影响。在洪堡大学诞生250周年之际，举办专题论坛是对其独特纪念，也是对其大学理念在新的形势下的一次研讨。陈教授还指出，不仅从教育的角度研究洪堡大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德国思想史甚至语言学、美学的角度来看，洪堡大学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次论坛邀请了教育和思想等领域的资深学者，希望能够通过讨论将对洪堡大学的理念和德国历史发展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Andrä Wolter教授首先从洪堡一生的活动谈起，认为其在教育史上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他是一位人文学者，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哲学、语言学和文化史，尤其关注古典文化和国家及宪法的哲学。第二，

他还是一位政治观察家和一位政治行动者；他的研究涉及三个领域：宪法和国内政治、外交和对外政策和教育政策。

1809年2月起，洪堡从外交官调任为普鲁士王国内政部文化及教育司司长，掌管普鲁士所有的教育文化事务。在其短暂的任期内，洪堡改革了普鲁士的义务教育制度，同年创办了柏林洪堡大学，改革高等教育。洪堡提出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科学研究第一次成为大学职能。

今天，在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改变：民众对高等教育观念从无功利性转向社会功能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从精英阶层扩大到一般民众，这也彻底改变了学生群体的构成；高素质的职业型社会逐渐形成，劳动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日趋增加；高等教育体系从均质化转向多样化；大学从学术共和国转向管理型校园，大学机构也趋向国际化。

Andrä Wolter教授指出，洪堡理念对于现代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其对大学的基本理解并没有过时，但是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与改变做出不同语境下的新解释。第二，虽然在大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从个人品质培养向就业能力培养的转变，但是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仍然存在着显著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在Wolter教授的主题发言之后，论坛与谈人就在中国的立场上如何看待洪堡大学的理念问题展开了自由讨论。谢维和教授认为，威廉·冯·洪堡的改革对于德国大学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代中国教育也

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与当时德国的环境不同，19世纪德国约有1%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和导师可以共同进行科研；而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38%，每个老师可能都要面对几十个学生，一对一的学术指导难以实现。但是谢教授也指出他所理解的洪堡理念的核心精神是，教师应当注重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这或许比教学工作更为重要。

曹卫东教授认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很多挑战与机遇，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对洪堡理念在理论层面上的三种理解。第一，国内现有的研究对洪堡理念存在误解，国内主流观点认为大学及其办学制度不应受到国家干涉，这只是在操作层面上的理解；洪堡在《论国家的作用》一书中明确表示大学和国家目标一致，宗旨一致，而且大学恰恰需要从理论层面上承担起国家塑造和国家应该发挥的团结作用；第二，洪堡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教研一体，而且必须用科研来支撑教学。欧



洲当时流行的科学院，在德国被洪堡整合到现代大学当中。所以如果说18世纪是“科学院”世纪，那么19世纪就可以被称为“大学”世纪，纯粹的研究机构已经融入现代大学之中，这对当代大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三，当代高等教育面临一系列转型，洪堡大学理念同样如此。洪堡大学理念是典型的德国大学理念，并非全球理念。如何将大学与国家一体化、如何将大学精神与国家普遍精神

一体化以及如何将洪堡理念更多更深推广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在论坛最后，陈洪捷教授指出虽然洪堡理念在现代语境下部分过时，但其为现代大学提供的话语体系、制度体系、学术规则等依然影响深远。想要走出洪堡体系，就必须建立更符合时代的新体系。

(撰稿：卢雨枫)

## 23

### 姚洋： 理解当代中国——宪法、政党与国家

2017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主题为“理解当代中国——宪法、政党与国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汪丁丁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参与讨论。

姚洋教授首先探讨了正当政体的含义及原则。姚洋教授认为，正当政体应兼具合法性和正当性。正当政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政府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具有竞争性；其次，正当政体应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具体包括公民的表达自由、结社

自由和迁徙自由；再次是实现良治，维持良好的政治秩序，做出合理的政治决策并关注社会福利。

姚洋教授接下来从政治思想的角度阐释了西方民主化实践以及儒家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启示。混合政体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宝贵遗产。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三者统一于混合政体之中，其各自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的整合。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的政体也从《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精英民主转向过一人一票的普选机制。美国先贤们在规划美国联邦政体蓝图时，便提出了选拔重于代表的主张，《联邦宪法》也明确规定，美国是一个共和国而非民主国。今天的民主并非古代世界的民主，在美国的



联邦政体之下，总统由各州选出的选举人投票选举产生，而非由民众一人一票直接选出，这也就实现了“选拔”与“代表”二者之间的分离。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想主流是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他提出了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平等主义的三大基本原则。个人价值主张当代世界之下没有社会而只有个人。个人自决则成为决策的基础，由此“一人一票”的多数原则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姚洋教授强调，自由主义的各个原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并积极追求的，但彼此组合起来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人生而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加强。在政治生活中，公民在智性、信息、判断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自由民主基础上的平等最终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而远非现实。儒家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诚的现实主义关怀。儒家的政治思想首先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差异，但也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激发人的向善之心与进取情怀。从这种哲

学推论来看，儒家的主张无疑也是建立在精英主义之上的：在儒家的观念中，整个社会是一个由有序的组织 and 由层级构成的政体，在这样的层级制度下，进入某一个组织和层级都需要特定的资格。

从体制设计来看，选拔和决策由党来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分别负责代表和监督，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协三者也呈现出了“混合政体”的特征：人大和政协分别充当了混合政体下民主和贵族的成分；共产党主导资源的组织调配。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体制，首先要从西方“民主—独裁”二元对立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姚洋教授强调，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的政党代表其所在国家内特定的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则“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务实主义原则出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新状况相适应；与此同时，党员构成的多元化，也使得党从真正意义

上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今天的中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种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党发挥了中国古代中央制度及文官统治集团的作用，而从党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并拥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成文宪法”；而宪法、党章、政协章程以及其他党和国家的规范性法律和文件，则构成了中国的“实际宪法”。

姚洋教授主张，中国共产党体制高度制度化，首先体现在党内继承的制度化，完善的退休制度和党内分工保障了中共制度的有效运转。其次，党内权利分享机制十分完善。党内民主成功地将社会矛盾变成党内的讨论。在党内，对现实问题的大胆探讨往往受到广泛欢迎：党员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构成高度多样化，代表全社会的不同利益，党由此也成为全社会各方利益的“加总器”，有效调解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再次，中国共产党制度对宪法保持了应有的尊重，构建起了合理的党政关系。从选拔机制来看，党提供了一套完善的筛选机制。党内凝聚了一批有能力而且有意愿管理国家的人才，而从个人成长的微观角度来看，入党是个人升迁的必要条件，在党内也受到一定的监督和纪律约束。党内有着完善的升迁体制，“策略性相机权威”之下，升迁首先取决于个人的工作绩效和工作表现。

姚洋教授认为，“腐败带来经济发展”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政府作为“中性政府”，不长期代表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因此会比有偏政府更关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体制与官员选拔的

机制，对官员的责任给予充分肯定，而非片面强调问责。这也为官员提供了一种正向的激励，鼓励官员奋发有为、改善政绩。此外，中国共产党体制在分权和集权之间取得了平衡，财政高度分权的同时，中央仍掌握着官员的任免权，这迫使地方官员考虑其长远利益，清廉为官。

当前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和代表性。党对所有有志于民族崛起的人开放，官员之间开展业绩锦标赛，通过党内讨论的方式或实现民意的加总。虽然党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稍有欠缺，但在保持开放性和实现良治两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改进中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民意表达的制度化和推动政协的改进。民意表达的制度化，首先要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对政协的改良则要求政协肩负其监督中共的宪法责任，实现从清谈机构到真正监督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体制下，表达与选拔二者相互分离，这在充分保证选拔有效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制度性意见表达不充分的弊端。在自由社会之中，公民不仅有表达的权利，而且可以通过公共空间的个体表达和政治决策过程进行表达。由此反观中国共产党体制，姚洋教授主张，党的领导下依然需要分权与制衡。同纵向的纪委垂直监督相比，党的领导下更需要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正如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宪政也并非民主社会的专利，而是一种操作层面的工具。党制定国家的宪法架构，制定大政方针，决定立法的主题和方向，但一旦立法完成，党就必须在这一框架下运作。尊重宪法及其地位，往往能使党获得更大的自主性。

汪丁丁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大范围变迁需要从更为广阔的动态视角加以探讨，而非静态的一时一地的观察。当下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精英失灵”现象，知识精英群体基本丧失了对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敏感性，而处于非精英位置的“有精英意识的中国人”大量存在，由此产生“精英错位”。这种精英的错置，要求我们回归现实，从广阔的动态视角出发审视问题，并着力化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问题。

柯华庆教授认为，当今中国亟需解决精神自主问题。在民主集中制下，中共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的合理平衡。由此，柯华

庆教授提出了“党导民主制”的命题，主张将以党为主导的民主置于宪法的框架下运行。

陈晓平教授建议用中国的方式重新阐释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将党导立宪制和新叙事结合起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中产阶级日渐扩大，民意表达越发制度化。陈晓平教授认为，改善中国治理，需要不断完善民意表达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撰稿：孟熙元）

## 24

### 艾朗诺： 拓广唐宋文学研究 ——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

2017年4月5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论坛以“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为主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张剑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马东瑶教授参与讨论；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伊佩霞（Patricia Ebrey）教授出席了论坛。

艾朗诺教授首先为大家阐释了他报告的主题“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他强调正统与非正统的差异和联系，以及文史结合的重要性。他回顾说，自己原先研究宋代文学，都是以文坛大家为研究对象，





例如欧阳修、苏轼等，虽然知道这些大家的作品必须放在历史环境去解读，但往往还是侧重从文学、美学的角度去解读，忽略了历史背景，他笑称这种研究是他的“初恋”。后来，由于研究李清照，发现李清照仿佛属于另外一种文学领域，另一种表现传统。宋人对李清照整体评论很负面，虽然有很多人欣赏她的诗词，但整体而言批判得很刻薄。他由此感悟到，宋代典范文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可以说研究者对此抱有偏见。了解这一点以后，艾朗诺教授专门搜集了一些受到当时非议的文学作品，看看它们是否挑战了当时文坛的成见，是不是逾越了当时文坛的边界，是不是不遵循精英文学的规范。今天演讲题目中的“非正统文学”所指的种种资料，可以说是登上了文学厅堂，而没有进入内室，包括杂技、杂史、笔记、传奇、小说等较为模糊而分不清楚的种类。它们往往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艾朗诺教授进一步指出，非正统文学资料与传统的差异与关系值得关注。唐宋笔记、小说、传奇常受到学者的鄙视，虽

然其中的内容很多是口传的故事，但多少留有一些原来的印记。正是因为这些笔记、小说、传奇有着非正统性，所以经常会涉及一些在典范文献中不太敢提到的话题，换言之，正因为其地位低，所以受到的限制比较少。

艾朗诺教授今天将焦点聚焦到了志怪笔记小说之上，他认为，传奇笔记小说是记录民间传说的文本，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小说，宋代的传奇笔记小说并不完全是靠作者的想象力而写的，很多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以洪迈的《夷坚志》为例，洪迈一旦发现他以前编的集子里某一个故事有错误，比如人名地名不对，或者叙述的事情有什么遗漏和夸张，他在后来会把它说清楚，甚至把整个故事重新记录，解释说从前的版本不可靠。但是，故事的真假问题只能先放在一边，若要判断哪一个可靠，哪一个不可靠，很难。艾朗诺教授说，西方很多学者往往用笔记小说去研究当时的宗教信仰系统，但是他相信它们有另外的意义与价值。众所周知，不管哪个地区、哪个时代，社会上都有很多忌讳，很多事

情是不能直接谈论的，比如婚外情、男人背叛恋人，妇女被绑架或出售、官僚勒索平民、非法怀孕等，这些谈起来让人尴尬的、必须回避的话题，只好把鬼神拖进来，通过鬼怪来处理。

接下来，艾朗诺教授为我们列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讲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突然对家中的梧桐树自言自语，实则表露青春期少年开始对异性春心萌动。在现在看来这是很美好的爱情，在当时却是很忌讳的。在宋代的正统文学作品中是看不到这样的故事的，文人的诗词往往是描写闺中少妇思念丈夫。

第二个例子是说老兵的女儿寄养在蒋教授家，被养父蒋教授变作小妾。蒋妻与蒋母对此十分恼怒，拒绝与蒋同赴新所。蒋在赴新所不久后，受到英华女神惩罚而死。在这个例子中，值得关注的是两种对于男人收养小妾的不同看法：蒋代表了男性观点，即不以为意，毫无羞愧；而蒋母与蒋妻却觉得这是有辱家门、必遭天谴的行为。这就表明两性想法不一样，社会上男女的权威有所不同。这一故事显示了当时社会中的一种冲突，一种抵触，也是一种焦虑。有趣的是叙述者更偏重女性的视角——相比之下，妻子和妈妈的话分量更多。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认为《夷坚志》是以女性角度看问题，从女性立场想问题。而在宋代资料中，遇到这一特征算是相当意外的发现。

第三个例子是说，某日，林氏的丈夫在家中突然死亡，而此时，家婢在菜园遇到了小孩怪物，用刀砍却像是有分身术般

越砍越多。两件事情看似独立，却同时发生。艾朗诺教授解读这一个故事时，作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丈夫与家婢有不正当关系，致孕而堕胎，死胎埋葬在后院，因而遭到鬼胎的报应。因为细看故事的文字，怪物指定为小儿，而且对家婢的动作牵衣而上，这是小孩对妈妈的动作。在这一例中，笔者称男主人公为“婿”，也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叙述。

在解读了这三个《夷坚志》中的压抑故事后，艾朗诺教授总结说：“世界古代文化，哪一个不是压抑。”进而提出了“焦虑史”的概念。艾朗诺教授表明，自己选择研究非正统文学，即志怪小说，不是为了了解当时的宗教史，而是为了当时人物的情感、当时人的“焦虑史”。因为人所焦虑的事情很要紧，而且很体现当时人心中最深切的的东西。然而，焦虑史不是思想史，它不像思想那么抽象，那么有知识内容。我们在阅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有事情要说，一方面又不能说得太详细或者太露骨，因为事情本身有一点难堪，譬如姑娘到了青春期而开始对异性有感情，却不肯全部讲出来，或者托鬼怪才提到。这或许不是完美的叙述方法，但还是比起完全不提，根本不说更好一些，这样的叙述方法也许可以当作一种处理方式。

此外，传奇志怪小说还非常有益于古代中国两性研究，尤其是明清以前。因为女性资料太少，而正统文学作品往往植根于男性视角，可采用资料很有限。光靠正统文学作品诗词散文是不行的，要在非正统文学与非正统史学中去挖掘，才能够找

到更多有用的资料。并且，记录这些令人有些尴尬、难堪的故事，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它们反映了作者企图为弱势者说话，为不公的事情呼吁的冲动。

在艾朗诺教授的主题报告后，论坛进入了自由讨论阶段。

张鸣教授指出，“焦虑史”这一概念的提出令人佩服。我们只谈观念史、概念史、思想史等，但生活是由很多焦虑构成的，比如博士生的成长过程就是充满了焦虑的，从选题到写作到修改，拿到学位之后，又有其他的焦虑。其次，张鸣教授总结概括了艾朗诺教授报告所涉及的几个十分重要的关系：第一，文学与史学。这对于我们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怎样处理与史学的关系，也有很好的示范意义。第二，正统文学和非正统文学。在大的文化史背景当中怎样看待非正统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有很多看不到的精神内涵，可以在非正统文学当中找到很多证据。但非正统文学中的材料，是当作文学作品还是史学材料值得探讨。第三，文学作品和史学材料。非正统文学的文献类型，是作为文学研究的史料判断呢，还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处理，这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刘宁研究员赞赏了艾朗诺教授研究的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解，但她也提出正统文学与非正统文学的边界是相对的、变动的，正统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非正统会随着研究不断加以突破而逐渐成为正统。其次，刘宁教授提出一个疑惑：非正统文学之中的荒谬感，是否是正统文学中

伦理感介入的结果。比如，蒋教授将养女变作小妾，其妻母是因为他情欲而生气，还是因为他失信于人而愤怒？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剑研究员也赞赏在主流观念忽略的材料中发现历史的缝隙与隐藏的情感。他举例说，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艾朗诺教授通过文学作品作精神分析，都将文史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剑教授形象地将历史比作一个立体图形，强调研究要防止独断论、一元论，在传统之面以外，要竭力寻找立体的其他面。但是，张教授也指出，须探讨被忽略的材料，因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参照，所以对于文本的解读要更加小心，要把文本放到整个宋代文学史中甚至是整个古代文学史中去解读去验证，去解读，才会更有信服力。第一个例子，信服力不够，有点解读过度。因为在古代文学中，不只是女性，男性儿童也会对自然界的树木花石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能不能用性欲来解读，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和佐证才更有信服力。

马东瑶教授作为艾朗诺教授著作《美的焦虑》的忠实读者，再一次提出正统文学与非正统文学的边界是变动的，文体之间是有地位高低之分，就像史料的可信度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地位较低的文体是被我们慢慢纳入到正统研究范畴之内的。一般说诗文是最正统的，因此，或许用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的划分是更加恰当的。按照文体来区分，《夷坚志》是笔记，还是笔记小说，还是说是否可以当作史料来使用？用《夷坚志》来研究宋代社会生活，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如用来作为妇女思

想观念的研究、两性关系的研究，则是需要斟酌的，需要更多、更复杂的分析例证。

在各位与谈人发言之后，艾朗诺教授表示了感谢并回应道：现在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研究，并不是很成熟，对于材料的接触与解读也是比较初步的，还没有决定用什么研究方法来解读，还在阅读过程中，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新的视角，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思考与探讨。在国外，学者大多是用笔记、小说来研究社会的宗教，所以想能不能从新的角度去解读这些材料。或者这些材料的说服力可能是不够的，但是就像报告的开场所说的，故事的真实性先放在一边，我们要做的是，试一试从新

的视角与方法来解读这一些志怪笔记和小说。当然除了《夷坚志》外，还要读宋代其他的志怪小说笔记，来搜集佐证材料，这是下一步的工作。其次，关于正统文学与非正统文学的问题，界定《夷坚志》是非正统文学并不是就今天而言，而是就洪迈那个时代而言的。《夷坚志》的编写过程中，洪迈受到了很大的非议与批评，甚至连家人都对他有意见，洪迈在一篇又一篇的序文中一直在辩护自己为什么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来编写这些志怪故事，这正是他受到非议的有力证据。

（撰稿：刘媛）

## 25

### 傅申： 书画鉴定通则散论及举例



2017年4月5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报告厅举行。论坛的主题为“书画鉴定通则散论及举例”。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

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傅申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淞教授主持，文研学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朱万章研究馆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邵彦教授等参与了讨论。

傅申教授首先和听众们分享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并从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出发，展现自己不同年龄由于生理、年龄、病理等原因而在照片中呈现出不同的容貌，生动阐述了在鉴定心理方面“怀疑事物为假易，鉴定事情为真难”的道理。整个演讲围绕“时代风格与大师”“个人风格的早晚期演变”以及“书法中的墨迹与刻拓本之间的关系”三方面展开。

傅教授指出，著名书法家在其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在风格和一些细节上会产生不同。他展示了两件现在公认为王羲之的作品，尽管两幅作品在细节笔法上有着差异，例如横划是倾斜上扬，还是水平而没有锋芒的区别，但是考虑到创作两幅作品所用的工具与创作时间早晚不同，依然可确定是王羲之的作品。同样，收藏于普林斯顿的黄庭坚最有名的《赠张大同卷》，是黄庭坚最大、用饱墨的作品，和傅申教授此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字窄且紧、行距大的作品大不一样，但是仍不妨碍这个作品的真实性。另外，齐白石由于从小就看到并学习很多作品，加之他早年靠画祖宗遗像为生，因此模仿能力很强，而不断的模仿也使齐白石的作品风格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傅教授通过这些例子指出，人的年龄会产生变化，其作品的风格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做鉴定的不易就在于要了解一个人平生的书法变化。

傅教授接着讨论了书画中的多胞本问题，指出它们有可能全真，也有可能全假，需要找证据来证明真伪。傅教授对怀素《自叙帖》三胞本的真假问题进行了分析。当时有的人为了一个拓本而描摹几百

次甚至上千次，使得字形几乎完全一样，即使在一些笔画上幅度不同、一些地方墨的浓淡不同。当时的人们要买很像真迹的作品。到宋代已经有了刻拓本，临摹也已经可以做到逼真，而且不止只有一本，例如米芾的刻本有五本，分不出好坏。但是刻本里面也有不同，墨汁本与刻本也存在不同。怀素的每一件作品也不一定写得一样好。傅教授指出，临摹的刻本能做到非常相近，但是仍然有细微的差别。傅教授接着举出了《富春山居图》双胞胎的问题。大家以前认为第一本是真的，乾隆皇帝五次下江南的时候每次都带这本，在卷上找地方盖印题字。但根据现在的研究，是乾隆弄错了。

傅教授接下来讨论了书法中墨迹与刻拓本的关系。在书法作品中，飞白完全是一笔写成的，非常漂亮。而刻本是利用石头、书条石而制成，依据书条石的长度调整接缝及骑缝。卷本可以很长，纸被剪短后一张张接起来，但是也有少数是整张纸制成。当时做一张长纸很困难，明朝末年有丈二批的纸很少；西安碑林的碑文很高大，但是很多都是一页一页剪开来重新装裱的，每一页都要有标准尺寸。苏东坡的寒食帖号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高头大卷，刻本要根据书的宽度高度大小来调整布局。故宫本不是勾摹本，是写本；全卷绝非文彭摹本。下限为赵鼎、邵叶，宋、明人跋皆真。故宫本是水镜堂本的母本。

在书画中的材质问题这一部分，傅申教授强调，尽管绫到明朝晚期才大量使用，但是不能因此把作于绫的画归为晚明作品。例如北宋的《司马光告身》、上海

博物馆收藏的黄庭坚《华严疏》等。北宋司马光告身也是写在绫上，说明北宋人已经用绫写字，黄庭坚也曾在绫上写字。因此，不能用这个理由把画定为明末之后。

傅教授接着就考鉴与目鉴、避讳与误书问题举了一些例子。他认为，避讳在书画创作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不避讳不意味着作品必然为假。例如宋太祖始祖赵玄朗的“玄”字的那一点要避讳，但是苏东坡、米芾、黄庭坚等都不避讳。同样，米芾的《蜀素帖》中，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的“殷”应该避讳，米芾第一次忘记避讳了，第二次想起来并且去掉了最后一笔。柳公权《玄秘塔碑》中，“秘”字在同一个碑里有三种写法，只有一次示字旁表示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带了两点。苏东坡的《赤壁赋》也有错字，如“途”“盈”等。这其中可能有通假等原因。有人认为黄庭坚不会写错字，因此认为他的一些作品是伪造的。通过这些例子，傅教授指出，证明一个作品是假的有很多理由，但是这些理由未必都有道理。

傅教授接下来谈到一系列考证的具体问题。一是代笔与伪作的例子。他指出李鸿章名下的作品都不是同一人写的，而近代的贾景德也请人为其代笔。授权的代笔可以当成真迹来看，但是代笔毕竟还是代笔，与真迹还是有一定差异。而对于真伪印章问题，印章底下的垫子软硬不同，盖的时候用力大小不同，同样的印章盖出来效果不同，因此考证真假比较困难。第三是关于作品年款等问题，古人也会写错年款，即“年款误书”，因此在研究古人作品排名时也要注意。

最后傅教授介绍了可以证真的科技方法。包括书画家的指纹，口水中的DNA（古书画家有含毫吮墨者）等。他指出要注意数据不全时这样的检验会缺乏说服力。例如197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专家用少数样本来检测，不具有说服力。同时，科技鉴定，只能证伪而不能证真。印泥材质具有时代性：宋朝的印包括水印、蜜印、油印、八宝印，但是还原、取样进行化验时会破坏作品，所以很多时候只能靠眼睛。在检验作品真伪时，可以帮助检验的非破坏性的仪器包括光谱、显微镜、电脑和紫外线等

在傅教授的主题发言后，与会学者就该话题展开了讨论。朱万章研究馆员提出了与讲座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是关于美国炒得沸沸扬扬的新发现的王维的山水画的真伪性。对此傅教授的回应是，明末的董其昌听说新发现王维的画时，不远千里请人拿过来研究，这种精神很可贵。由于傅教授本人也没有亲眼见识画作，因此也不明确其真伪性，况且现在还没有一幅公认的王维作品，因而这次事件可能有炒作的嫌疑。第二，在美国纽约拍卖的陈噪作品的真伪性问题。对此，傅教授的看法是，看同一个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来结论不同，而且在没有标准作品的情况下鉴定会更困难。我们首先要做到自圆其说，证据齐全。第三，他询问了傅申教授关于清明上河图仇英款的心得体会。傅申教授认为，他的工笔画非常细心，研究他的作品非常难，甚至只要能够抓住某一部分的精神就很容易。

邵彦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首先，书画鉴定是完全可以学会的，但是需要条件，包括小环境和大环境的影响；过去，私人收藏和博物馆收藏处于良性循环，现在则是争夺藏品，而且越来越金融资本化；此外，在书画鉴定时，不能过多受到媒体引导的影响，而是应查找资料并自主判断。傅申教授很同意邵彦教授的观点，他指出，解读文字根据什么版本有时很难确定，有时还是根据书法本身去理解更可靠。鉴定书画应该根据合乎科学的方法，但是很多作品都有名家大家鉴定，很

多并非美术专业出身的学者转向文化史、政治史去诠释。此外，教授认为自己的研究与机会和缘分都分不开，而现在中国人面临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黄金时期，因为很多问题以前都没有被挖掘出来，很多题目以前都没有被研究过。傅申教授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是近代书画史研究的好时期，而 21 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世纪。

（撰稿：朱诚达）

## 26

### 陈志远： 《高僧传》的文本史——兼谈佛教史传文献的性质

2017 年 4 月 12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讯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高僧传》的文本史——兼谈佛教史传文献的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志远助理研究员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馆员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哲学系杨浩博士，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副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天博士莅会参与了讨论。

陈志远指出，文献学研究分三个层次：文本的存在形态及生成、文本意义的正确解读、文本所构筑的历史图景，他本人在第二个层次下功夫最多。他介绍了《高僧传》的版本情况。他指出，《高僧传》一直是“入藏”的，随着《大藏经》的流传而流传，版本情况与《大藏经》基本相同。目前学界使用的基础学术版本为《大正藏》，但实际运作中，并不如编者所述采用的是“东京增上寺《高丽藏》”，而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高丽藏系统很多时候与江南系统存在较大



不同，有时甚至还会反映出教理学的某些特点。由于佛教目录频繁重编，平行文本特别多，故通过后代的重抄本，可以实现他校。此外，他指出中华点校本《高僧传》存在的问题，并推荐了吉川忠夫、船山徹合著的岩波版日文译注本。

接下来陈老师讨论了南朝僧史的编纂过程，即《高僧传》的史源问题。他介绍道，南朝的僧人传记分为僧人单传和类传两大类。其中僧人单传分别传、碑诔、经记等类型。记录在译经后记或注疏开头的祖师事迹，或由直系弟子撰写的行状，以及在信徒间流传的佛教灵验故事，较多收到印度、中亚佛教圣传传统的影响；与僧人交好的名士所撰碑诔，是在两汉魏晋史传传统中成长的文类，记述相对平实，缺少生动的故事性描述。而僧人类传分为地理性类传和修行性类传两大类，前者与汉地史传传统一脉相承，而后者成立的依据则源于早期印度教团分工的修行实践的分科。齐梁之际，僧祐和宝唱根据造藏事业中搜集到的大量写本，撰写了大规模的僧人类

传，按照某一实践的源流梳理相关的经典和传记，形成了具有通史性质的僧人类传。他们的工作是具有继承性的，得益于晋宋以来漫长的积累。至于慧皎对《名僧传》的批判，近代以来，苏晋仁和纪赟等学者都指出，《高僧传》相对《名僧传》没有明显的优势，《名僧传》的有些内容反而更详细。陈老师认为，慧皎对于《名僧传》的批判不是结构方法、组织方式上的，只是认为“高僧传”这一题目比“名僧传”更好。《名僧传》的消失，与道宣选择续《高僧传》有很大关系。《高僧传》虽然没有在取材上超过僧祐和宝唱，但慧皎真正的创制是明显的通史意识，和“广泛利用文本间的相互参引”，后者“是对中国纪传体中注重剪裁的创造性运用”（陆扬语）。

此外，陈老师还讨论了六朝小说的意义。他指出，时代上，小说在晋宋齐梁分布均匀，地域上分布广泛，弥补了高僧传以荆扬三吴为中心的缺憾。《高僧传》关注上层，志怪小说则关注下层。在读者群上，志怪小说更多地面向在家信徒。陈老师还

提出,日本古抄《高僧传》的性质、慧皎对北方佛教的记载、《续高僧传》的特色以及《高僧传》类作品在僧团中的接受情况,都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就最后一个问题,他指出,数万件敦煌遗书中无《高僧传》写本,可以说明《高僧传》类作品在僧团的实际修行生活中不为所重,真正重视《高僧传》类作品的是具有使命感的律师,而大范围搜集、整理《高僧传》的僧人僧祐、道宣也都是律师。他还提出可以从“记录、搜集史料的动机”与“技术上面对的实际困难”两方面来讨论宗教史学问题,比如编年体宗教史书就可以从这些角度来思考,有计算“佛灭”年代的需求,但技术上实现印度与中国史事的对接,需要天文历法的依据和相关论证。

在陈志远的发言之后,论坛进入讨论阶段。杨浩介绍了汤用彤对《高僧传》的研究情况,指出目前整理的《高僧传》主要是汤一玄先生的工作。他谈到,在古籍整理的时候,更多地注重标点而很少关注义理。慧皎作为律师的主观想法是为后代的修行人、世俗人提供一个榜样,就删去了关于义理的部分,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高僧传》的一些特点。

仇鹿鸣提出,“政治和尚”在《高僧传》中的记载,与正史只有一两句话的记载差距很大。虽然僧传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但“政治和尚”在大的政治势头下

的作用可能也很有限,其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是否有同样巨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佛典、僧传的编纂,还应该放在六朝士大夫政治的环境下来看,实际上它们是用当时对士大夫的描写方式去刻画僧人,《世说新语》中就没有神异故事,僧人和士大夫的描写是同一的。

田天提出在经部和史部中,他校是很危险的,如果是作平行文本的处理节点在哪里——是修改高僧传还是仅作为一个平行文本放在这里?使用的小说史料该如何解读?同时,她谈到编年体在传统史料中也存在,但存在的原因迥然不同,值得大家关注。吕博提出道宣《广弘明集》有明确教义的作用,而且在南朝时除了《高僧传》还有《高隐传》,参照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第一等叫“隐而不名”,与“高而不名”可以互相借鉴。

就他校的问题,仇鹿鸣老师进一步补充道:根据在二十四史整理中的实践,四校法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在实际整理中,看到的估计可能一个宋本都没有。他校可能存在危险,但是非常关键。就个人而言,他更愿意用“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史料来区分校勘,也希望在具体的古籍实践中,能够对理论产生一些反馈。

(撰稿:孟繁之、周伯洲)

## 27

### 社会底蕴与田野技艺

2017年4月17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七期暨“社会底蕴与田野技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刘世定教授、张静教授、周飞舟教授、渠敬东教授、孙飞宇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策略研究院折晓叶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孙秀林教授、肖瑛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陈家建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王雨磊副教授,及《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闻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李凌静,包括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师生学者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就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和意义作了简要介绍。她指出,如何有建设性地讨论社会学研究方法,一直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学者们以自身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回到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将有助于反思当下的研究工作。随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致辞,他指出质性研究的田野经验不只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它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指示我们在生活中寻找理解自身的方式,是人为为学的目标所在。



研讨会的第一场主题为“质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主持。首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围绕“韦伯所言的‘理解’与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进路”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源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于社会行动及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进行阐释,这有助于帮助我们面对田野中的理解问题。对此,把握住“常情、常识、常理”,在韦伯“理想类型”的意义上解决定性研究常被质疑的科学性问题。然而,田野调查也是一门



“遗憾的学问”，是访谈者和被访者共同完成的即兴创作。为了避免双重解释，研究者应该构建我群关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群体和文化中，并加强历史和常识修养，时刻保持对社会现象的好奇心。

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折晓叶研究员用一个有关农村土地产权的生动个案讨论了田野经验与日常生活逻辑的关系。她认为，当前质性研究中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即将经验和理论直接对立。事实上，经验不是相对于理论的概念，而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和日常逻辑，亦即“社会积淀根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的逻辑能够成为理论和经验的中间机制，起到回应经典理论和提升微观经验的作用。最后，折晓叶研究员用三个极具启发性的提问引出了田野观察场景与社会底蕴以及历史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张力的关键性问题，引人深思。

随后，张静教授围绕“质性研究的价值”这一主题发言。她澄清了关于质性研究的科学性、代表性和清晰性等一些误区，认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各有长短，其适用的研究

类型并不相同。质性研究在探究尚不清晰的要素、定义和理论，以及难以被量化和中性化的机制分析、历史分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本场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大家针对质性研究的代表性和理论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应加强社会学者理论素养和个人修养的共识。

第二场讨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教授，应教授以“田野想象与‘介于之间’的探寻”为主题，指出田野调查“介于之间”的特点。他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田野与理论的关系上，他反对朴素的经验主义和理论先行的方法，理论不只是文献综述，更不是创造概念，它应该融入于田野中、消失在经验里。第二，要避免个案研究的碎片化。个案的意义不是去对抗大数据，而是要处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第三，要防止陷入底层关怀的社会学，要看到民粹主义正反两面的复杂性。第四，要在常态与异态、生与熟的对反关系中理解日常生活。最后，他指出在具体观察中，应以听和看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展现那些说不出的社会学问题。

第二位发言的是人民大学的冯仕政教授，他的题目是“转型社会与质性研究”。他提出在转型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是不一致的，内部冲突使得结构关系更加复杂，这时，质性研究的理解优势便凸显出来。他

同时也提到，质性研究需要反复求证和比较，以便应用和概念化。

第三位发言的是上海大学的孙秀林教授，他的题目是“田野与写作间：一个定量主义者视野中的质性研究”。孙秀林教授多年从事定量工作，在他眼中，田野能够帮助定量研究得到问题和假设。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来说，发现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并且有必要理解的问题，是研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或用质性方法，或用量化方法，皆在对问题的结构、框架有整体性、客观性的把握。虽然定量研究多遭诟病，但它清晰的研究思路和专业化的技术培训，保证了研究质量，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定量研究者看来，好的田野工作需要讲出好的故事，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理论，它能揭示出清晰的逻辑线索，以此为切入点，质性研究会帮助量化主义者指明方向。

下午第一场讨论以“个案、机制与结构”为主题，由折晓叶教授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以“研究性质与分析技术”为题，对二者进行澄清，以便说明个案研究的主要功能。刘世定教授认为，按照研究性质划分，社会科学研究可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个案研究三类。相应地，分析技术也有三类：统计分析技术、理论分析技术和历史分析技术。田野调查是一个混合的技术，既有数据搜集技术、分析技术，也有研究性质的定位；既可以有理论追求、个案经验，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其中，个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原有理论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激发理论想象力。而新建构的理论也需要与案例进行对话，研究具体的复

杂环境，在基础模型之上，完善中间环节，得到抽象程度较低、具体内容较多的模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以“个案研究如何走向一般”为题，讲述了个案研究上升到一般的必要性及其方法。他指出两条路径：第一是比较研究，包括纵向比较、历史研究，以及横向比较。其中横向比较又分为三种类型：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和总体性的比较。第二种路径是从个案上升到一般，强调与理论对话。最后，沈原教授指出社会学个案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志的不同，人类学民族志有非常细密的材料，而社会学的个案研究需要具备结构性特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以“田野调查和社会学中国化”为题展开演讲。他认为，对行动者意义的理解是质性研究的关键。田野调查中的理解困难，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以西方社会学理论面对中国的经验很难达成理解，需要更多中国的理论。田野工作的启发在于扩宽理解，确定行动者的意义。要实现这一点，除了研究目的理性之外，还需要调动其他的理解方式，比如狄尔泰的移情式、费孝通晚年的将心比心式、或者古人说的以情携情式。以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和田野经验为基础，以所得规律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同时强调社会学的中国化与美国化方法，将更有助于田野工作的提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的题目是“个案研究为何是总体社会研究”。他以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为例，讲述了在“改稻为桑”的政策刺激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以及地方上的商人、地主、农民等不同人群的心理，土地兼并和饥荒问题逐渐浮

现，社会发生抖动和摇摆。质性研究也同样如此，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个静态的整体结构，以供学者观察。所谓总体，是在关键事件的刺激下，使各种因素展露其特征、功能和作用的整体面貌。个案研究的本质在于它能够作为事件发生的契机，调动各个层面的复杂关系。从国家到基层、从制度到人心、从现实发生的权力利益到社会的价值伦理，都能产生一个扭结性的变化。因此，我们的研究既要看到事件的发生过程，也要看到建立它们共变关系的关节点。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肖瑛教授讲述了其对《马桥词典》的研究，对“中国人实际生活的逻辑”和“差序格局”两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他强调质性研究的经验感，理论不是定理，更需要感同身受，因此研究者得不断回到自身进行反思。

最后一场讨论由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首先发言，他主讲的题目是“深度访谈中的理解社会学意涵”。他指出深度访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研究者本身也是文化中的行动者，受社会底蕴的滋养。深度访谈较其他研究方法更为直接地提示我们，研究是一种不断卷入的过程——你不向研究对象交心，人家也不会向你交心。这也就要求研究者在观察时首先要理解自己，即是说社会学的前提应该也是“为己”的，有非常明确的与中国社会相关的问题意识。

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在其报告“机制分析与田野技艺”中指出，即使是机制分析这种质性研究的锐利之处，在尝试勾联现实社会的多种机制时，依然会遭遇困难。这时不能仅仅考察机制的条件，还要考虑约束和边

界。另外，机制分析要有针对多种机制的总体性想象，它的多重历史文化基因和名实关系也应纳入考虑。

华南理工大学王雨磊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学术修辞及其问题”。他结合自身从事学术刊物和网络自媒体编辑的经历指出，学术修辞决定了书写的视角和对象。西南财经大学陈家建在报告“政府行为研究中的个案伦理问题”中指出，质性研究中因所收集的个性化资料需要保密和匿名，致使研究背景被隐匿，造成理解的偏差。处理个案资料不仅需要技术手段，还涉及学理和伦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闻翔在题为“现代转型与传统资源”的报告中以《昆厂劳工》为例，指出中国社会学在民国时期便有深厚的积淀，学术前辈所做的历史研究和个案研究是我们最重要的学科底蕴。他将史国衡放在魁阁的视角下，指出了《昆厂劳工》与魁阁农村研究的延承关系。

会议的最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李凌静编辑和来自《社会学研究》的闻翔编辑分别就社会学刊物的文章收录和编辑工作，向会议介绍了质性研究在近年来的投稿和发表状况。与量化研究相比，好的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整体素质，他们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论文发表问世。随后，各位老师就田野工作的体会和中国社会的内涵交换了意见，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撰稿：牟思浩、国曦今、宋淑敏、余朋翰）

## 28

### 沈卫荣： 从密教中拯救元代宫廷藏传佛教史



2017年4月18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论坛以“从密教中拯救元代宫廷藏传佛教史”为主题，清华大学中文系、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段晴教授主持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旻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罗文华研究员，及《中国藏学》杂志社社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黄维忠研究员参与了讨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亦莅临会场。

沈卫荣教授首先指出，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这在历史和文化两方面都给他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自蒙元时代开始，藏

传佛教就已经十分流行。但直到今天，我们对藏传佛教本身、藏传佛教的教法、传播、教派等具体问题仍然知之甚少，至于蒙古人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如何接受藏传佛经，我们更是无从得知；而即使是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内容，其中往往也存在很多谬误之处，甚至是想象和杜撰。

汉文化传统对藏传佛教，往往存在一种情色化的印象和解释。迄今为止，人们关于这段历史的认知都源于明初士人的私家笔记或《庚申外史》等元末的野史作品。沈卫荣教授认为，明朝初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对藏传佛教完整的观点和看法，但这只是“历史的小说”，不能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从《庚申外史》中的记载来看，出现于元朝蒙古宫廷中流传的藏传佛教教法有三种：一种是所谓“演揲儿法”，一种是“秘密大喜乐禅定”，还有一种是



“十六天魔舞”。元顺帝时，丞相脱脱奏用哈麻为宣政院使，哈麻在得到元顺帝的宠幸之后，向他推荐了一个会“运气之术”的印度僧人，这种“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的魔术被称为“演揲儿”。之后，资政院使、朝鲜人陇卜也向皇帝进献了一位西番僧人，这位西番僧向皇帝传授了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即藏传密教中的男女双修之法，这种修法听起来像是一场君臣共演的群交活动。而之后的《元史》在继承这种观点的同时，也出现了记载上的偏差。修元史的人由于实在缺少相关的文献资料，只能将上述的野史材料作为资料编入元史之中，但即使是传抄，其内容往往也是错误的，修元史的人显然并没有理解这部分内容。通过比较《元史》和《庚申外史》中的记载，便不难发现，在《元史》中，“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二者合二为一，并被看作是“房中之术”，“十六天魔舞”也被看作是一种群体性的淫乱活动。

《元史》将元朝快速灭亡的原因归结到喇嘛身上：蒙古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为禽兽行，人纪灭亡”。但事实上，

这归根结底只是元代皇帝亡国的传统历史叙事的一个变种，无非是加上了一点异族色彩而已。但从此之后对藏传佛教的认知，也日渐出现了色情化、污名化的特点。后代小说作品中也有很多专门写藏传佛教的色情小说，特别是明清的色情小说，对藏传佛教进行各种添油加醋的描写和夸张；部分文人曾一度将他们尤其方案

的蒙古人塑造成荒淫无度的色情狂。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在于，对于佛法本身，实际上当时的人普遍没有正确清晰的了解，而大多是道听途说，并借助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见解试图做出跨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沈卫荣教授强调，文本所记载的内容需要我们审视和分辨，其中可信的内容往往是我们现在尚不了解的内容，而这些词汇或者情节，文本的作者大多并不理解，因此无从杜撰，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历史现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往往以讹传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以来的汉文文献中，不断出现这些故事的新版本，并且常常流为色情小说的主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传为明代著名江南才子唐寅所写的色情小说《僧尼孽海》。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用《素女经》中的“采补抽添”九势加以解读。1987年《人民文学》刊登的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一度被禁，不过其中讲述的故事显然不可能见诸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但里面的内容仍然有很多内容在描述西藏社会如何淫乱。北京的藏胞看到之后尤其不满，影

响非常大。但归根结底，这些内容仍然是《僧尼孽海》式西藏故事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怪异、不伦的性行为，特别是其中对三代乱伦和宗教性仪式的性行为。这一小说背后反映的内容，一是他受到了传统的汉族对藏族的观点的影响，二是新派小说家借助他者探讨自身的新趋势。《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西藏喇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同时也批评西藏人是最肮脏、最没有性道德的人。“母亲可能随时把女儿送给外来的商人”这种描述也通过波斯和阿拉伯的历史典籍传播到了西方。

沈卫荣教授随后探讨了“演揲儿”一词的起源。《庚申外史》这类的记载显然不足凭信，演揲儿法显然也并不等同于秘密大喜乐法，值得我们相信的，往往是我们尚不了解的内容。这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并非文字上的阐释和记载，而是关注作者道听途说而又不明所以的词汇和故事。这种词汇作者不了解其含义，自然无从进行杜撰和阐发。从西方的汉学学术史来看，学者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秘戏图考》等书，专门介绍古代中国的性生活状况，但显然他对这方面内容的介绍中仍夹杂很多想象和谬误。在他的著作之中，“十六天魔舞”被解释成“八个男人和十六个女人跳舞”，这就是一种讹传。法国学者 Rolf Stein 给出了“演揲儿”的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个词由蒙文和汉语混杂而成，“演”是表演、展示、修习的意思，“揲儿”指的是蒙文中的欢乐。后来 Herbert Franke 则提出，“演揲儿法”是一个完整的蒙古词。但这些观点都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表明，“演揲儿法”这

个词并非出自其他语言，而且它们也没有从《庚申外史》的记载之中跳脱出来。由此，沈卫荣教授强调，语言学并非对业已形成的文字和历史资料中的语言研究，而是须将文本放置于其本身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之中进行深刻的理解和研究。我们需要将这些文献转变成为研究元史研究的历史资料，通过文本对勘和比较研究中建构历史的学术方法，确定原文本最初的来历及传播流传的顺序和系谱，进而还原出历史原貌。

《大乘要道密集》是研究密教的内容及其传播的重要原始材料，但由于相关的宗教知识和语言不通，这些材料往往难以被转换为研究元史的资料。黑水文书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修正了原有一些认识和判断，并带来藏传佛教在西域及中原的传播史的改观。卓鸿泽先生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演揲儿法”实际上指的是“幻轮修法”，通过一系列的肢体动作，来修习人身中的风、脉和名点等。修习幻轮的目的在于调解风脉、强健身体，以帮助消除身体上的各种疾病。秘密大喜乐禅定确实有男女同修的内容，不过并非元朝的传播，而是西夏的时候传播的。这一修法主张在修炼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大喜之境，而非长期以来想象中的宫廷淫乱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片面将元朝灭亡的责任归结到喇嘛身上无疑是不合理的。从黑水文书来看，“十六天魔舞”是对无上瑜伽部本尊胜乐金刚之中围的一种供养，而没有任何的性或者淫乱内容，而只是一种宗教舞蹈。综合以上的分析，沈卫荣教授指出，将蒙古宫廷所传的藏传密

教修法定义成官中之术是不合理的，我们亟需恢复和重构西夏、元明时代藏传佛教传播历史的真实面貌。蒙古人迅速接受和信仰藏传佛教有着深刻的西夏背景，而藏传佛教之后在汉地以及宫廷之中的传播也并没有终止，甚至在明代一度有所增强，并对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罗文华研究员在评议中指出，历史从来没有断裂，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历史的每一个碎片，因此往往无法展现历史完整的图像。清代以前的宫廷档案数量，特别是记载宗教事务的宫廷档案十分有限，且后世对前代通常会有毁灭性的影响。这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新材料的重要性，并加以发掘和使用。语言是研究中的又一重要问题，语言上的隔阂始终难以消解。清代很多藏文词汇并非直接来自藏文，而是蒙文，这就使得直接通过汉语发音追寻词汇源头的方法难以实现。民族口传材料虽则保留了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但是往往有戏谑性和偏见，这种隔阂为我们理解历史现实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藏传佛教是被包裹在汉族文化的强势文化的审视之下的，因而容易对之产生很大的误解，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藏传密教对佛教的东传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大喜乐禅定”秘法的记载和流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门外汉看不到，而真正的修行者也不会泄露宗教活动的场景和具体细节，今天产生的误解往往就是因为在行者的视角下加以审视和叙述。我们的描述也往往有对现实的虚幻现象：语言上的虚化，使得我们同元代以来的藏传佛教存在距离，但这种亦幻亦真也为我们寻找现实提供了方向。事实上，在藏传

佛教的传播历程中有非常复杂的路线，我们能够关注到的往往是皇家和社会精英传播的贡献，普通民众对此的反应则很难了解。欲了解整个社会对藏传佛教的看法，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廖暘研究员指出，“演揲儿法”的考证和研究是将碎片化的原始材料进行串联，从而恢复历史原貌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分别和使用仪轨性的宗教文本和世俗性的传闻。廖暘教授认为，对宗教原貌的认识能够推动宗教艺术史认识的发展，沈卫荣教授对语文学的重视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从黑水到敦煌，文献上的追寻为我们还原和构建时代原貌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参考。

黄维忠研究员对沈卫荣教授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出，河西走廊一带对藏传佛教和佛教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地域。其中发现的文献和遗存，都是展开相关研究的重要资源，部分文献不仅涉及到了西藏本土佛教的传播历程，也提及了青海、甘肃一带的密宗传播。其中提到的大量人物，也证实了宗教传承中的一脉相承。

罗新教授指出，历史研究中，探寻历史上的某一现象和事物本身的含义，以及这一事物或现象被怎样认识和理解，是相互联系而各不相同的两个问题。明初人笔记和野史的记载和结论，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其内容荒谬直接加以推翻，而应当意识到，他们是在借用自己所生活的文化传统之中存在的含义来进行一种跨文化的阐释。

(撰稿：孟熙元)

## 29

### 甘怀真： 册封体制学说的再检讨

2017年4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九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甘怀真教授作了题为“册封体制学说的再检讨”的报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古史中心”）罗新教授

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中古史中心陈苏镇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王安泰副教授参与了讨论。北大文研院院长、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中古史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仇鹿鸣副教授、李霖副教授、童岭副教授、吕博博士，历史学系王铎副教授，中古史中心陈侃理研究员出席了活动。

讲座开始后，罗新教授首先对甘怀真教授的到来表示了衷心欢迎和感谢。紧接着，甘怀真教授直奔主题，开始了有关“册封体制”研究的介绍。甘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帝国，19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古老的帝国一一解体，但是中国



不仅没有解体，反而更强大了。这也是帝国这个课题的有趣之处。1960年以来，包括费正清在内，开始讲传统中国的政体是天下。我们或许会认为中国是一个专有名词，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天下，这个词不是一个形容词，也不是一个隐喻，它就叫做天下。费正清看到的东亚是一个国家体系，一个基本的政治单位。换言之拥有最高的主权，这也是今天国际法的一个国家的观念。1648年确立了一个观念：作为一个政治的单位的最高的主权者，其实是 states，后来逐渐延伸出其他概念。费正清所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 state，中国是一个 state，韩国也是一个 state 等等。中国跟周边国家之间有册封、朝贡的关系。费正清用一种文化优越感的解释阐述

了当时东亚作为一个天下的构成。他把当时的中国理解成在一个政体的性质上面是等同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他们都是 states。既然都是 states，为什么会有高下之分？为什么中国是一个上国文化，而其他地方可能是他的朝贡、册封国呢？这正是费正清的研究的不足之处。

中国在东亚称雄，册封周边的国家，所以把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是中国的属国。1871年发生了牡丹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在日本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交涉台湾问题以及中国与朝韩关系是，中国外交官认为它们是中国属国，但其内政、外交、和战权利等都与中国无关，是自主之邦。甘教授认为实质上他们不是中国的属国，而是一个自组织，更严谨的说法是自主的属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朝鲜，根据万国公法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学习，在某些方面学习当时的西方帝国主义。

册封与天下观的构建也有密切联系，

在中国如何建构自己关于天下的理论上，最明显的就是天下国家。天下国家应该变成天下一国一家。天下是由多数的国组成的，国又是由多数的家组成的。天下有一个模糊的边界，有模糊的边界不等同于不存在，每个政治的概念都是模糊的边界。如战国时期有非常清楚的天下的观念，其实就是战国七雄，虽然这种说法不甚准确，但其围成的区域就是当时所说的天下。刚开始时，这些天下封周王为天子，后来则期待一个新王的诞生。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有趣的，从来不是根据理论，在战国时代结束时，“天子授天命居中国致天下”，这也是皇帝制度秉持的理论。“天子授天命”，天子成为治天下的君主，即后来的皇帝。

这里须提到秦、汉的郡县制。重新审视和理解郡县制度，是了解皇帝制度起源的重要因素。郡县制并不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立即实行的，其与封建的力量不断斗争，逐渐成型。而从秦郡转化到汉郡，

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一是秦国自身，一是被征服的六国，他们在战国时期向域外进行设郡的地区，也被秦设置为秦郡，秦始皇称这个区域为“天上”。

西汉后期，中国开始出现一个新的理论，过去天下基本上是郡县或者是郡国，可是现在把天下分作内郡县，外四夷，这个郡县就是既有的郡县，就是中国。四夷有各种封国，于是天下就不需要都设置为郡县。过去我们认为，在日本列岛有一个已然成立的倭国，中国再去册封它，其实不然。诸国并立，一些政权与中国存在往来，中国册封与其往来最频繁的政权，认为其就是中国所想象当中的东夷九种当中的倭这个人群的领袖。中国任命其为倭王，但是不等同于当时日本最高领袖。这并不代表中国完全知道或完全认定这个政权是倭国最主要的政权，而是中国的想象。中国开始发展出另外一套理论去解释不需要郡县化的理由，开始创造一套新的世界观。

当时东亚一些新兴国家的建国者，纷纷利用汉朝的制度，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得到册封呢？当他们的政权开始强大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语体系来说，必须要加入国际社会，取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当时，能够利用的政治制度是汉朝的政治遗产，他们使用中国的官制，希望中国天子能够对其进行册封。得到国际承认，有邦交国，才能成为一个 states。同理，在古代的东亚，必须要成为天下的一国，才能得到政治地位。而这样天下的一国，就必须得到天子的授权。我们应当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多元的国之间的竞争，这个国不是

states 的国，而是东亚世界中天下国家的国。建立君臣关系是重新看待一个有别于现代世界、现代政治秩序的天下的基本要求。2世纪以后，汉朝崩溃。中国通过一套军队原理中的长官跟部署的关系，其实就是一套君臣关系，把当时的中国重新整合在一起。所以将军号的授予在当时非常重要，这个制度不仅影响到当时的四夷之国，也影响了唐朝的册封体制。

唐朝时，东亚周边的建国者，纷纷利用中国的官制，以此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册封体系的重点是得到官制后，其国家在天下诸国中的地位。甘教授还指出，中华帝国其实不是一个向外扩张的帝国，而一直是一个内缩的帝国，郡县边关就是我们认为的化内。“外国”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而相对于郡县作为一国的观念到了唐朝才开始明显出现。唐玄宗 725 年，参加封禅的有戎、狄、蛮、羌、胡，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又分作朝贡之国，包括今天的阿拉伯国家，这似乎是天下之内。后又有内臣之番，非常明显的是集成 56 国以来的所谓的外臣的内臣化，这是唐朝出现的新的天下观念。

在演讲的最后，甘教授说道：“以册封体制为核心，把自己所关心的 10 世纪以前中国历史的脉络，站在当时中国人自己的角度重新思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挑战，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在更多的场合跟年轻的朋友一起交流。我一直以做中国史为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学问。尤其是在新的时代中，我们更应该一起为我们所爱的中国而努力！”

甘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几位与谈人围



绕“册封体制”这个主题展开了讨论。张帆教授指出，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在汉代比较盛行，经过了魏晋到隋唐的变化，中国王朝被认为是天下的王朝，会对周边的政权加以册封，有一个头衔，或者说显示出某些位阶的问题。有的会册封一个将军或者是王，特别是涉及到爵位的，可能有侯、王等这些位阶。后来有册封皇帝的现象，如宋朝对西夏是册封为皇帝。虽然这并不是西夏真正想要的（西夏想要和宋朝完全平等），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册封。再比如朝鲜、越南和琉球，对朝鲜的册封比较符合规律。

王安泰副教授指出，甘教授已经提到汉代的郡县和所谓的郡国在秦汉时期的发展，而魏晋时，则有一个所谓的推行封建的论述。他们推行的封建并不是西周时期真正实行过的所谓的封建。他们希望恢复的所谓封建其实一个是理想，是战国时代以来的人所建构的。他们重点是要建构当代的新秩序，能够成为当时的一个所谓的贵族。到了东晋南朝的时候，各地的高门还有南朝的中士实际上统治着各地；他们拥有的实际权力，比汉代的王侯更接近于所谓的诸侯，更接近于封建制的恢复。这是实际的权力，名号上并没有。

陈苏镇教授则认为，天下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概念。古人所说的天下应当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的中原，儒家说是京师，就是核心地区，周边是诸夏，再向外是夷狄。内诸夏、外夷狄，在儒家的观点中这不是一个国际秩序，而是天子统治天下的一个阶段。这之前是内京师、外诸夏，当这个任务完成后，就会进入第三阶段——外夷狄。这个阶段完成后就是天下。汉代以来的大家对夷狄问题的认识可能不是主流的，想象中还有一个天下大同的阶段，天下实行同一个制度，天下太平。但那只是一个理想，实际中不可能实现。政治发展进程是长期停留在第二个阶段的，即内诸夏、外夷狄的阶段，从来没有进入过第三个阶段。册封体制问题就是在处理第二阶段的问题，因为京师之下是中国，向外则是夷狄。

最后，罗新教授再次对几位教授的到來和发言表示了感谢，并指出，册封体制的问题还有更多可以研究的空间，通过今天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也将引导册封体制问题向着更有趣、更充实的方向发展。

（撰稿：卢雨枫）

## （四）文研汇讲

### 01

#### 许宏： 三代、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



2017年3月7日下午，2017年春季学期第一次文研院内部报告会在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以“三代、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访问教授高曼士、文研院访问学者吕博、李霖、童岭、袁一丹、张瀚墨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参与讨论。众所周知，三代，指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大的历史阶段，其与史前时代、秦汉时代、明清时代等长时段历史

概念一样被提及，但三代的特殊性颇为鲜明，而这些特殊性并非是不言而喻的。

#### 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在中国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



演进及其作用。史前史研究的是尚无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初现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属于“原史时代”。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唐际根，1998）。由是，史前时代（石器时代）加上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20世纪80—90年代，各高校考古专业的“商周考古”课程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旁证性考古发现（如偃师商城）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尽管相关课程和教材专著定名经历了从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20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基本上还是关于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而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教材著作则都包括同时期的周边地区诸文化。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外围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三代文明 = 夏商周王朝文化 = 夏商周时代的文化 = 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所有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

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先生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许宏，2013）。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邹衡，1980）。罗泰教授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

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Lothar von Falkenhausen 2006）。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鉴于此，李伯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李伯谦，199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此后也有学者作了相关的思考。但迄今为止，仍无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

###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许宏教授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可归纳为：

（一）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 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 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 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 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 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 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 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 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研究, 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 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

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 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 到各类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 都会有长足的进展, 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 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 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 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最后, 许宏教授表示, 有理由相信, 中国青铜时代考古, 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许宏教授演讲结束后, 与会嘉宾就相关话题展开了讨论。

(撰稿: 许宏)

## 02

### 童岭: 贞观年间唐帝国的东亚情报、知识与佚籍 ——旧钞本《翰苑》注引《高丽记》研究

2017年3月14日下午2点,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了本学期第二场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由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副教授主讲, 题为“贞观年间唐帝国的东亚情报、知识与佚籍——旧钞本《翰苑》注引《高丽记》研究”。文研院

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 文研院访问教授许宏、高曼士, 文研院访问学者张瀚墨、袁一丹、李霖、吕博, 及北大文史专业的史睿、程苏东等学者参与了讨论。童岭副教授首先辨析了“佚籍”的概念, 并介绍他200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日藏六朝隋唐

汉籍旧钞本综合研究》。其中处理的旧钞本对象, 以《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伪古文尚书》《文选集注》《珣玉集》《翰苑》等钞本文献为主。从撒马尔罕(西)到奈良(东), 域外所藏中国中古的汉籍旧钞本, 其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 丝毫不亚于百年前的显学——敦煌钞本。这一点, 在中国大陆尤其是近五年来, 逐步得到学界的认可与重视。该博士论文拟于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将在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完成校样修订。童岭近五六年的又一个研究方向, 就是在域外汉籍旧钞本研究的文献基础上(钞本时代), 探求彼时欧亚大陆的知识、思想与学术。如著作《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商务印书馆, 2014), 以及目前正在翻译的已故扶桑东洋史大家内田吟风的著作《北亚细亚史研究》(商务约稿)。

隋唐东亚史的推进, 亦不外乎新方法与新史料两途。本次邀请论坛演讲, 童岭契合北京大学文研院邓小南院长提出的“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理念, 在既有文献考订《唐钞本〈翰苑〉残卷考正》(《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五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的基础上, 尝试从文献与文本两个角度, 详细考察《翰苑》注所引《高丽记》佚文的作者与断代问题, 以及贞观年间唐帝国的东亚情报、知识与佚籍情况。

旧钞本《翰苑》一卷, 原藏于日本福冈县筑紫郡男爵西高辻

信雄, 现藏于同郡太宰府町、太宰府天满宫。初步被认为是平安时代的此份旧钞本残卷, 于昭和六年十二月(1931)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翰苑》正文给人最大之印象即是四六骈体。唐代的文章众体兼备, 骈、散文作者皆不乏其人。可见《翰苑》也是在南朝隋初唐文学史发展脉络上之一环。如果说正文对于唐代文学史(尤其是骈文史)、类书等研究意义更大一些, 那么《翰苑》的注释文字则是考察中古思想史、学术史、东亚史的绝佳史料。《翰苑》注的史部出典近三十余种, 其中, 《高丽记》是一部佚籍, 在中土久已失传。

通过详细的文献排比考证, 童岭对学界通行已久的日本学者池内宏、吉田光男等作者问题提出商榷, 重新考订了《高丽记》的作者归属, 给出了不同于以往学界的新





说。

隋唐帝国的周边世界，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民族主要包括东北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北方及西北方的突厥（东突厥、西突厥）、回鹘；西南方的吐蕃；南方的南诏国。当然，西域诸国也包含在其中。一般而言，自公元620年至750年的一个多世纪中，基于自身的国力，唐帝国在对外策略上占有充分的主动权。

公元642年，泉盖苏文杀高丽荣留王（名义上是唐之蕃臣）。翌年，新罗请唐朝出兵高句丽。童岭认为，“十八家旧晋书”为基础的、题“唐太宗御撰”的唐代官修史书《晋书》，《高句丽传》的位置就不在传统的《东夷传》中（卷97），这意味着高句丽迟早将纳入唐帝国板块的雄心。所以《晋书》就不能单单说是两晋的实况，

而是唐人心态的一种表现。需要留意的是，新《晋书》修成之后，是作为皇家礼物赐予新罗等国的，其中的国际政治寓意十分明显。

贞观年间，唐代东亚史中非常重要的，当然是海东诸种情报的收集。童岭结合北美、日本学界隋唐国际关系史的最新研究，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逐条阐释了《高丽记》佚文与贞观年间东亚史实之瓜葛。在初唐人的知识体系框架下解读了《高丽记》。并将之与类似文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对比。

汇报完毕之后，与会学者们就注释学、钞本、隋唐东亚史、唐代著书体例等诸多相关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撰稿：童岭）



### 03

## 高曼士： 中式基督教风格：中国建筑本土化的主要工具

2017年3月21日下午，本学期第三场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工程学院建筑学部的托马斯·高曼士（Thomas Coomans）教授以“中式基督教风格：中国建筑本土化的主要工具”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访问教授陈国球，访问学者张瀚墨、袁一丹、童岭、吕博参与了讨论。

高曼士教授基于文献研究与现场踏查两个方面，长期致力于1949年之前中国基督教建筑的研究。对于当时的传教士而言，他们需要迎合中国人的喜好，为教堂选择一种恰当的建筑风格。这些教堂的建造者们既可以从丰富的西方风格库中选择诸如哥特、巴洛克、古典主义、折衷主义等明确的参照，也可以选择在建构类型、建造技术和装饰等方面杂糅中国与西方的风格。本次交流会上，高曼士教授通过丰富的图片资料展示了一些“中式基督教风格”（Sino-Christian Style）的代表性建筑，指出其建筑风格和特徵，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高曼士教授指出，1912年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逐渐建立起身份认同，而天主教廷也被迫妥协其“普世标准”以适应本土化的要求。那么，天主教廷是为何、何时



以及如何做出决定放弃西方建筑的范式（尤其是哥特风格），而选择了一种基于“中式基督教”的教堂设计风格作为本土化的范例？

### 一、历史背景：晚清时期的中国教堂

传教士们于17—18世纪在中国建造的建筑极少还有遗存，如17世纪早期建造的澳门圣保罗大教堂一直留存到1835年，直到一场大火摧毁了整座建筑，仅剩那片著名的巴洛克风格立面。这些条约口岸的教堂存在的首要要义，是明示西方信仰者以及外国势力的存在；在当时的城市中，中国的基督教信仰者人数十分有限，而教堂建筑的特定风格，则表达了不同殖民集团

的民族及宗教认同。

中国最古老的哥特教堂是建于1844至1850年的香港岛圣约翰座堂，其英国式哥特风格明确表达了其隶属新教圣公会的身份。1848至1853年，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建造了圣方济各·沙勿略堂（董家渡天主堂），该堂采用了代表法国天主教派的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天主教派又改奉哥特范式，如1863至1888年建造的广州圣心大教堂，严格模仿巴黎圣克罗蒂尔德教堂而建，而后者为哥特复兴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与中国传统建筑不同，这种带有两座高高的尖塔、垂直的线条以及全石结构的哥特风格，突显了外来基督徒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对立。

1900年以前，除位于外国租借地内的教堂外，中国其他地方的教堂大都更为温和，多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是传教士与中国皈依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一些传教士甚至以亲力亲为的方式去体悟中国文化。有的传教士临摹西方建筑元素及家具，并交予当地工匠制作实物，使得本地建筑传统与传教士言传身教发生杂交，从而繁衍出丰富多彩的原生教堂形式。但许多这类教堂都在反基督教的起义中被摧毁，或者日后被更大规模的教堂所取代。至今仍存的，如建造于1874至1876年的贵阳北天主堂（圣若瑟堂），就有着一副石造哥特式墙壁与中式木架结构、宝塔式钟楼的迷人混血面孔。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西方风格教堂的建造得到支持，尤其是那些为了彰显传教团体身份认同的各国哥特式变体建筑。这些教堂中，最富声望的是建于1906

至1911年的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而对于在内蒙古等偏远地区重建教堂而言，所必需的条件是：建造计划、一名建筑师及能够切割石材、立起拱券及穹顶、用砖砌筑地基及墙体、并能组装西式屋顶构件的当地工匠。比利时传教士和羹柏（Alphonse De Moerloose）曾在比利时学习建筑，奉行“哥特式是所有教堂的唯一普适风格”的信念，他在内蒙古的平原及山地中以一种普适开化者的角度散布比利时哥特风格，但这种哥特建筑很少采取与恶劣气候相适应的改变。如果它本身并非由经受过传教士训练的当地工人建造实现，或可被定义为“建筑的整体出口”，然而事实却是：它更应被视为一种技术的传播。

## 二、1920年代早期：走向中国式基督教建筑

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及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推动中国社会艰难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改变了西方国家（包括其殖民地及在华租借地）之间的关系。同时，传教士团体也并未脱离于这些国际紧张局势所带来的政治、宗教及国家利益纠葛。

1912年，罗马教廷设立天津教区宗座代牧职位，并将其授予法国遣使会。天津天主教西开总教堂于1917年建成，坐落于法租界之外，但法国单方面提出其周边地段同属法国资产。这使得中国人自然将天主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国帝国主义相联结。自1910年代中期起，新文化运动所燃起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必然会造成对不同基督教宗派传教活动的反感。而

新教徒们明显在建筑的本土文化适应方面更进一步，如建于1907年的北京圣公会教堂以及一些早期的大学校园建筑所表现出的建筑风格。

一战后，天主教廷认识到了西方殖民模式会对传福音于人民的行动产生反作用，于是“本土化”运动应运而生。而中国社会本身及基督教教堂均面临着政乱以及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使得本土化运动别具挑战。然而不论是本土化还是现代性，都将在年轻的共和国及罗马教廷的艺术及建筑上留下影响。

1922年，罗马教皇派大主教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来华任宗座代表，同时怀有落实教会本土化政策的任务，对“中国式基督教”建筑、艺术及家具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西方的风格，尤其是哥特式，与中国本土是极其不协调的。刚恒毅曾指出：“西方艺术在中国可以等同于风格上的错误。……因此在这个国家引进欧洲的罗马和哥特风格是一种失策。……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才能深入到中国建筑的灵魂中，并为其注入新的基督教生命。……建造一座建筑，使其既能够满足神圣仪式的需要，同时也能够拥有一种高等级的精神层面上的美。我们需要一位有能力的艺术家。天意将会指出这个人的所在。”

刚恒毅希望能够将创造中国式基督教风格的重任托付给中国艺术家，因为只有本土的艺术家才能表达出深层

次的中国灵魂，而西方人只能炮制出肤浅的仿中式建筑和艺术。但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当时并没有一位这样的中国天主教艺术家或建筑师。

## 三、中国式基督教风格的创造者：葛利斯

葛利斯（Adelbert Gresnigt）神父受刚恒毅邀请来华，并承担“创造中国式基督教设计”的任务。葛利斯自1927年3月至1932年1月，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年。1931年，葛利斯完成了自己对中国建筑的理论性思考，他不仅揭示了过度的现代化及西方影响带来的种种危险，还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应以基督教为源泉而获得生机。

刚恒毅委托葛利斯设计四大教育建筑：开封及香港的天主教教区总修院、宣化若瑟总修院、北京辅仁大学。这项任务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只是风格的选择，还包含了功能设计、有限预算及坚固结构等诸多课题。

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在当时已经设



计、建造了几所形式上具有中国文艺复兴精神的大学，如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学，它们均以紫禁城等中国宫殿建筑为模型，具有被各自独立的大殿所环绕的一系列院落空间。但这种美丽的建筑维护起来相当昂贵，且在华北地区的寒冬中很难供暖。葛利斯则选择了中国建筑的另外一种原型——长城及带有钟鼓楼的城墙，将这种东方原型与西方修道院的封闭式内庭围廊相嫁接，并用理性的空间布置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来组织。

葛利斯在中国生活的在这段时间里，专注于刚恒毅的伟大本土文化适应计划——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建筑的平面布置非常理性，被一个礼堂分割为两个对称中庭的巨大矩形，由四组带有教室、可容纳400名学生的宿舍的翼楼围合；位于四角的高塔楼，由收集自北京城墙废墟的城砖包砌。这所大学至今仍为前海西区的标志性城市景观，表达了辅仁大学本身所内涵的诸多特质，与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乃至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其他教育建筑风格迥异。

#### 四、推广中国式基督教风格的进一步尝试

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内部环境愈加动荡。比利时传教士米化中（Jozef Michiels）于1930—1933年建造的河北五号村教堂及河北安国天主教堂，都被视为中国式基督教建筑的代表。瑞士马利诺兄弟会的雅问道（Albert Staubli）也在广东设计了几座引人注目的中国式教堂。这种建筑风格最终与代表西方范式的哥特风

格、以及基于1919年教皇通谕精神而产生的传教士意识形态彻底背道而驰。

但这些本土文化适应运动确实在礼拜家具及图像上得到了发展。一些比利时传教士创作了卓越的作品，如方希圣（Mon Van Genechten）的绘画作品、甘保真（Jozef Raskin）的家具设计以及葛叶德（Leo Van Dijk）于1927年为中国基督徒们设计的一系列教义问答手册。一名陈姓中国画家于1932年信奉基督教并改名陈路加（又名陈缘督，Lucas Chen Yuandu），并运用深刻的中国精神及诗意来表达基督教的图像含义，还用中国人的面孔来表现圣经中的人物，后来在1930年代任辅仁大学美术系系主任。

然而，这些“建筑本土化”的尝试，一方面，受到许多怀念法国领地保护制度的传教士们的联合抵制；另一方面，为防止造成身份认同混乱的“中国式基督教风格”的反对者们，则希望建造带有钟塔及尖拱的基督教堂。而除了亨利·墨菲的“适应性建筑”，抑或是1930—1937年普利普-缪勒（Johannes Prip-Møller）在香港沙田道风山的实验之外，关于此时期新教团体中对于中国风格建筑的争论，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

高曼士教授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就中国基督教建筑中的人对其建筑风格的认识及参与度、国内外高校的建筑风格等话题展开讨论。

（撰稿：高曼士）

## 04

### 陈国球： 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

2017年3月28日下午，本学期第四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来自香港教育学院的文研院访问教授陈国球以“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访问教授许宏、高曼士、孙秀林，访问学者吕博、袁一丹、张瀚墨参与座谈。

陈国球教授首先指出，“抒情传统”在台湾是一种非常正统的文学理论概念，谈及中国文学时，始终绕不过“抒情传统”论。这一在海外与港台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深远影响的“抒情传统”说，首揭于旅美学人陈世骧（1912—1971）的论述，而以他在1971年离世前发表的宣言为标志——“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s a whole is a lyrical tradition）。本次演讲的内容主要围绕陈世骧关于“抒情传统”论的文学研究轨迹展开。

陈世骧，字子龙，号石湘，河北省滦县人，长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学系任教，主讲中国古典文学。陈世骧对港台学术的影响始于1958年，是年5—6月，陈世骧到台湾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演讲，包括《时间与节律在中



国诗中之示意作用》《试论中国诗原始观念之形成》《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宋代文艺思想之一斑》等。在《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中，陈世骧用一万两千字去讨论杜甫仅二十字的《八阵图》，有人认为是古典文学“新批评”传入台湾的最早实践之一。在文中陈世骧还提出了一种与西方悲剧有别的“静态悲剧”概念。

陈世骧的“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中国的抒情传统》）出版于1971年，是陈世骧最后、最重要的作品，中译删订版收入他的弟子杨牧所编的《陈世骧文存》，传诵至今。在这篇文章中，陈世骧直面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谜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



的史诗和悲剧？陈世驥指出，中国文学的荣耀别有所在——在其抒情诗。后来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1929—2017）再有赅续，创为“抒情美典”说，在“Chinese Lyric Aesthetics”（1985）、《试论中国艺术精神》（1986）、《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2002）等论文中加以发挥，进一步影响了港台许多当代学者的中国文学观。此外，“抒情传统”论还以进入大学课程的方式（如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得以流播。

事实上，陈世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是一位活跃的参与者。1936年，陈世驥与北京大学的老师艾克敦（Harold Acton）联合英译《中国现代诗选》；此段时间，陈世驥参加过朱光潜的读诗会，同时参加的包括沈从文、梁宗岱、冯至、废名、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等；此外，陈世驥与“汉园三友”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是先后同学，与林庚是友侪。陈国球教授指出，陈世驥这一“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活跃参与者”的身份，与他之后在美国的“华裔汉学家”身份如何联系起来，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话题。

陈世驥1935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于诗刊的意见》，这是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早期论述。陈世驥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诗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平常语言不同，这种语言是我们所“理想”的，能够“代表我们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的语言，而对这种语言的要求，“绝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义和表面上的音韵铿锵，而是它在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

随后，陈国球教授以时间为脉络简要回顾了陈世驥自1942年起的一系列著述，展现了陈世驥的文学研究轨迹逐渐走向“抒情传统”之路的过程。其中较为重要的有“A Poet in Our War Time”（1942），他以卞之琳抗战时期的《慰劳信集》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卞之琳从个人主义到面向人民大众的诗风转身，特别注意到卞之琳“别具的魅力与感应能力”（inborn poetic charm and sensibility）；“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1948）为陆机《文赋》系年（永康元年，张华被杀，此年陆

机文学创作“大爆发”），陈世驥提出“文学是光，对抗黑暗”的创见性理论，认为《文赋》不是纯文学的技艺讨论，而是“the contemplation of creation at a sublime hour of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s chaos and gloom”；《探求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1951）中，陈世驥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指出《诗经》中“诗”字的出现代表了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诞生，而之后“情志”的出现则代表了现代意义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的文化本质》（1953）则提出了中国文学的五项特征——资源与灵感多来自民间、诸神英雄被转化为圣

人贤君、重文轻武、离不开人本或自然的领域、语言易与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相通。而更清晰显示陈世驥“抒情传统”论的是《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1961）、“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1969/1970）与“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1971）这三篇文章。

陈世驥先生的文学研究轨迹，体现出他逐渐步向“抒情传统”论述的过程；而研究陈世驥先生的学思之旅对于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撰稿：陈国球）

## 05

张瀚墨：

### 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结合能告诉我们什么： 一个早期多幕叙事的例子及其解读

2017年4月6日中午，本学期第五场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张瀚墨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结合能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早期多幕叙事的例子及其解读”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访问教授高曼士、孙秀林、许宏，访问学者吕博、仇鹿鸣、袁一丹参与了讨论。

本报告可以看作是早些时候文研院访

问教授许宏老师所作报告讨论的延续，试图通过对一个具体实例的剖析和解读，展示传世文献在解释出土材料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报告同时也强调了传世文献形成和流传的复杂性，以及历史叙事的书写与图像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提醒大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性，以避免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任何一方的直接和生硬的套用。

大部分早期铜镜多没有出土背景，学界对有人物装饰的铜镜的解读往往流于随意，或是过重于依赖理论，即重构的社会、历史或宗教解释框架，而导致对铜镜装饰内容自身研究的弱化。报告从介绍寇岑（Lloyd Cotsen）先生的一面私人收藏的铜镜镜背的丝质装饰图画开始，通过擂鼓台西汉墓出土的一件漆奩上的装饰图案与寇岑先生的这面丝质镜背图案的对比，并利用上海博物馆及其他博物馆藏铜镜镜铭，更重要的是相关传世文献叙事，不仅对铜镜内容作出了解读，并对铜镜及其丝质镜背的真伪作出了判断。

寇岑先生收藏的这面铜镜镜背的装饰图案由三个画面组成，相邻画面之间由树分开，装饰要素包括男女人物、树木和动物形象。因为没有文字说明作提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知道这三幅画面所代表的意思。



湖北襄阳擂鼓台西汉早期墓里发现的漆奩上的装饰一共由七幅画面组成，相邻画面之间也是由树木分开，装饰要素包括树、男女人物和长毛动物的形象。通过对比，人们不难发现，寇岑收藏铜镜镜背上的装饰图案与擂鼓台漆奩上的相关画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寇岑铜镜丝背上的三幅图画就包含在擂鼓台漆奩装饰的七幅图画中。但是由于擂鼓台漆奩上的装饰图案也没有文字提示，此前无论是发掘报告还是后来的研究作品，都未能对漆奩装饰画上的内容作出正确解读。

帮助解读擂鼓台装饰画所表示的叙事的关键证据是一组被称作伍子胥主题的铜镜。这组为数不多的铜镜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铜镜镜铭透露出这组铜镜镜背装饰所表达的是吴越争霸故事中伍子胥向吴王夫差进谏的场景。伍子胥主题铜镜装饰中成对男女人物与擂鼓台漆奩上相关装饰画面的相似性，帮助我们确认漆奩装饰所表达的正是吴越争霸的故事；而像《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样的传世文献，又进一步不但帮助我们识别出擂鼓台漆奩装饰中成对男女的身份，而且告诉我们，擂鼓台漆奩装饰所表达的，正是越国使用美人计瓦解夫差斗志以达到灭吴目的的故事。

吴越争霸故事的艺术表现形式过去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其证据就是为数不多的几面伍子胥主题装饰铜镜。但擂鼓台漆奩装饰的解读，将此类故事的艺术形式表达进一步向上追溯到西汉早期，比先前认为的提早了几百年。而且，越国对夫差施展美人计故事的主角西施和郑旦的艺术塑造，无论从图像还是从文本的角度看，



也比过去所认为的要早得多。由于目前还没有西汉早期已经形成关于西施、郑旦的文学叙事的证据，我们对过去所强调的文本对图像艺术的单向影响的观点必须要进行反思。除了有口头流传的吴越争霸故事对艺术创作的可能影响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艺术形式（比如绘画）对故事书写的影响；也就是说，书写与艺术的影响关系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

由于擂鼓台漆奩上的七幅图画共同表达了吴越争霸故事中与越国对吴王夫差施展美人计的故事，有确定的人物、清晰的情节、可辨认的高潮以及明星的叙事逻辑，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这是西汉早期一种利用多幅画面讲述一个特定故事的艺术表达形式。这就推翻了艺术史界普遍接受的中国美术在汉代以及汉代之前不存在多幅叙

事画面的论断。

另外，通过对寇岑铜镜镜背装饰构图的分析，通过这种构图和擂鼓台漆奩装饰图画叙事逻辑的比较，我们还发现，寇岑藏镜的丝质镜背上的装饰是对擂鼓台漆奩装饰局部的现代模仿，因此从物质材料是讲属于现代伪造作品，这一点也得到了实验室数据的证明。

在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对汉代丝绸来源、铜镜图画与吴子胥故事关联、铜镜的读者问题、吴子胥故事的版本变化与情节的增长、汉代图画与敦煌口传文本传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撰稿：张瀚墨）



## 06

仇鹿鸣：  
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

2017年4月11日中午，本学期第六场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仇鹿鸣以“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访问教授高曼士、孙秀林、许宏，访问学者童岭、吕博、张瀚墨、袁一丹参与了讨论。仇鹿鸣老师在本次演讲中借助文研院跨学科交流的机会，探讨了历史研究中实证工作与解释框架的构建之间的关系。

最近三十年来，史学内部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实证研究的细化与深化，但伴随产生的是理论缺位的焦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史学研究已经成为证明或证否某种社会科学理论经验事实的提供者。

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出两种取向，第一种是在放弃原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决定论式的解释模式后，倾向于把实证研究置于某一大时代观照下展开论述。在唐宋史中典型的便是对唐宋变革论的广泛称引，即将实证研究置于唐宋变革视域中呈现意义。值得思考的是，是否这一时期每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变化都可以上升到变革这一层面，或者置于变革这一潮流中加以解释。第二种则是随着研究议题的深入与分散，学者更多地使用多因论解释模式的流行，这一方面还原了历史过程中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似乎降低了结论的精确性与解释力。那么在实证研究日益充分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对于一些重要的旧议题重建新的综合性解释？

仇鹿鸣老师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进行了尝试。昭义军作为唐王朝防遏河朔三镇所设立的藩镇，由于其横跨太行山两麓的独特政区规划及重要的战略地位，受到不少学者关注，但总体而言，学界的研究重点仍集中于辨析昭义军控遏河朔三镇的成效与武宗时平定刘稹之乱这两个议题上。由于史料匮乏，对于晚唐昭义军的一般印象主要包括：唐武宗平定刘稹后，昭义军的节度使改由文官出任，而且多不久任，朝廷控制得到强化，但另一方面，镇内动荡不安，多次发生骄兵逐杀节帅事件，与前期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新刊布的《李裔墓志》则为探讨晚唐昭义军的刘广之乱提供了重要史料。

《李裔墓志》指出，刘广驱逐昭义节度使高湜一事中刘广是以刘稹后裔的身份煽动叛乱。乾符四年的刘广之乱，上距会昌伐叛已有三十余年，甚至超过了刘悟祖孙三代统治昭义时间的总合，但直至此时，刘稹依然是昭义镇内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政治符号，这就提醒研究者需要重新检讨唐廷收复昭义之后，治理泽潞策略的得失。根据传统的认识，在会昌伐叛成功之后，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围绕着如何杜绝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复现，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清洗刘稹宗族及其余党。但从新出《李文益墓志》《高元郾墓志》中，可以注意到刘氏昭义时代旧人并未被完全清洗，李德裕的清洗并未能动摇昭义军的构造，失去了强有力节帅的弹压，跋扈的骄兵造成了昭义的动荡不安。

从这一个案入手，仇鹿鸣老师将中晚唐的藩镇动乱分为“政治性的反叛”“经

济性的骚乱”两种类型。“政治性的反叛”追求藩镇的割据自立、节帅之位的自相承袭，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藩镇间合纵连横，甚至不惜主动挑起与唐廷的战争，具有外向型的特征。“经济性的骚乱”则是分散而偶发的事件，频度在晚唐日渐提高，反映藩镇将士自利性的诉求，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范围则集中于镇内，是内向型的，基本的骚乱形式是驱逐原节度使，拥立新帅，并不直接挑战唐廷的权威。而刘广之乱尽管以刘稹之后为号召，但本质上仍属于“经济性的骚乱”，并非是刘稹之乱这样的“政治性的反叛”，其主要表现在动乱的起因是“士卒月储、岁衣不足”，刘广最终拒绝了部下提出攻打泽州迫使朝廷授予节钺的建议，并无挑战朝廷权威的意图。

仇鹿鸣老师进一步指出，昭义军为何会从中唐忠于朝廷、抗击河朔藩镇的“中原防遏型”藩镇，转变为晚唐内部动乱不安的局面，原因在于刘氏统治昭义时代，为了驱使将士支持其自相承袭的统治，采取厚加给赐的策略，导致了昭义军的骄兵化。骄兵是依赖丰厚给赐维系忠诚的自利群体，这类“骄兵化”的进程可以说在中晚唐各个藩镇中曾普遍发生，节帅只有给予将士更丰厚的给赐，才能换取部下支持其对抗朝廷，谋取不受代甚至自相承袭的地位。但重复赏赐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将士的欲望更加难以填满，更容易受到煽动，进而镇内骚乱愈发频繁。中唐时期，藩镇基本的权力构造一般是节帅与军将的密切结合，形成稳固高效的统治模式，塑造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从而具有谋求

自立地位、挑战唐廷的军事力量，导致“政治性的反叛”多发，朝廷与藩镇间战争不断。而至晚唐，各藩镇包括河朔三镇在内或多或少都发生了“骄兵化”的过程，节帅受困于骄兵跋扈，自顾无暇，根本无力挑战唐廷的权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反而变得稳定。

在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围绕着概念的界定与精确化、解释模式的有效性、新出墓志的运用及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仇鹿鸣老师指出，在跨学科的背景下，与倾向于综合性解释框架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历史学研究者更为注重研究的细节，但其结论也因此多缺乏“明快性”；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学研究提出的各种“解释模式”，必须经由一定数量

的个案检验，不断完善解释模式，方能显示出有效性与其说服力，同时要避免那些背离史学传统、套路式的解释模式。

对于墓志文本的运用问题，仇鹿鸣老师指出，现在学界多对正史中有传人物加以关注，但事实上这些人物的墓志文本中溢出传统史籍的新材料并不多，反而是与传世文献联系较弱、无传的小人物的墓志材料中容易发现新的内容，将来可能有助于历史中基层社会的构建。仇鹿鸣老师认为，墓志作为一种强格套性的文本，其最大的价值是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传世文献，可能关注到一些以往传世文献研究中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

(撰稿：仇鹿鸣)

## 07

### 吕博： 《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世界

2017年4月19日中午，本学期第七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吕博以“《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世界”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访问教授高曼士、孙秀林、许宏，访问学者仇鹿鸣、童岭、李霖、徐晓宏、袁一丹参与了讨论。吕博老师在本次演讲中借助文研院跨学科

交流的机会，利用《广弘明集》中所收的《七录序》，探讨了南朝齐梁时代文化学术发展的概貌。

吕博老师首先介绍了唐长孺、周一良、金克木、胡宝国、吉川忠夫、田晓菲等学者关于南朝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些著作。其中吕博老师特别强调胡宝国先生近年来发表的《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知识至上”



以外的《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等系列文章，最能给他启发。吕博老师指出，“知识至上”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涵盖力。这个概念是指南朝士人推重读书、追求新知、崇尚博闻的倾向。很多史料可以表明，南朝书读的多人，往往能获得“博”的高名。而极致的“博”，就是几乎阅读完那个时代所有的书，即“博极群书”。阮孝绪就是梁武帝时代“博极群书”的代表。书籍目录《七录》就是阮孝绪阅读生涯的总结。《七录》分内外篇，包含五十五个学术门类的书籍，有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阮孝绪自己认为“天下之遗书秘记”，尽归《七录》。

吕博老师认为，从私人阅读的角度来讲，《七录》是阮孝绪个人“阅读史”的总结，包含了自身的“知识轮廓”。不过，因为阮孝绪的“阅读领域”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所以，探讨阮孝绪私人阅读的历程也就具备了更大的意义。阮孝绪个人的阅读史与精神前进的历程，其实也是整个南朝齐梁时代学术文化、精神世

界变化的缩影。

吕博老师从此立论出发，广泛利用各种材料，复原了阮孝绪读书生涯的一些片段。阮孝绪幼读《孝经》等儒家经书。十三岁那年，已遍诵《五经》。因为通读儒家群经，所以儒家的核心理念“孝”，成了他的思想底色。在阮孝绪十五岁(494)那年，他的父亲阮彦之为他举行了冠礼。重要的成人典礼之后，成年的阮孝绪表现出来的志向却是隐逸与促生。吕博老师考证指出，诸种迹象表明，他在十四岁、十五岁的时候，可能阅读过《列仙传》《神仙传》之类的书籍。《神仙传》带来的新鲜思想，让他着迷。阮孝绪从此恪守隐逸信念，独居一室。一直到四十岁，阮孝绪还保持着隐逸的生活状态。但是，经过25年的酝酿，阮孝绪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天监末期(519)，阮孝绪搜集群书，撰成《高隐传》。该书保留的部分内容透露出他在此时有了道本儒末、儒道调和的思考。不过，这还不是阮孝绪思想的终点。相关史料透露出，他在晚年有了投身佛教宗教实践的活动。除了罄心敬礼佛像外，他还恪守佛

教戒律，“以蔬食断酒”。阮孝绪与梁武帝一样，成了皈依三宝的素食主义者。

这种精神领域的变化，迅速地反映到了《七录》的撰作当中。梁武帝普通四年（524），阮孝绪四十五岁，写作《七录》。在《七录》中，他第一次正式将《佛法录》与《仙道录》编入目录，设立外篇。阮孝绪编“佛法录”于“仙道录”前，颇有深意。在阮孝绪看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教义有深浅，所谓“释深道浅”；二是因为“所宗有不同”，所谓“王道阮佛”（王俭是琅琊王氏，可能是天师道世家），这反映了阮孝绪思想的又一次变化。

通过复原阮孝绪的阅读生涯与精神历程，吕博老师总结说，阮孝绪虽然号称是与世隔绝的隐士，遁迹江湖。但在齐梁之际，他几乎受到了每一次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佛法录”与“仙道录”构成《七录》的外篇，就是对齐梁之际社会思潮与精神领域变化的反映。

吕博老师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阮孝绪博极群书，对某个学术门类书籍现存多少，了然于胸。所以，《七录》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某个学术门类现存书的数量。阮孝绪对刘歆《七略》与王俭《七志》各个子目所作的改名、拆分、合并，及时地反映了齐梁之际学术文化发展的状况。吕博老师正是利用这种子目名称的变动，以及各个学术门类现存书籍的多少，探讨了齐梁时代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术数、宗教等学术领域发生的变化。

接着，吕博老师敏锐地指出阮孝绪知识体系中的缺环。他发现，现存阮孝绪的相关史料丝毫没有显现出他对兵学有任何

研究，也没有写作任何有关兵书的著作。吕博老师进一步论证说，其实，无或者少也能体现时代特色。“无兵”也是南朝的学术风尚。在汉《七略》的分类中，“兵书”独占一个类目。阮孝绪因为“兵书既少，不足别录”，所以把兵部合并到子部，称《子兵录》，成为《七录》内篇的第三部分。兵书寡少与南朝尚武精神的没落，密切相关。《颜氏家训·诫兵篇》便集中反映出当时士大夫对于兵的态度。颜之推指出，本来以前“习五兵，便乘骑”的人被视作“武夫”，但有梁一代，只要是不读书便被称作武夫，被视作“饭囊酒瓮”。而南朝人蔑视兵学的事件，史籍斑斑可考。此种风气反映在官制上就是所谓“南朝武位不逮文职”。反映在总结学术文化的书籍目录上，就是由汉代“兵略”变为“子兵录”。

吕博老师最后总结说，阮孝绪的精神历程，其实也立体展现了齐梁之际社会精神风貌的变化。三教渐习是这个时代精神领域最显著的特征。阮孝绪的知识旨趣与撰作倾向，体现了南朝学术、文化各个领域发展的大概面貌。

在讨论的过程中，童岭老师指出，从狭义学术的角度讲，除博之外，“通”也是六朝时代重要的学术概念。仇鹿鸣老师就“无兵文化”等概念提出了质疑。高曼士、徐晓宏就阅读史、百科全书与知识分类等问题与吕博老师展开热烈探讨。

（撰稿：吕博）

## 08

### 袁一丹： 沦陷下的表微之学——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



2017年4月25日，本学期第八场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袁一丹发表了以“沦陷下的表微之学——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为主题的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报告会，访问教授陈国球、许宏、孙秀林，访问学者仇鹿鸣、童岭、李霖、徐晓宏、吕博参与讨论。本次报告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考察沦陷下的文史之学，不只是钩稽学术史、教育史的一个片段，而试图呈现在特殊历史语境下，业已专门化的文史之学与学者个体的生命践履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于抗战时期的学术史、教育史，目前谈论较多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被视

为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战争状态下民族精神的象征。然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大学教育，怎么评判抗战八年留居沦陷区的学人群体以及他们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牵涉正伪之辨，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北平沦陷时期的大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日伪扶植的，如伪北大、伪师大；一类是教会大学，以燕大、辅仁为代表；还有少数私立大学。沦陷之下，大学何为？用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说法，无论何时何地，大学教育应具备两种特性：其一，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净土，应不受时局的侵扰，不受偏见与宣传的影响，可以自由进行教学工作，于知识的探求与应用外，别无目的；其二，大学应与其所在的社会、国家发生密切的关系，自视为外在环境中不容割弃的一部分，并从环境中汲取新的材料、动力，以应付国家的需要，包括危机时刻的特别需要。这两种特性并不冲突，因为大学在国族延续中的特殊功用，是以保持自身的绝对自由与清白为前提的。

教会大学在沦陷区的特殊位置，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看来，一是成为“遗民的渊藪”，对留平学者起到一定的政治庇护功能；二是“留读书种子”，国立大学相继南迁后，教会大学成为沦陷区青年最向往的高等学府；三是“用夏变夷”，陈垣区分“仕异国”与“仕敌国”之不同：“仕

异国者客卿耳，仕敌国则降虏”。

报告主题中的“表微”一词，出自陈垣沦陷后期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陈垣沦陷时期的著作，以“表微”命名的虽然只有一部，但事实上其他几部著作，如《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及“宗教三书”都带有表微性。所谓“表微”，简而言之，就是史家有感于当下的处境，援古证今。换言之，就是找事实，找能与当下处境构成映射关系的历史事实。史家的技艺体现在古事与今情、古语与今语的“勘合”。

“表微”之学的出现，源于事变前后北平史学风气的转变。1943年陈垣在写给弟子方豪的信中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钱大昕；事变后，趋于实用，推崇顾炎武；后又进一步提倡有意义的史学，在辅仁讲全祖望《鲒埼亭集》，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从钱大昕到顾炎武，再到全祖望，取法对象的变化，暗示着史学风气随时势而转变，明显是要下猛药，救时弊。

辅仁根柢虽浅，在校长陈垣的悉心经营下，发展出与北大、燕大不太一样的文史传统。辅仁文史之学的特殊面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垣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多从大学之外网罗人才。譬如国文系主任余嘉锡是科举出身，曾做过六品小京官；史学系主任张星烺在转向史地研究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化学师。这样的学者，若按照现在的大学教员任用标准，没有对等的学历或相应的教学经历，根本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更没有资格担任系主任一职。

辅仁文史两系聚集的这批学者虽各有专长且做出不俗的成绩，但在二三十年代

北平文教界的位置其实是相对边缘的，他们对以北大为中心的学术圈及其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多少心存不满。比如张星烺在给陈垣的信中批评北大文科排斥异己，有党派之见，认为所谓新文化主义，不过是白话文与男女同校而已。张星烺对北大文科及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代表了一批边缘学者的共同看法。

因为辅仁起初局面不大，陈垣的学术声誉及社会影响明显在众人之上，所以他在用人以及整个教学导向上有相当大的主导权。陈垣一贯主张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认为思想史、文化史等，大而无当，不构成专门之学。要成为专门学者，必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两个门类或一两个朝代，才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否则“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议的、教科书的”，可以盛行一时，但不会传之久远。

陈垣、余嘉锡的治学路径，都是从目录学入手，这一点造成了辅仁文史之学与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新文学、新史学在知识结构及学术趣味上的根本区别。余嘉锡一般被视为擅长考据的目录学家，往往忽视了他身上“汉宋兼容”的一面。他用力最深的《四库提要辨证》并非单纯的考据之作，许多条目可以从汉宋之争的角度来看。余嘉锡指出《四库提要》的许多错误，是由于主事者纪昀的汉学立场导致的。余嘉锡在考订事实之外，还忍不住站出来为宋儒、为理学辩护。

这种“汉宋兼容”的治学取向，与辅仁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二为一的教育导向是一致的。以1939年辅仁入学

考试的作文题为例，“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问之事论”，这个题目出自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在顾炎武原文中，“学问之事”是与“有耻之事”并举的。所谓“有耻之事”，在明清易代之际，主要指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挪到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语境下，则指向学人群体面临的政治选择与伦理困境。余嘉锡有一条读书札记专门阐发顾炎武《与人论学书》对当下的意义。他认为考据学盛行之后，“菲薄周孔、掎击程朱”的反礼教思想也随之兴起，再加上学界“惑疑复古”的风气，共同造成“礼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行为失范。这是余嘉锡于考据之外，表彰宋明理学的现实关怀。

报告的后半部分以沦陷时期《辅仁学志》上的四篇专题论文：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余逊《南朝之北土地位》、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周祖谟《宋亡以后仕元之儒学教授》为例，具体说明“表微”之学的现实指涉。上述几篇论文涉及的时段，包括东晋永嘉南渡、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选择这些历史时段，是因为沦陷下学人面临的道德考验，与士人群体在这些危机时刻的遭遇有可类比性。沦陷下的表微之学即建立在这种朝代间的类比之上。

沦陷时期反而是辅仁文史两系的兴盛期。当时陈垣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余逊、启功、柴德赓、周祖谟四人常到陈垣的励耘书屋去请教问题，被戏称为“南书房四行走”。以周祖谟为例，七七事变后其因家庭原因留在北平，1939年被陈垣聘到辅仁大学教授国文。周祖谟主攻语言音韵学，

但沦陷时期在陈垣的影响下，多读史书及宋元人文集。《宋亡以后仕元之儒学教授》一文讨论宋元之际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按元代的学官制度，儒师当中授命于朝廷者称之为教授。周祖谟考察这些士人出仕元朝的原因及出仕以后的自我忏悔。出仕新朝而且还是异族，一般被视为士人的污点，但周祖谟认为在异族统治下传授儒学，有化民成俗，以保读书种子的作用。周祖谟对儒学教授的评价，可能过于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的历史评价，其实是一种自我期许，回应了报告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沦陷之下，大学何为，学人何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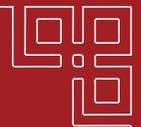
总而言之，以北大倡导的白话文及反礼教思想为假想敌，20世纪30年代异军突起的辅仁大学逐渐形成有自家面目的文史传统：提倡窄而深的专题研究，主张从目录学入手，以考据见长但又不止于考据而已，强调宋明理学敦士节、正人心的作用。七七事变后，辅仁的文史传统应时而变，转向援古证今的“表微”之学，在诗史考辨中寄托心事。基于陈垣、余嘉锡诸人在治学路径上的高度契合，及其弟子柴德赓、牟润孙、周祖谟、启功、余逊等在研究领域甚至论文选题上的继承性，袁一丹老师提出或许可将这批沦陷时期聚合在辅仁的文史学者视为一个潜在的学派。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就“辅仁学派”的命名、能否以“汉宋兼容”概括辅仁的文史之学、“表微”的危险、燕大与辅仁的区别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袁一丹）





## 专题会议



## “十九世纪美国的历史遗产”学术研讨会及对话会



2017年3月18—19日，以世界著名美国史学者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教授受邀访问北大为契机，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会同中国美国史学会主办的“十九世纪美国的历史遗产”学术研讨会暨中美学者对话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希、王立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梁茂信，以及来自中国十余所高校的青年美国史学者参加了此两日的会议。此次会议得到了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及光华教育基金会的特别支持。

会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就本次研讨会召开的主旨、目的和流程作了简要的介绍，指出本次会议旨在通过展现年轻一代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强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交流。在随后的致辞中，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美国

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先生，就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埃里克·方纳的学术成就及方纳家族之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的贡献，进行了概要的说明及简要的回顾。

之后在第一组主题为“早期共和时代的公民资格、民主与政党政治”的专题讨论中，中共中央党校青年学者邵声宣读了论文《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面临的分歧与挑战》，上海师范大学讲师蔡萌主分享了论文《“罗德岛问题”与美国的代表制民主》，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杨钊宣读了论文《“和谐年代”的党派纷争：纽约州政党政治与美国第二政党体制的起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分别对三篇论文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议并提出问题，随后各位与会人均做出了简短的回应。在第二组关于“内战前的市场革命、跨大陆铁路建设与反对奴隶制政治”的专题讨论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董瑜宣读了论文《商业公司引发的冲突与美国建国初期北

方乡村的社会转型》，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青年讲师于留振宣读了论文《“世上最伟大的国家”：美国横贯大陆铁路思想的缘起与早期实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华宣读了论文《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民主政治的演化》。在之后的评议中，王希教授认为董瑜的文章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建国初期北方乡村的社会转型问题，而于留振则通过“经济政治学”的方法追溯了横贯大陆铁路建设的思想起源。

第三组专题讨论，是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教授主持的题为“工业化和进步时代的公共卫生、国家建构与政治者的改革”，来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晶宣读了论文《从环境治理到疫病防治——进步运动时代纽约市公共卫生改革》，来自北京大学的焦姣分享了她的论文《“生活费用”调查的失败与19世纪末美国政府数据统计的政治》，来自四川大学的王禹宣读了论文《“大佬”拉福莱特的“机器”：进步主义运动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侯深教授对三位作了精辟点评。第四组主题为“转型时代的恋爱自由与华裔权利——兼论美国公共住房研究的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讨论，由东北师大梁茂信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曹鸿宣读了论文《爱情、婚姻与自由——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自由爱”运动与社会政治转型》，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伍斌宣读了论文《劫后重生：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中国城的原址重建及其意义》，来自厦门大学的李莉宣读了论文《中国的美国公共住房研究：回顾与展望》，随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张永安教授就三人之作做了深入的点

评。

方纳教授在最后为研讨会作总结评议，他从论文脚注大量引用的原始文献中，指出中国美国史研究和美国的差距在缩小。同时方纳教授以意大利学者将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入美国史研究领域，以及E.P.汤普森（E.P.Thompson）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对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巨大影响为例，指出中国学者或许可以在方法论意义上给予美国史研究以新的思考。之后方纳教授肯定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光明未来，指出其意义不仅在学术层面，同时也为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人提供认识美国的全新视角。

3月19日上午，在方纳教授与中国学者对话会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首先就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研究现状作了回顾，之后方纳教授向与会者分享自己的治学经历并介绍了美国美国史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在方纳教授的学生时代，美国高校的历史教学循规蹈矩，非裔美国人史、妇女史、劳工史等研究方向尚未出现，当时正值美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民权运动方兴未艾，在现实关怀的激励下，新的研究对象进入政治史学者的视界，学者的目光不再囿于男性白人精英政治，开始将目光转向非裔美国人、女性和底层民众。方纳教授指出自己那一代的美国史学家完成了一次“自我再教育”，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重新审视并书写了美国历史。方纳教授也指出了新史学的弊端，指出新的叙事显得碎片化，且不利于教学，但是新史学叙事对历史的还原度更高，解释力更强；新社会史在这种背景下兴起，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开始影响美国史学界。方纳

教授认为美国的史学研究包括了以下几个发展趋势：第一是重新思考“边界”，既包括地理上的边界，也包括文化心理的边界；第二个趋势是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不过进行此类研究的难度大，对研究者的语言功力和跨学科知识功底要求更高。此外，方纳教授认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学者获得研究材料的渠道越来越多，可以获得的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足不出户即可

获取以往无法想象的历史文献。之后，方纳教授又同与会者讨论了青年学者所系心的问题，如全球史的发展方向、如何选择研究选题等。方纳教授鼓励中国的青年美国史学者立足于全球美国史研究前沿，不断做出新成果。

（撰稿：张大鹏）

## 学术论坛 唐宋官私目录三题

2017年3月2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以“唐宋官私目录三题”为题的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层举行，此为北大文研院“书志与书史”系列活动之第一期。引言人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马楠，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程苏东、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博士，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天然参与了讨论。

引言人马楠向大家报告了近期她在唐宋官私目录研究领域所进行的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她所报告的第一个主题是“《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她指出，文献学研究中，刻本卷首或卷尾所记载的撰

人衔名或校勘官衔名一般为著书或校勘时所任官职，几乎可以视作常识，宋代刻本及唐人写卷中均有验证。余嘉锡先生指出《隋志》中一人署衔往往前后不同，所著录也当为著书时官。但马楠经过研究却发现，《隋志》著录的撰人衔名大多为终官、赠官或（最后一次被征召时的）征召官，也有小部分（不足两成）著录的撰人衔名为著书时官。前者主要受到了南齐王俭《七志》、萧梁阮孝绪《七录》这样解题、叙录型目录著作的影响，所谓“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最基础的来源则是史传文献的记载；后者则可能来源于直接或间接抄录写本结衔，自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以来，魏晋南北朝的官修、秘书省目录即有直接过录写本书名、篇题、作者名氏、字数的特点。随后，马楠以大量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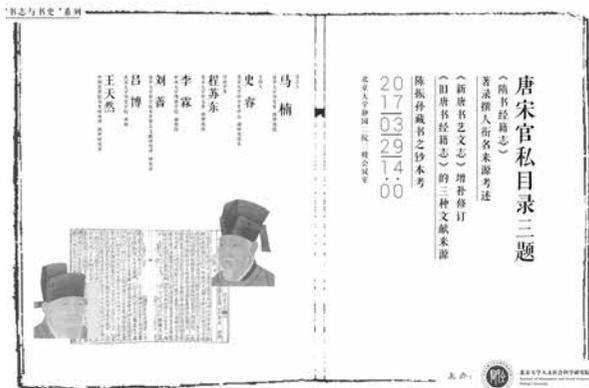
体详实的例子以及其他关联证据，证明了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马楠以若干实例，表明这一研究结论可以起到补充撰人官阙仕履和推排著书时间的作用。

马楠报告的第二个主题是“《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经籍志》的三种文献来源”。按照一般的理解，《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书籍包括“著录”和“不著录”两大部分，前者是指《旧唐书·经籍志》——即毋煚《古今书录》已经著录的书籍，后者则是欧阳修补入的书籍。据马楠考证，《新唐志》的“著录”部分不仅包含了《旧唐志》，其实还包括了《隋志》，也就是贞观时见存书和开元时见存书的综合。而《新唐志》的“不著录”部分，主要依据了庆历元年编就的《崇文总目》等书目文献，即北宋时所见唐代著述；“不著录”的另一部分则是根据史传文献（如《旧唐书》《唐会要》等）的记载补入《新唐志》，即唐代所应当有的书。不仅如此，《新唐志》还利用《隋志》《崇文总目》与史传文献修订了“著录”部分的书名、撰人、卷数，导致不仅是“不著录”部分，即便是“著录”部分，也不能视为确有其书、实有其卷。最后，马楠讲到靖康之乱后，北宋禁中官府图籍、版片尽被金人掳去；南渡后搜访图籍，颁下府州军监的主要是三种目录：《新唐志》、“绍兴改定”《崇文总目》以及“绍兴改定”《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但正是因为依据了这三种目录访书，导致南宋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都产生误解，认为《新唐志》著录书籍是北宋见存书。

马楠报告的第三个主题是“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马楠一开始即指出，诚如王重

民先生所说，陈振孙私家藏书数量得与《中兴馆阁书目》《续目》相侔，背后一定有发达的印刷业作为技术支撑。但王重民先生还有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非常重要的判断：一般认为记录了不同的刻本是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的一个特点，但在晁公武、尤袤的时代，刻本书的数量还未超过写本书，而且《遂初堂书目》里记录版本的确限于九经、正史，只有到了赵希弁和陈振孙的时代，刻本书的数量才超越了写本书。马楠认为，王先生的判断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但根据明初《文渊阁书目》“侵板十三，抄本十七”的说法，仍有可商榷的余地。随后，马楠举出了许多容易忽视、具体入微的证据，指明陈振孙所藏书中确实存在大量写本或抄本（包括唐写本、北宋写本），并指明了其许多藏书的具体来源（如他人赠送的写本、陈振孙手录本，在鄞县、南城、莆田所传录的书籍等）。马楠还指出，陈振孙的藏书中，很多书籍是根据刻本抄写的，也存在相当数量的书籍是刻本与写本并行的，另有许多书籍宋时从未刊刻。即使是合编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国史艺文志，总记十三朝的《宋史·艺文志》，其中也存在大量唐写本、五





代写本、宋馆阁写本和进呈本，依然不能概以刻本视之。

之后进入自由讨论环节。吕博表示，马楠经过细致的考证、比勘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也解开了他读书过程中的一些疑问。随后，吕博提出了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对《隋书·经籍志》产生重大影响的《七录》的完成时间，以及《隋书·经籍志》所说的旧录，是否包括了《七录》作者阮孝绪去世（南梁大同二年）之后的书籍？第二个问题与《七录序》中“古今书最”的说法有关，马楠认为“古今书最”是指《七录》所据过往目录的一个汇总，但吕博认为阮孝绪的这一说法带有夸耀的色彩，应当是指《七录》时代所收藏的书籍要超过此前《七志》《中经新簿》时代的藏书。马楠针对第一个问题回应道：《七录》的截止时间很可能就是大同二年（536年），张固也先生尝就此问题有过考证；并举出具体证据证明，《隋书·经籍志》所参考的“旧录”确实不止《七录》和《隋大业正御书目》；所参考的“梁目”也不止《七录》一种。针对第二个问题，马楠认为“古今书最”是《七录》所依据合编

并重新分类的十种书目的目录，《七录》是这十种目录的合集。

之后刘蕾认为，马楠的三篇文章均揭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过的细节及问题，对以后的阅读和研究必定都会有所启发和意义，指出：其一，进一步展现了目录学的功用，马楠的研究对研究历史上的图书流传有所助益；其二，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也能够有所推进；其三，关于撰人衔名的研究，也可以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史书记载有所补正。

程苏东指出，马楠的研究的新意来源于其对目录产生过程的关注和探索。他认为，结合《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一文与其他相关文献，能够推进我们对了解北宋乃至南宋时期图书流传实际情况的了解。此外，程苏东还结合网络检索，利用《〈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一文的研究思路，又解答了一些新的问题，证明了这一方法的功用和可行性。最后，程苏东还提出了一个猜想：署终官的书籍是否可能是著者去世后，后人编纂著作时的产物？而署时官的书籍，则可能是因为该书成书后立即就流传的原因。马楠即举出王筠一官为一集，支持了程苏东的判断。

王天然指出，版本目录学领域，有一些已有的重要的观点和方法需要被重申，今天的研究者必须重视这些已有成果，以免重复不必要的错误；而马楠的文章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其次，她还指出马楠的文章在史料运用和表述技巧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供作者参考。第三，她认为从马楠的研究中，还可以引申出一些

更加深入的问题，例如在雕版印刷时代，抄录依然是重要的图书复制手段，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似乎是滞后的现象？关于原因的解釋可以说多角度的，但角度之一一定要结合图书的性质和目的来讨论。最后，王天然赞扬了马楠能够突破成见，保持学术敏感和学术勇气。马楠在回应时，赞同王天然的观点，并提出不少证据表明，在古代，书籍是否刊刻确实与书籍的性质是极其相关的。

主持人史睿最后总结，指出本次活动只是“书志与书史”系列活动的开始，这一系列活动正是旨在突破学术成见。之所以称这一系列活动为“书志与书史”，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校勘学这样的词汇，就是为了通过词汇上的疏离感来促进突破以往学术成见。史睿指出，

这些传统学科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譬如今人经常遗忘前人已有重要而正确的研究成果，诸如科学化程度不高，分散于各个科系（中文系、历史系、图书馆学系）且在不同科系内部被边缘化，以及新技术的冲击等等，传统的书籍史研究往往停留在书籍装帧演变，很少涉及书籍生产、收藏、传承与学术史、社会史的关联，而西方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向又过于单一。史睿希望，将来通过“书志学”“书籍史”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一方面涵括和综合上述传统学科的内容，另一方面提升这些学科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程度。

（撰稿：郑涛、孟繁之）

## 学术讲座 毕罗：孙过庭生平及其《书谱》——兼论写本与书法

2017年4月12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孙过庭生平及其《书谱》——兼论写本与书法”讲座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为北大文研院“书志与书史”系列第三期，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主持讲座，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

员胡海帆、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刘涛出席了此次活动。

毕罗首先为大家解释了他为什么会选中孙过庭来进行研究。早在2004年，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毕罗即萌生了从“汉学”这个角度去研究书法的念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他选择了佳作多如繁星的六朝文献，最终他将目光聚焦到了《笔阵图》与《书



谱》。他在研读《书谱》的过程中，被孙过庭其人其事深深吸引，于是，以孙过庭与其相关的文化境况为主题撰写了毕业论文。毕罗在2004年与孙过庭“结缘”之后，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他先后在诸多期刊发表了相关文章，例如：2008年发表在《艺术史研究》上的《孙过庭之志气——〈书谱〉文体考》，2009年发表在《书法丛刊》上的《孙过庭生平考》，以及他2011年在意大利出版的专著 *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f the Tang*。

回顾了他与《书谱》的渊源之后，毕罗谦虚地说，他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书谱》不仅在中国备受关注，在西方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09年，法国人米约将《草字汇》翻译成法文时，就在其中提到了孙过庭，与王羲之一并提及，可见西方人对于孙的重视。1974年，德国人郭乐知（Roger Goepfer）翻译《书谱》，将《书谱》展现在西方人的眼前。1995年，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与张充和再一次翻译了《书谱》，但毕罗认为他们翻译得并不理想，汉学功底有所欠缺所致。最近关注到孙过庭的，是法国人幽兰，他在

2010年出版了著作《中国书画论著译选》。但是，纵观西方学术界，都只关注《书谱》本身，而将作者孙过庭忽略了。德国郭乐知在其书中直接表示，孙过庭的生平不重要，所以也即省略不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空白，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如此。因此，毕罗想要填补这一空白。

接下来，毕罗为我们简要介绍了他目前的研究成果，他分别从生平、文本内容、志气以及书谱完整性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叙述。首先，毕罗为我们确定了孙过庭生平两个重要内容：其一，孙过庭卒于洛阳。根据陈子昂的《率府录事孙君墓志》中“遇暴疾，卒于洛阳”，我们可以确定孙过庭是死于洛阳城内。之外，陈子昂685—691年间在洛阳作官，孙过庭684—705年间也恰在洛阳作官，二人有所往来，陈的说法当属确切可信。其二，孙过庭是吴郡人，因故迁往洛阳，在《书谱》中，孙以“吴郡孙过庭”自署。

接着，毕罗阐述了《书谱》对于书法史的影响，文笔与字迹兼美的《书谱》，对书法美学的影响意义深远，可是，对其书法技艺、书法教育的描写则经常被忽略。对《书谱》的书法最早记载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人

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约891年）之中。虽然《书谱》早在北宋时期就刻成帖，但其在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其文字内容，最近几十年印刷普遍流行以后才成为书法临习的范本。《书谱》中有大量针对书法学习者而写的教旨：例如62行的“翰不虚动，下必有由”，63—64行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192—196行的“执使用转”之说，等等。并且，在《书谱》中，孙过庭直言撰写的动因是传授书法技艺，孙学习、练习书法超过24年，并且教过书法，因此书写东西都是比较客观的，有实践依据的。因此，毕罗提出了一个质疑：“书谱”二字是否该翻译成英文 *Treatise on Calligraphy*？有没有更准确的翻译？毕罗认为，“谱”应该当作介绍性的、教育性的一种文体，英文最为恰当的词应该是“manual”（手册），*Manual of Calligraphy* 应该为“书谱”最准确的翻译。

之后，毕罗带领我们体悟了孙过庭的志气。通过陈子昂撰写的《墓志铭》和《祭文》，我们知道孙过庭的官职较低，平生贫苦拮据，但他是一个学问博深、性格忠诚的人。在《书谱》的最后，孙表明自己的志气：“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味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谯。余乃假之以缁纆，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竟赏毫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孙认为书法是“好异尚奇之士”所喜爱的艺术，书法是高贵的艺术，因而习书法者也应该具备高贵的心灵与品格，否则即是“不入其门，诘窥其奥者也”。毕罗认为，《书谱》

是孙过庭想要通过缩短学书法的学生与书法之间的距离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而作的。

最后，毕罗探讨了《书谱》的完整性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毕罗先生认为《书谱》是完整的，因为孙过庭明显保留了字迹的整体面貌，如果写错字，就直接在错字上用粗笔加以修改。其次，在全文尤其是后半部分，有非常明显的“节笔”现象。或许因为健康原因，或许编写一部书法的详细谱志的难度不易克服，所以孙被迫写得迅速，尽量写完文章。我们可以推论，《书谱》应当是一部还在进行中的文章，但是，尽管如此，《书谱》依然是能够体现孙过庭对艺术与美学的理想以及其志气，是书法史上的瑰宝。

随后进入讨论环节，史睿、胡海帆、刘涛纷纷赞叹毕罗汉语的流利与汉学功底的深厚，并与毕罗就如何研究书法，以及为什么帖学在清末衰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几位嘉宾都赞同，学术眼光在研究中至关重要，在如今信息电子化的时代，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搜集资料的能力相差无几，这时候就是学术眼光的一较高下了。其次，如果研究书法，就得练字，并且喜欢甚至爱上练字，如果不能与作品进行对话，那研究是无法深入的。为什么帖学在清末开始衰弱，并至今都不如碑学？几位老师认为，帖学比较纤弱，而碑字比较雄壮，加之阮元和包世臣等大家都转而学碑，文坛跟风，成为风习。毕罗的报告让我们重新关注到了帖学，不管是帖学还是碑学，都应值得研究，都是异常瑰丽的中华艺术。

（撰稿：刘媛）

## “‘抒情传统’论述的流播与回应”专题学术座谈会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与会。座谈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

在开场白中，李浴洋首先介绍了陈国球教授的学术经历与主要成就。陈教授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学部教授与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等职。最初以治古典诗论名世，代表作有《胡应麟诗论研究》与《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之后转向文学史书写形态研究，代表作有《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中国文学的省思》（编著）及《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编著），并与陈平原教授合编有《文学史》集刊（共出版三辑）。晚近十余年间，陈教授主攻“抒情传统”研究与香港文学研究，著有《文学香港与李碧华》、《感伤的旅程：在香港读文学》、《抒情中国论》与《香港的抒情史》，编有《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与王德威教授合编）、《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与陈平原教授、王德威教授合编）以及《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主编，共十二卷）。此外，还有《情迷家国》与《结构中国文学传统》等专著与论文集行世。随后，李浴洋交代了此次座谈会的缘起，

自1971年由美籍华裔汉学家陈世骧首倡“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以来，“抒情传统”论述历经数代海外与港台学人的不断发展，已蔚为成观，成为中国大陆地区以外解说“中国文学”的一种主流观点。在晚近十余年间，经过王德威、陈国球等当代学人的大力推动，这一原本主要用于阐释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学说逐渐进入现代中国的研究视域，对于研究晚清以及当下的中国文学、艺术、思想与历史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在学界具有生产性与影响力的“抒情现代性”理论。

2017年3至5月，“抒情传统”论述的重要代表人物、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总监、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与理事陈国球教授任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4月15日，他在北大文研院组织召开了一场“‘抒情传统’论述的流播与回应”专题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与

言陈国球教授在与部分大陆学人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自陈世骧以降，几乎所有海外与港台的重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都曾致力“抒情传统”研究，并且他们的初衷与旨归皆在倡导一种“中国论述”，发凡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可能性；但在中国大陆地区，“抒情传统”论述不仅一直未能激起学界的积极反响，反而多被以某种异于中国主体立场的“汉学主张”视之。这一同一学说在不同空间中的流播与回应状况，构成了观察过去五十年间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想象”的一个别样角度。有鉴于此，陈国球教授希望利用他在北大文研院访问之机，与大陆的中国文学研究同人就此展开交流，听取批评意见，以期了解彼此观感，共同探讨“抒情传统”论述的未来方向。

接下来，陈国球教授发表了题为“‘抒情传统’论述的面向与议题”的主题引言。在引言中，他介绍了“抒情传统”论述的发展过程。陈国球教授长期从事陈世骧研究，他以“抒情、传统与学人的生命轨迹”为题概说了陈世骧的学术与人生经历。他尤其强调陈世骧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坛与学界的内在关联，凸显其作为现代作家与现代批评家的身份，从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海外汉学家”。他具体分析了陈世骧的《战火岁月一诗人》（1942）、《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1948）与英译《桃花扇》（与艾克顿合作）等作品。关于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述，他指出其中包含“论诗”“尚文”与“伤时”三个部分，揭示了其间的演进脉络。在陈世骧身后，陈国球教授认为“抒情传统”论述最为重要的代表是高友工。他对于高友工的研究，同样一方面关注其思想主张的形

成过程，一方面考察其与大陆及台湾学界的密切关联。关于前者，他介绍了高友工的三篇阐释“抒情美典”的长文——《中国抒情美典》（1985）、《试论中国艺术精神》（1986）与《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2002）。关于后者，他说明了高友工与方东美、台静农、郑骞与废名的学术因缘。在陈世骧与高友工两位华人学者之外，陈国球教授认为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对于“抒情传统”论述也有重要贡献。普实克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新文学”的主体意识承接了传统的“抒情精神”，从而为“抒情传统”论述进入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准备了条件。而将“抒情传统”论述全面引入，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与历史进行阐释的，则是王德威。陈国球教授通过比勘王德威的三部“抒情传统”研究著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2010）、《现代“抒情传统”四论》（2011）与《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2015），展示了王德威“抒情论述”的发展过程。他特别指出，讨论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述，不能忽略其此前出版的《历史与怪兽》（2004）一书。如果说后者是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阴暗面”的考察，那么前者则是对于其“光明面”的探究。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能全面理解王德威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及其学术追求。在引言的最后部分，陈国球教授提出了“抒情”概念的有效性问题。在他看来，倡导“抒情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只有“抒情”一面，而是意在说明“抒情意识”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中的渗透力极强，并且已经内化于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陈国球教授的引言之后，与会学者对于

“抒情传统”论述的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计璧瑞指出，“抒情传统”已经成为了类似“感时忧国”一样的重要的文学史概念符号，两者都由海外学人提出，但相比之下，“感时忧国”在大陆学界的接受程度更高，其原因在于两个概念虽然都与“情”有关，但“感时忧国”的包容性更强，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可以将其转化为自家的理论资源。在她看来，“抒情传统”论述即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至少其与当代中国的革命浪漫主义传统就很难兼容。她认为，“抒情传统”论述是海外华人的一种“精神还乡”，其形成与发展都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语境与心理距离直接相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则认为“抒情传统”论述包含了鲜明的文化政治意图，即在学术主张的背后，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一种“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格局。正是由于“抒情传统”论述具有这一性质，她特别肯定了陈国球教授召集此次座谈会的学术价值。在她看来，大陆与大陆地区以外的学者共同讨论“抒情传统”议题，是一种打破大陆与海外文化/政治隔膜的有效途径。之后，她从三个方面展开，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她指出在高友工倡导“抒情美典”的20世纪80年代，大陆正在经历“美学热”，两者可以视为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与历史结构中形成的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看法。其次，她强调在“抒情传统”论述中始终存在多组他者关系，例如“中”与“西”“抒情的”与“史诗的”“抒情”与“启蒙”/“革命”，等等，这些他者关系的存在引发我们思考“传统传统”论述在不断进行自我限定的同时究竟在排斥什么。最后，她认为“抒

情传统”论述如果想要更具解释力，就必须直面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启蒙”与“革命”，将“启蒙”与“革命”他者化的做法，只能使得“抒情传统”论述丧失足够的有效性。她指出，在文化研究发生“情感转向”的当下，大陆学者应当自觉思考如何建构一种基于大陆自身历史经验的“抒情传统”论述。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提出，“抒情传统”论述具有高度的批评性与政治性，是一种“大叙事”。他具体分析了王德威的《“有情”的历史》与陈国球的《放逐抒情》这两篇晚近“抒情传统”论述的重要文章。在他看来，王德威在《“有情”的历史》中展开的“抒情叙事”意在将“抒情”从个人主义的限制中拯救出来，但在对于具体个案的研究中，王德威更为关注的却依旧是个体意义上的“情”。他以王德威对于沈从文的误读为例，揭示了其“抒情传统”论述的内在矛盾。他认为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文中并无将“有情”与“事功”对立的意图，相反，沈从文希望通过“有情”理解与消化“事功”。将两者对立，出自王德威的发挥，而非沈从文的本意。沈从文主张写作应当把握历史必然性，其“有情”的文学/历史观念不是来自与“抒情传统”相关的“诗骚传统”，而是来自被“抒情传统”他者化的“史传传统”。关于《放逐抒情》，他指出在战时中国，重要的不是“放逐抒情”，而是如何在大的文学/历史结构中“安顿抒情”。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冷霜认为，陈国球教授对于陈世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为现代作家与现代批评家的陈世骧，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可或缺。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他主张在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认识。在他看来，19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王国维与梁启超等人在晚清对于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二是胡适、刘大杰等人对于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建构，三是朱光潜与废名等人对于中国文学性质的提炼。林庚的文学史研究是在第三阶段中展开的，其同班同学陈世骧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批评是陈世骧形成“抒情传统”论述的重要起源，而他的“抒情传统”论述的最终形成，恰恰意味着对于这一起源的忘却，将“抒情传统”论述文学史化很有必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剑青指出，“抒情传统”论述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建构“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论尝试；二是作为“海外汉学”，在海外与港台的不不断发展；三是在晚近进入现代中国议题的讨论，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在他看来，“抒情传统”论述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坛的现代主义氛围，是“抒情传统”论述出现的重要的时代背景。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先后存在两股“抒情”浪潮：一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新月派”为主要代表的“抒情”风尚；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对于这一风尚的自觉超越。他指出陈国球教授讨论的“放逐抒情”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浪潮中就已经出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世骧与这一时期北平文坛的现代主义氛围既

有联系，又有疏离，这应当与他同艾克顿的交往有关：陈世骧一方面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具有克服现代主义的追求。

之后姜涛补充道，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股“抒情主义”的浪潮，甚至一度成为了新文学的主流话语。而“抒情传统”的提出正是对于“抒情主义”的打破，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孟庆澍认为“抒情传统”论述之所以在大陆学界未能激起积极回应，原因在于进入“新时期”以来，抒情在大陆的文类等级中位置逐渐下降，甚至“抒情”一词本身已经失能与失效。而“抒情传统”论述如果想要被大陆学界充分接受，就必须正视“革命中国”具有的抒情面向，在“抒情传统”与“革命中国”之间实现接榫。

三联书店编辑曾诚是《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三部著作的责编，他介绍了三联书店出版这一系列“抒情传统”研究著作的过程，并且特别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已故青年学者张晖致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的发言以“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视域与方法”为题。她认为“抒情传统”论述具有两个学术起点，后人比较熟悉的是陈世骧与高友工等人的主张，但其实早在朱自清与闻一多的著作中就已经大量讨论过这一话题。前者日后主要通过数代台湾学者的经营而开花结果，后者则经由林庚与王瑶等人的传承而内在于大陆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中。王瑶此后虽然转向了“新文学”研究，但他却始终

没有放弃自己古典文学研究的理想。1956年，他写作了《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他在此文中揭示了“魏晋风度”在鲁迅作品中的遗响。而“魏晋风度”在“新文学”中的发现，主要基于中国文学的“文”的传统。这与陈世骧与高友工等人建构的“抒情传统”主要基于“诗”的传统很不一样。而除去体制性的“抒情传统”，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学史上的弥散性的“抒情传统”，即大量“抒情的瞬间”，顾随对于鲁迅小说的分析，就着眼于此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谷卿主要讨论了高友工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历代词论中，通常认为词至南宋便流于细碎，南宋词的艺术成就与思想境界均不如唐、五代与北宋词。而高友工对于南宋词却相当肯定，指出南宋流行的长调代表了词的抒情性的极峰。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史观点。此前朱彝尊虽然也曾表彰南宋词的“深”与“变”，但却没有系统论述。高友工对于南宋词的研究十分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他对于“抒情传统”的研究也不是鼓励进行的，叙事性的问题同样也在他的关注视野之中。高友工指出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两种“美典”——一是以近体诗为代表的“抒情美典”，二是以民歌为代表的“叙事美典”，在讨论高友工的“抒情传统”论述时，不应忽略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性的强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潘静如指出，大陆学者对于“抒情传统”论述回应寥寥，与“抒情”这一概念的泛化直接相关。当下大陆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为侧重具体的批评史研究，而非美学风格研究。“抒情传统”论述作为一种美学话语，其学

术形态显然与当下的主流学术范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距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冯庆认为，“抒情传统”论述中的“抒情”概念过于狭隘，只关注了中国文学的“发愤抒情”的传统，即负面情绪的面向，而对于抒发正面情绪的考察明显不足。因此，“抒情传统”论述所讨论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主体究竟是全部的文学主体，还只是其中特定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他提出“抒情传统”论述不应只是一种“怀旧”式的悲观诉求，而应当能够面向未来，建构一种主动与乐观的“情”。在他看来，“情义传统”的角度或许可以比“抒情传统”论述更为恰当地切入对于中国文学议题的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静指出，“抒情传统”论述具有两重面向——一是作为知识谱系，二是作为批评界面。前者是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历史叙述，主要聚焦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光明面”；而后者考察的是“抒情”这一古老议题如何面对现代政治的考验，即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中国的“阴暗面”。她认为“抒情传统”论述如果要继续生长，就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首先，在一种中西比较视野下形成的“抒情传统”论述，可能较多地牺牲掉了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复杂性。例如，“情”与“礼”的关系问题在迄今为止的“抒情传统”论述中就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而在中国传统中，“情”与“礼”却是始终纠缠在一起的一对范畴。其次，正如贺桂梅教授在发言中所言，当下的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情感转向”的势头，关注革命运动中的抒情机制成为了左翼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一背景下，

抒情的方向性问题也就必须直面，即“抒情”有无可能超越个体，从而通向一种集体经验、阶级意识与时代精神。在讨论现代中国的“抒情”问题时，需要认真分辨究竟是谁在抒情，为谁抒情，怎样抒情以及“抒情”的位置与功能，等等。最后，抒情的时代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进行“抒情传统”论述时，“以情化史”与“以史孕情”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周昱的发言主要讨论了“抒情传统”的几种不同定义：一是王德威式的关注“权力让渡”的定义，二是萧驰式的凸显学术社群化的定义，三是陈国球式的作为一种学术与学术史形态的定义。她提出在不同的定义背后，是对于“情”的不同态度与对于“抒情”的不同理解。此外，她还对于“抒情传统”论述在翻译研究中的展开提出了设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罗雅琳通过对比陈世骧的《论中国抒情传统》与《原兴》两篇文章，指出陈世骧对于“抒情”的定义与其对于原始语言的理解十分相近，而他对于原始文明的推崇则反映了他与文明等级论者分享了相似的逻辑。随后，与多位与会嘉宾一样，她也就“抒情”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看来，王德威对于古典抒情资源的调用意在对抗现代中国的“革命叙事”，但同样的古典资源在冯至与郭沫若等历史中人的笔下却是一种激活革命的重要力量，两者之间的张力值得我们关注。

座谈会的最后，陈国球教授进行了总结回应。他首先感谢与会嘉宾提出的批评意见，表示这种认真的学术对话正是他所期待。然后，他从三个方面回应了座谈会上集中讨论

的议题：一是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与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他认为，在陈世骧的思想资源中既包含浪漫主义的成分，更具有现代主义的因子。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曾经是对立的，但作为文学思想，它们却可以具有相通之处，不仅陈世骧如此，林庚也是一位接受浪漫主义影响的“现代派”。二是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古典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无论海外华人学者还是大陆学者，在处理“中国”议题时都需要面对如何论证自我与“中国”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在大陆学者批评海外华人学者持有“汉学视野”时，其实自身也必须回答如何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历史经验转化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陆与海外并非简单的二分关系。他坚决反对将“抒情传统”论述称为一种“台湾论述”，恰恰相反，他对于“抒情传统”论述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学说可以溯源至晚清时期，绝不仅是对于台湾问题的回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以及“大陆”与“海外”等多组并举结构中，他认为看到在表面上对峙的两极之间的关联要比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而“抒情传统”论述正是这样一种意在强调其关联性的学说。三是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与政治意图的关系问题。他以普实克为例，介绍了普实克毕生都在致力回答“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是否是同一“中国”这一问题。普实克最终给出的是肯定答案，并且认为在“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发挥关键性的关联作用的正是“抒情精神”。至于大陆学者对于“海外汉学”的批评，他认为完全可以持有一种参考

而非认同的态度，重要的是讨论问题，而不是纠结于以什么名义展开讨论，“抒情传统”论述所承载的问题远比“抒情传统”这一概念本身更为重要。

座谈会历时四个小时，讨论深入激烈，

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日后将以笔谈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陆续刊登。

(撰稿：李浴洋)

### 菊生学术论坛 03

## “政教相维”：近代中国的制度因革与文教转型



2017年4月15-16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合办的“菊生学术论坛”第三期“‘政教相维’：近代中国的制度因革与文教转型”国际学术工作坊在北大静园二院召开。此次会议以青年学者为主体，意在打破学科界限，通过论文发表、评议交流、圆桌讨论等方式，关注“近代中国制度转型”，就清末民初的政治和文教变革等议题，展开深入的对话、讨论与互动。

语与会代表，并介绍了“菊生学术论坛”的情况。随后，会议召集人陆胤、李文杰分别阐述会议旨趣和组织经过。本次工作坊以政治与教化两者的维系为出发点，着眼于“制度转型”，力求突破以往制度史研究侧重“有形制度”而轻忽“无形制度”的倾向，同时揭示“软制度”的思路，注重制度背后的人物、人事、人情以及偶然因素的作用，借助史料的温故与求新，深描制度转换的细节，

还原制度生成的过程、语境。

随后为期一天半的学术工作坊，包含五场论文讨论及一场圆桌讨论。第一场论文讨论纵贯了宪政史、法制史、社会经济史三个领域：首先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副教授郑小威题为“Constitutionalists and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Constitutional Reform”的论文。该文考察了四川省谘议局会议中关于民主、立宪等问题的讨论，揭示运动背后总督赵尔巽与谘议局局长蒲殿俊宪政思想的差异。其次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的论文《重刑之下：清代回民案件与法律身份说，1760—1820》。田耕指出，历来以身份歧视来解释此“回民例”的法律治理，存在严重局限：清代对回民的刑判植根于治理暴力这一国家治理的规范性，针对暴力的刑名化实际上在回民之外也广泛存在。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健则以《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一文，综合人物、史事、制度三个维度，试图打通明清史和近代史，重新审视晚清江南地区减赋的制度背景和历史趋势。

第二场论文讨论着眼于科举制度的变局，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尚小明教授担任特邀评议人。中山大学的安东强介绍了其论文《清代学政经古场述论》，较为系统地梳理学政经古场从清中期至清晚期的脉络沿革、改制流变等实际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沈浩的《“印刷为之枢机”——废科举与晚清书业革命》一文，重在讨论科举废除与书业革命、书业变迁之间的关系，勾勒呈现出清末废除科举前后，思想与市场、制度与技术之间互动交织的复杂轨迹。第三场论文讨论集中在政治史层面，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

所任志勇研究员担任特邀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文杰宣读题为《君权与相权的绝响——清季内阁与军机处改革》的论文。该文以政治制度史视角解释清末宪政改革中曲折、问题及其原因，进而审视君权与相权这对古老政治关系进入帝制晚期后的走向，及其对于宪政造成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贺超的《“官制改，事权亦更”：清季兵部改设陆军部过程研究》一文，探讨丙午官制改革过程中兵部——陆军部的酝酿与改设过程，透视陆军部所形塑的中央军权新格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韩策的论文《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酝酿》，意在重新探索“丁未政潮”的成因，兼及清末满汉失衡、南北隔阂等问题。

第四场接续上一场对于晚清政治史的讨论，进一步向文教变革深入，由中国人民大学高波担任评议。四川师范大学张晓川的论文题为《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兼论甲申变局中张、李二人的处境与心态》，该文对张佩纶致李鸿章信函进行了深入解读与细致考察，进而反思甲申至甲午十年间人事嬗递对近代政教走向的深刻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瞿骏的论文《如何救孩子——〈蒙师箴言〉与清末的童蒙之教》，围绕清末民初流行的《蒙师箴言》一书，考辨其作者、编写以及流传等情况。武汉大学左松涛发表的《民国初年的私塾与学校之争（1912—1927）》一文，旨在考掘民初的私塾与学校竞争的相关史事，重访北洋时期的教育治理成就。

本次工作坊之第五场专注于文字、文学教育，由文研院邀请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陈国球教授担任特邀评议人。复旦大学张仲民

教授发表了题为《“为鬼为魅”：清末民初人眼中的“新名词”》的论文，关注清末民初的外来新名词热潮，进而反思思想资源的社会处境。华东师范大学王郡论述了两湖书院过渡为两湖大学堂的发展历程。北京大学陆胤的《国家与文辞：清季文学教育的制度化》一文，对勘近代中、日学制，意在重申

清末文学教育纳入全国性学制的历程，探索制度设计作为一种思想“潜势力”的可能性。

在16日中午的圆桌讨论之中，与会学者就参会心得与研究体悟进行了交流，并围绕“政教相维”的议题展开自由发言。

（撰稿：徐笑运）

## 读书会

### 施鲁赫特：马克斯·韦伯经典文献读书会

2017年4月9日至22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起并组织的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经典文献读书会”，在北大静园二院举办。著名社会学家、德国海德堡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应邀主持了此次读书会，带领相关学者与研究生，围绕《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自由”的意义》《以政治为业》等韦伯代表性的文本进行了讲解和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飞宇、田耕以及近二十名同学参加了此次读书会。

首场读书会上，施鲁赫特教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韦伯比较宗教研究的“导言”与“中间反思”的背景以及关系。1910年起，韦伯着手进行两项宏大的研究计划：经济与宗教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对于宗教，教义本身不是韦伯的重点，重要的是它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它，如何以此生活。比如，新教怎样构成一种生

活方式，使人感到日常工作是“神圣的”。在比较宗教研究中，韦伯首先研究了“儒教”，将它与原先研究的新教对比。然后他转向救赎宗教，“中间反思”即救赎宗教部分的导言。韦伯认为救赎宗教与先知的出现以及二者相结合是人类宗教上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施鲁赫特教授特别强调韦伯在“中间反思”里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测定历史现象与理论建构的类型之间接近的程度……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建构的意义不止于此。因为理性——逻辑或目的论上的一致性，古往今来一直强烈地支配着人类，不论是采取知性—理论的理性，抑或实践—伦理的理性。”人类被驱使着追求逻辑一致性以及行动的一致性。世界宗教的比较，于韦伯而言不只是知识手段，也基于人类的现实。在方法论上，韦伯没有构建单向决定的因果关系，而是某种具体的机制尚不清楚的“选择性亲和”。“亲和力”（Wahlverwandschaft）的概念出自歌德

的小说，两对主人公相遇，越走越近，突然原本的亲密关系崩解掉，人物“互换”形成新的亲密关系。类似地，禁欲新教与资本主义最初各自发展，直到它们“偶然地”相遇，才发现二者存在某种契合。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两个“历史个体”之间复杂紧密的亲关系。然而不同文化可能寄于同一形式，同一文化也可能有多种形式，不存在历史的普遍法则，因此韦伯总是从各个角度反复琢磨形式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而非法则。

第二场读书会讨论的文本，为《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自由”的意义》，是韦伯1913年为“社会政策协会”内部讨论而作，1917年发表。施鲁赫特教授认为“价值自由”（Wertfreiheit）有两重含义：一是避免价值判断（freedom from），二是自由地进行价值判断（freedom to）。韦伯的关键在于区分经验科学领域与价值领域，分清对事实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学者的科学知识无法为个人的价值判断赋予正当性，所以不能混淆界限，在讲台上利用教师的资格作价值判断。当然，学者可以在公共场合作为个人——不是作为教师——自由地评价。大学生应向教师学习的是朴素地完成一项给定课业的能力，是承认各种事实，不急于采取价值立场，最重要的是，始终将“人格”放在“事”（die Sache）后面，抑制无端炫耀“人格”和个人感受的需要。人格并不是人们有意追求的东西，惟有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一项志业，完成“日常的要求”（die Forderung des Tages），才能成为人格。

最后一场读书会上，施鲁赫特教授首先介绍了《以政治为业》的时代背景，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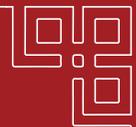
德国正处于政治转型时期，旧制度不再，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民主制下如何理解政治领袖，如何理解以政治为志业的意义。施鲁赫特教授特别强调政治的“内在维度”，基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他区分了三种政治家：一种是适应一切的官僚，他们只权衡结果的利弊得失，既无信念也不负责，在韦伯看来是最糟糕的。一种是革命家，他们出于自己最纯粹的信念采取行动，信念胜过整个现实世界，因此他们丝毫不计算行动的后果。对政治而言，最可取的政治领袖则兼具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他依照自己的信念来行动，为行动的后果负责。政治领袖对一项事业充满激情，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理想的政治领袖也会与现实拉开一点距离以保持清明。

施鲁赫特教授此行，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来访并进行讲学的。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他尤其关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是全球研究韦伯社会学理论最出色的学者之一。

（撰稿：吉砚茹）



静园学术



## 文研读书

### 01

### 洪子诚教授新著《材料与注释》研讨会



2017年3月11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文研读书”首场活动——“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与会，围绕《材料与注释》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视

野与方法以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等议题展开讨论。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文研读书”是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新近发起的系列活动，旨在以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代表性的优秀学术著作为中心，加以研讨，希望在厘清学术传承的同时，深化议题，延伸讨论。“洪子

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正是这一系列的首场活动。

洪子诚教授，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新诗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其《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领域中最负盛名的著作。其《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与《文学与历史叙述》等也具有十分广泛的学术影响。在从事专业研究之外，洪子诚教授还写作了一系列学术随笔，结集为《两忆集》与《我的阅读史》等。

《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教授于2016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包括“材料与注释”与“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其对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六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其以答问的形式表达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进行。上半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主持。洪子诚教授首先发言。他对《材料与注释》的写作过程与材料来源作了说明，介绍了其“注释”

的主要功能是交代背景与提供参照。他说，尽管该书处理的六篇文学文献各自独立，但在写作时，也有三点核心的问题意识贯彻全书：一是关注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生产的组织方式，二是考察中国作家协会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组织发挥的核心作用，三是追踪“周扬集团”的崛起及其文艺政策的展开，同时研究其在与更为激进的文艺—政治集团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的过程与原因。洪子诚教授表示，虽然此书已经完成，但他却仍有困惑，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历史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同样的材料在不同视野下的处理方法、结论甚至研究者的学术道德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期待听取不同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在发言时指出，《材料与注释》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历史叙述。洪子诚教授的研究既是客观的，同时也是充满个人经验的。她引用傅斯年的观点，强调了发现“新材料”对于提出“新问题”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但她同时说明，新材料的发现本身并不等于新问题的提出。她以近年鲁迅研究、丁玲研究与周扬研究中的问题为例，认为有的研究者在阐释新材料时或者过于苛刻，或者过于站在既定立场上立论，结果导致新材料被既有观点收编。而《材料与注释》凭借洪子诚教授的学术品格，避免了类似问题，堪称一部“精品”。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表示，《材料与注释》具有一种反理论的理论意义，而“材料与注释”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学术信仰。他在发言中谈及了自己与洪子诚教授的交往，认为在洪子诚教授身上典型

地体现了品格高下决定学问高低这一道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民乐在发言中首先引用了黄子平的说法，称赞洪子诚教授充满学术活力。在他看来，以往对于洪子诚教授及其著作的讨论，大都是在学科视野中进行的。但他认为洪子诚教授的意义恰恰在于他对于学科界限的自觉突破。他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规范”，即形式上的规定性。但在很多时候，当代学术的形式感已经远远大于其应当具有的问题性。而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正是一种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学术。这是因为他的思考与表达并非是在学科视野中进行。认识与理解洪子诚教授，必须引入中国史学传统的维度。他对于历史叙述体式的不断探索，是他与历史相遇的一种方式。在当代学术更多强调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时，洪子诚教授却凸显了“存疑”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材料与注释》通过文本对读捕捉文本意义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姚丹看来，洪子诚教授的学术道路可谓“一个人的文学史”。她认为洪子诚教授的研究方式是“文学”的，而非“知识”的。《材料与注释》中的“注释”更为接近的不是中国古典的注释方式，而是西方世界的解经学与诠释学的方法。除去“注释”，书中对于“材料”的铺排同样具有鲜明的个体选择与价值判断。在洪子诚教授的“克制”背后，她读出了一种“愤怒的激情”。

《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认为，《材料与注释》应当与洪子诚教授的另外两部

著作——《我的阅读史》与《回顾一次写作》——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因为它们共同呈现了其对于“重返历史的态度与方法”的思考。在具体分析《材料与注释》之外，他提出了四个问题与洪子诚教授交流：一是如何看待《日瓦戈医生》与冷战背景的关系，二是如何评价“打工诗人”许立志及其作品，三是如何理解周扬、丁玲与冯雪峰等人的“权利斗争”，四是新的文艺—政治的“一体化”进程是否会开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吉贤在发言中说，洪子诚教授是一位具有文体追求的文学史家。几乎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在实验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方式。《材料与注释》正是其在这一脉络中的最新成果。他把此书称为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认为书中《1962年大连会议》一篇的写作最为成功。他还提出了在洪子诚教授的叙述框架与正史材料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认为，《材料与注释》的出版将是改变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研究范式的一个节点。在他看来，此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保留了文本的复杂性，二是保留了评述的开放性，三是保留了研究的延续性。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洪子诚教授在书中采取了让研究者“退居幕后”的研究策略。此外，对于洪子诚教授提出的“一体化”的概念，他指出“一体化”的目标尽管是确定的，但“一体化”的进程却是不断摸索的。因此，所谓“一体化”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无数裂隙与博弈。这也就决定了对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的研究

应当选择一种内部视角。而《材料与注释》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的窗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在主持时表示，《材料与注释》是一位老学者提出的新问题。无论学术潮流如何变迁，洪子诚老师在书中处理的问题都始终存在，值得一代又一代研究者认真关注。他特别指出，洪子诚教授有其一以贯之的温润，但也有其始终不渝的坚持。对于这一代人而言，“革命”不仅是文本与语词，以及抽象的乌托邦，更是一种“切肤之痛”。所以当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习惯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讨论老一代学者的“限度”时，也应当知道自己的“限度”所在。而《材料与注释》正为两代研究者展开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此外，他还认为洪子诚教授的历史经验不仅是一种个人经验与知识分子经验，更是一种“人”的经验。正因如此，他在书中处理当代作家与批评家的“道德”问题时，才能自觉采用一种历史化的方式，从而避免了将道德问题本质化。

下半场的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会议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首先发言。她从四个方面评价了《材料与注释》并且做出引申。一是关于“材料”，她认为此书可以与洪子诚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参照阅读。在对比中，不难发现洪子诚教授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她认为洪子诚教授既呈现了历史的叙事性，但同时也并未否认历史的真实。相反，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使“材料”文学史化，成为了历史的组成部分。二是关于书中六篇

“材料”的关联性，她总结它们集中处理的是从“反右”结束到“文革”爆发这一时期的“周扬集团”的命运问题，而这正是既往的周扬研究中十分缺乏的一环。她将之称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六十年代（初期）问题”。三是她提出在双重参照视野中认识与理解这一“六十年代（初期）问题”。所谓双重参照视野，一是“文革”视野，一是“八十年代”视野。在前者的参照下，可以继续讨论“周扬集团”的后退主张与同一时期更为激进的文艺—政治集团的“不断革命”理论之间的分歧与差异；在后者的参照下，可以研究“八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期）”的内关联。在她看来，“文革”结束以后“拨乱反正”的“正”的指向便是重新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即文学史上的“周扬时代”。四是关于洪子诚教授在《材料与注释》中提出的新的问题，她认为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在承认断裂的前提下看待当代文学史以及当代史的延续性问题，二是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有限性问题。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看来，《材料与注释》可以与钱理群的《岁月沧桑》进行对读。《岁月沧桑》提供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历史叙述，而《材料与注释》则更多选择使用微观视角，呈现了一种蒙太奇的现场效果。如果说《岁月沧桑》表现了某种连贯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话，那么《材料与注释》则更多关注知识分子身上那些不连贯甚至不确定的方面。他把洪子诚教授的问题意识称为研究个体选择与道德判断背后的主题状态。同时，他还围绕此书重点讨论的“真诚”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对于“真诚”的过度信任，尤其是对于一种连贯与完整的“真诚”形象的我期待可能导致现实感的丧失。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冷霜同样采用了对读的方法，他指出《材料与注释》与洪子诚教授的《1956：百花时代》多有交集，但具体的处理方式却很不相同。在他看来，《材料与注释》打开了更大的问题空间，体现了一种史家的意识与态度。他特别提出，除去作为一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教授还是一位写作者。因此，《材料与注释》也就内在包含了如何在文史之间进行写作的问题向度。他以书中的“述史之文”为例，具体分析了洪子诚教授的春秋笔法。他认为洪子诚教授的笔法已经达到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学术境界，在其“冷漠叙事”的“假面”背后，是其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思考与选择，其对

于研究对象的同情与理解，也都是建立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鲁太光称赞洪子诚教授具有“童心”。他认为《材料与注释》的重要价值有二：一是揭示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权力”之争，二是重建了当时文学场的现场感。在高度肯定了此书的贡献之后，他也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两点问题：一是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正面价值估计不足，二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已经实现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但作家把握现实的能力却严重衰退，或许研究者也可以由此反思对于多元的倡导是否具有某种内在局限。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子凌认为，“道德”是《材料与注释》的关键词。在他看来，此书主要处理的是在20世纪

50至70年代的作家与批评家身上“道德”问题是如何出现又是为何出现的问题。他称赞此书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了当代文学的精神遗产。他进而提出如何处理研究对象中那些不可穿透之处的问题，与洪子诚教授进行了交流。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的发言围绕“当代史写作中的‘诚与真’的问题”展开。她认为，所谓“真”包含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个人意义上的“真诚”，一是历史意义上的“真实”。而“诚与真”的问题就在两者之间展开。她通过引用章太炎与陈垣等人的说法，论证了“注释”作为一种学术文体的合理性。在她看来，洪子诚教授在注释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分叉一分裂的历史叙述正呈现了一种历史的现场感。而与多位与会学者谈及的“道德的败坏”问题相比，她说她更为关注的是“语言的败坏”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崔柯认为，《材料与注释》是一部结构精巧的学术著作，在其间不仅有多重声音反复参照，而且有同一人物与同一文本的反复出现。而洪子诚教授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正在这一精巧的结构设计中得以体现。在他看来，“犹豫不决”便是洪子诚教授的思想方法。《材料与注释》的结构是封闭的，但结论却是开放的，有待于读者参与开掘。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副教授宋声泉的发言以“文学的《资治通鉴》如何可能”为题。与杨联芬一样，他也引用了傅斯年的观点对于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方式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材料与注释》的

核心方法便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是一种对于史学方法的自觉回归。同时，他也指出此书的“材料”与“注释”之间的对话关系还可以继续加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助理研究员李松睿认为，《材料与注释》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的范畴，即在学界以往关于“一体化”的论述中，偏重对于“一体化”的进程描述，但对于具体的“人”的处境关注不够。《材料与注释》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他把洪子诚教授的研究方法称为“时间变形记”。他特别强调，与大量研究者利用自己的“后见之明”做出的“时间现形记”式的研究不同，洪子诚教授没有动用自己的时间优势，而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与自我质疑呈现了一幅“变形”的文学史图景。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数位博士生也就《材料与注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石岸书指出，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我的阅读史》再到《材料与注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路演进可以称为叙述的“后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邢洋具体分析了《材料与注释》中包含的若干文学史信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静论述了“材料与注释”何以成为一种可能的学术形态。北京大学博士生吴宝林对于书中的具体材料进行了补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秦雅萌认为此书具有摒弃叙述框架、把历史细节放到最为核心的位置上的特点，认为其接近黄子平倡导的“想象的文学博物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曲楠将此书与钱理群的《岁月沧桑》、木山

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放在一起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罗雅琳在发言中具体分析了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三种“真诚”。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孙大坤就这一时期文坛的人事与制度问题与洪子诚教授进行了交流。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在主持时指出,《材料与注释》自问世以来,先后在上海与北京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这本身就说明了此书具有的学术价值。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考是“常为新的”。他提示大家在评价《材料与注释》时,还应当关注洪子诚教授在同一时期写作的另外一部著作《读作品记》。《读作品记》已经在相关期刊上完成连载,并且将于今年年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能更为完整地把握洪子诚教授对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的最新思考。

在研讨会的最后,洪子诚教授进行了总结回应。他首先就若干具体问题做出了说明。一是他认为《材料与注释》中让他最为不满的是关于林默涵的部分。他坦言与其他研究对象相比,他对于林默涵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二是在他看来,如何在充分尊重材料的同时充分尊重材料背后的“人”,这始终是学术工作的难点所在。三是对于学界称赞他重视历史的叙述性的做法,他强调自己更为重视的还是事实本

身。具体到《材料与注释》中,他对于材料的选择标准便是取决于材料能够提供的事实多寡。四是他认同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的最大问题便是“语言的败坏”。他说自己之所以在文学史研究之外一直关注新诗,就是基于新诗在语言革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判断。在回应了这些问题之后,洪子诚教授又作了五点总结。一是他引用木山英雄的说法,自称是“即将被消灭的一代”,强调代际身份与他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他说尽管学界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多有总结,但无论是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写作《材料与注释》,在具体写作时他并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导。三是尽管他的研究偏重历史,特别是对于文学制度的考察,但他仍然认为文本是文学史研究的中心。四是在历史的复杂化与简化之间,他主张采取辩证态度,因为复杂化固然重要,但往往抽象更有力量。五是他表示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研究历史,优势与劣势兼具,对于两者都应当具有清醒的认识。

在洪子诚教授的总结回应之后,“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圆满结束。洪子诚教授与其他与会代表的发言将在经过本人审阅与修订以后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

(撰稿:李浴洋)

## 静园雅集

### 07

#### 韦力: 清代版本琐谈



2017年3月17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七期活动在北大文研院举行,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韦力带来题为“清代版本琐谈”的讲座。韦力先生数十年致力于藏书史及目录版本学的收藏与研究,有“民间第一收藏家”之称,其相关著作有《古书收藏》、《古书之美》、《古书之爱》、《鲁迅藏书志(古籍部分)》、《书楼寻踪》、《书魂寻踪》、《觅宗记》等二十余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担任评议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潘建国、英语系教授高峰

枫、哲学系教授吴飞等参加活动。

一般而言,“古籍”的概念止于1912年,即清末。清为古籍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影响也极为巨大。书的主要功能便是“读”,因此,书与学术史关联紧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三大顶峰为两汉、两宋和清学,其中清代学术最近乎西方之所谓“科学”,学术著作数量多,且流失概率较低,许多流传至今。

#### 一、藏书之着眼点:学术价值、外在形式

韦力老师首先指出,评价藏书的通例主要有三:学术价值上的重要性,流传数量上的稀有性,艺术价值上精美性。其中,学术

价值是藏书的主要着眼点之一。清代学术作为中国学术史的三大顶峰之一，有乾嘉学派（汉学、考据学、朴学）、古文经学（吴派、皖派）、今文经学、宋学等派别，在经学研究、輿地考证、算学、训诂学等方面都大有成就。

此外，藏书的外在形式也是一个主要着眼点。首先，同种书不同版本之间的价值不同。以各版本较为齐全的《三希堂法帖》为例，乾隆亮墨拓本工艺复杂，当时只作宫内赏赐之用，得之人极少；道光后有带饕餮纹的花边本，数量较多。还有一种光绪间的石印本，由于石印便利，起印数量巨大，可达十万部；而古籍传统的起印量为三百部左右。显然，流传数量越多，收藏价值就越低；但此光绪间石印本不带饕餮纹，因此是以乾隆亮墨拓为底本的，故仍价值不菲。

韦力老师指出，我国历来区分稿本、钞本、校本的版本系统，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特有的语言体系。汉语为表意文字，存在大量的同音字，因此在传抄过程中会出现思想观念不同所导致的讹字。后人通过校勘学方法，从校勘出的文字差异管窥抄书者的思想差异，是为中国特有的学术内容。

韦力老师随后分别讨论了初刻本、递修本、红蓝印本等藏书的收藏价值。初刻本价值尤为重要，以《旧五代史》为例，邵晋涵辑《永乐大典》清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为其初刻，这使得失传的《旧五代史》失而复得；递修本是原作者萌生新的观点、认识后对旧版本的修订，往往与旧版本卷首相同但内容上有时差异很大，查阅时不能忽视；红蓝印本则是正式印刷前的试印本，基于深色覆盖浅色的原理，亦可通过校勘学方法研究著书者的观点改易。

碑帖则有整裱本与剪条本之分。若整裱本不便阅读，古人即将其剪成竖条分页装裱，为剪条本；但剪条本有违书法艺术所追求的整体性，无法顾及字与字之间的关联。整裱本亦有可否分割之别，如莫高窟整裱本中的文字大小不一并依存于整体的框架结构，剪条后无法恢复原貌。直至清末，时人方知整裱本之重要，故明代的整裱本少之又少，价值也极高。

大部头书向来不被看好，书店通常将其置于书架顶部，行话称“压架子书”，不好卖。但近年来，收藏者逐渐意识到大部头书的可贵性。古人推销书是买方市场，通常是伙计背着书到买家家中提供试读；而大部头书背着费劲，于是习惯只取出大部头的“头本”。从而，由于种种原因，“头本”与其他部分分离的情况并不希见，于是“缺头本”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许多完整无缺的大部头初版本很少见。

韦力老师还介绍了殿版书和单页文书的收藏价值。殿版书作为政府读物，以传播思想为主要目的，其印刷装帧不惜成本，但内容性并不强。单页文书，或认为不在藏书范围之内，亦有“单页归档案馆，成册归图书馆”的处理方式；但韦力老师认为，藏书应藏单页，不应拘于形式。

## 二、清代藏书的断代问题

韦力老师接下来讨论清代藏书涉及的断代问题。首先是南明文献的归属问题，1644年后数十年间南明与清并存，韦力老师认为，南明文献也应包括在清文献之内，如明万历年间刻弘光元年印本《五灯会元》；相似的还有吴三桂的“大周”政权存在四年，

此间文献如周二年《黄石公素书明解》；又如满清天命、天聪、崇德三朝之书，时间上与明万历年间重叠，但考虑到这些古籍版本的复杂性，又难以将其划入明代范畴。

此外，对于藏书家而言，有些特殊年号颇具趣味性。首先是“顺治元年”，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不太出版书，韦力老师只见过一部，极为珍稀；乾隆六十一年让位后，宫中有出现刻历为乾隆六十一至六十四年的刻本与抄本，但民间都已改用“嘉庆”，因此也很稀罕；清代弃用年号“祺祥元年”以及“宣统四年”（1912年）的“时宪书”（相当于挂历），有些因提前印出而得以流传，亦为珍稀之物。

## 三、善本的概念与范畴

据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不同时代对善本概念的称呼，一曰旧刻，二曰精本，三曰旧钞，四曰旧校。197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出“三性九条”的规定，其中包括“清代乾隆及以前”这一硬性的年代规定。但对收藏者而言，考虑到乾嘉学派治学年限之久，强行用年代决定善与不善并不可取。

国务院新近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又

提出“四级十等”，可操作性更强。例如清光绪间黎庶昌、杨守敬影刻《古逸丛书》本《春秋谷梁传》，虽不符合“三性九条”，但却是公认的好本子，许多乾隆前的善本甚至卖不到其一成价钱。韦力老师指出，这些藏书在收藏市场上的成交价，有时往往能比这些国定标准更能反映其真实的收藏价值。

## 四、清代学术与版本

韦力老师说，选择清代藏书，首先要关注那些经学大家及他们的代表作。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是清代唯一一部全用小篆写成的书；又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后世一般认为是戴震的代表作，但许多戴震的重要弟子称其主要学术观点不在于此。其间，小学与金石考古尤为繁荣。小学中又以研究《说文解字》为大宗，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金石考古则是学者不满足于文字材料而从青铜器铭文考史，如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吴云《两窑彝器图释》等。

清代还出现了影刻与影钞的兴盛，都是古人为了复原古书原貌而进行的尝试。例如，影刻本中常有墨色印章和朱色印章并存的现象：墨色印章，是影刻时一并摹刻的古人藏



章；朱色印章，则是后代递藏而添加的藏章。但影刻力求全貌的复原，难度大、成本高，因此传世也较少。

接下来，韦力老师为我们分析了同一部书不同版本的价值区别：按一般规律而言，稿本 > 校本 > 钞本 > 活字本 > 套印本 > 刻本 > 珂罗本 > 石印本 > 排印本，其中，活字本由于排字成本高，因此印得越多则平均成本越低，印量大而降低了价值；若从内容上分，从刻书的目的分析，家刻本 > 官刻本 > 坊刻本；从形式上分，则是官刻本 > 家刻本 > 坊刻本。

随后，韦力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经部之外值得收藏的书。首先是史部名著，其初版本价值尤高，如乾隆五十二年洞泾草堂刻本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乾隆四十五年潜挈堂刻本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此外还可收藏：小说名著，如乾隆五十六年程氏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程甲本）《红楼梦》；诗词名著，如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年程氏七略书堂刻本王士禛《带经堂全集》、清康熙中金闾绿荫堂刻本纳兰性德《饮水词》；西学东渐著作，如清光绪年间刻本英国金约翰辑《海道图说》。还有一些当属清刻本中的名品：藏书家所刻书，如林佶四写、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此外还有太平天国毁版之书、清三代写刻本、禁毁书等。

最后，韦力老师简要介绍了清代版本中的一些特殊关注点，包括：原刻与翻刻之别，如黄丕烈《百宋一廬赋注》，清嘉庆十年黄氏士礼居刻本为原刻，另有光绪三年潘祖荫翻刻士礼居本；名刻工代刻，如《盐铁论》有嘉庆十二年顾虹川为张敦仁刻的本子；日本影刻的中国古籍，有时不易区分，用纸不

同为最大特点；仿古纸刷印品，如清乾隆内府刻本《御书大佛顶如来秘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使用了仿金粟山藏经纸；包含两种以上文字的情况，如清内府刻本《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合璧刊刻；校样本，即出版前供校对之用的本子，如清光绪刻校样本《仪顾堂书跋》；高丽本，由于高丽产铜，其铜活字制造精美，如朝鲜丙辰内阁铜活字本《御定史记英选》；混印本，指印法不止一种的本子，如《格致须知初集》有木刻与金属版混印本。

韦力老师发言之后，负责评议、同时也是韦力老师好友的辛德勇教授指出，藏书家对于文献传承的贡献非常大。而作为藏书家的韦力先生，在短时间内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大量关于清代版本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应用于文献学研究之中。例如，收集文献遇到红蓝印本时，便能明白它们的意义；还有一些特殊问题，如“祺祥元年”，也是清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了解这些问题，能够具体、全面、真切地贴近史学研究。此外，韦力先生的发言，对我们选择收藏何种古籍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潘建国教授与漆永祥教授则肯定了韦力老师与其他收藏家不同，不以盈利为目的，同时乐于挑选有学术价值的藏书影印出版，是一名学者型、学术型的古书收藏家。最后，在师生提问环节，韦力先生也强调了藏书与读书的区别，有些版本的书可能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却远不如大量出版的点校本易读。

（撰稿：施朝）

## 08

### 刘昂： 明清民国时代的文人歌唱——正本清源话昆曲



2017年3月31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静园雅集”系列活动第八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期活动由青年昆曲家刘昂主讲，主题为“明清民国时代的文人歌唱——正本清源话昆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担任主持人。刘昂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现为北京理工大学讲师，潜心曲学，掌握元明清杂剧南戏传奇近百出、诗词散曲数十支，曾校订曲谱四本，撰写习曲札记上百条，参加俞平伯创建的北京昆曲研习社至今，现任社委。

刘昂老师首先指出，现在大众对昆曲

的认识存在偏差，需要正确认识几个基本问题：昆曲是什么，昆曲的原理是什么、怎样唱。因此，本次对昆曲的讨论主要是从“正本清源”的目的出发，从根源的角度来讨论昆曲的特点，及其作为艺术的核心本质。

昆曲与许多传世艺术不同，它有一大批传世文献支撑，包括曲谱、曲艺等内容。其中，最有名的描写当属张岱《陶庵梦忆》所记的虎丘中秋赛曲大会：“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而“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黄翔鹏先生在《论中国古代

音乐的传承关系》中，将传统音乐艺术分为民俗型、乐种—雅集型、剧场型、音乐会型四种类型。对于昆曲，现在普遍认为属于剧场型，但黄翔鹏先生认为属于乐种—雅集型，因其承传在相对稳定的非职业社团之中，技艺上存在严格的师承关系，演出方式和曲目与传谱自有深厚历史渊源的音乐。第一期“静园雅集”活动中，王风教授介绍的古琴艺术，亦属于这一类型。

黄翔鹏先生还说，古琴和昆曲的业余或半职业活动之流传至今并不依赖于民俗活动，也无从得到演出活动固定票房收入的支持。作为传统音乐，它们既非民俗音乐，也非剧场音乐，较少得到社会的资助，但却是真正有资格被称为古典音乐的品种。这些乐种主要是依靠爱好者惜护传统文化的热情，靠亲族或师友关系，靠共同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而维持下来。这些都体现出昆曲与其他类型戏曲的不同之处。

昆曲是什么？——以昆山腔谱唱南北曲。南北曲中，先基于南曲，再同化北曲。刘昂老师认为，昆曲是中国明清以降南北曲最重要的歌唱文学形式，但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剧种。昆曲这种文化形态曾经影响了舞台搬演，但演剧到底是边缘，歌唱才是本位。长期以来把昆曲看作戏剧的一种，乃至将其视为“剧种”的认识造成了许多混乱，而如今昆曲的困境至少一半是源于这些观念的混乱。“曲友”是指专注于昆曲清唱、从事昆曲研习的人，不是指爱看戏和演戏的人。

中国历来有“文乐一体”的传统。或从文学角度说，如《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或从音乐角度说，如《礼记·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中国文学多以声韵歌咏为本位，以口头实践为标的，付诸文字无非为保存流传起见。中国的文学传统，无论民间文学还是精英文学，对声音审美多有特殊的爱好，并形成一套自觉的理论和方法。刘昂老师强调，重视昆曲曲唱实践和研究，其实质是重视昆曲（南北曲）与《诗经》以来的中国韵文学特别是词曲文学血肉相连的传统。也只有在中国韵文学特别是词曲学的传统之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一代之文学与一代之音乐相表里”的中国昆曲。

刘昂老师指出，昆曲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近古歌唱文学的活体遗存。昆曲产生时代在明代中晚期，地点在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江南。上古及中古时代的诗词歌赋，徒存文字，亡其声音，而昆曲尤富声音材料及曲谱的参证；晚近的声腔说唱，多发生于草莽市井，缺少文本材料支持，其历史渊源往往茫昧难稽，而昆曲尤多文本材料的辅佐。因此，昆曲在材料占有方面，可谓文乐兼备。另一方面，昆曲的歌唱理念，即近古时代文人阶层对文乐一体极端理想化、纯净化的产物，其具体表现为严格的“声词一致”，较之其他歌唱，更富于规律性。

昆曲的表现，有清工、戏工之别，其中清工重“曲”，自得其乐；戏工重“剧”，面向大众。昆曲鼻祖魏良辅有云：“清唱谓之冷唱，俗语谓之冷板凳，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不比戏曲。戏曲借锣鼓之势，有躲闪省力，知者辨之。”刘昂老师强调，昆曲之道在于清曲，昆曲唱念的规

范始终存在于清工曲家、曲友嘴里，而舞台搬演向来处于从属、附庸地位。昆曲继承古代文人士夫吟唱的传统，对四声阴阳、出字归韵、腔格口法等问题都极其考究，有一整套严密的学理支撑，这也是近来中国语言学家多好昆曲的原因。明清民国时代文人曲集雅会多喜清曲歌唱，承传的正是清工传统，不以功利心来看待昆曲，也不会追求西化、庸俗化而谋存活，有自主、自觉的艺术意识，拒绝时尚，保持传统，是昆曲唱法最忠诚可靠的维护者。

昆曲源于南曲清唱，复同化北曲，进而影响戏曲声腔。魏良辅在《曲律》中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各有不同。至于北曲之弦索，南曲之鼓板，犹方圆之必资规矩，其归重一也。”从风格上看，南曲整体偏婉约，字少腔多，板缓腔柔；北曲整体偏豪放，字多腔少，板促腔激。南曲在一出中可以多种演唱形式并存，北曲则是一折中原则上由一人独唱到底。此外，南北曲对音阶、音韵、调类的选择上也有显著的分歧。随后，刘昂老师从配乐、曲牌、字音、腔格口法等多个方面简要介绍了昆曲曲唱的原理。在讨论的过程中，刘昂老师多次穿插曲唱示范，包括南曲、北曲、词、散曲，力求全方位展示多种类型的曲唱特点。

最后，刘昂老师谈及昆曲在近现代的

境遇问题。一个主要问题是，当人们谈到昆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一种演戏形式，是哪些哪些剧团乃至哪些哪些演员，而不是专注唱念的那些曲家曲友。如今冠以“昆曲”或“昆剧”名义的演出活动，大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昆曲范畴，但这些演出却带来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结果，导致真正掌握精深细腻曲唱艺术的曲家曲友们话语权的丧失。剧团往往会运用商业和传媒的手段树立新标准、制造新观众。但昆剧是由明清文人阶层制造的艺术，只为欣赏，不为牟利，并不是简单地借媒体炒卖就可以让观众接受的。刘昂老师强烈批评了这些按照商品制作思维、求新求变、适应市场而改造出来的昆剧，认为是一种格调甚低的四不像之物。

刘昂老师说，当务之急是认识昆曲、分析昆曲，赋予昆曲合法正规的学术地位，而不是评价昆曲甚至侈谈改革昆曲。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首批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诚是嘉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昆曲的生命在其学理及清唱实践，从不赖于歌舞鬻弄，因此，保存昆曲这项遗产，根本大计是促进曲学的开展，以及曲唱的传习。

（撰稿：施朝）

## 09

## 颜榴： 贝克特的目光——后现代戏剧漫谈



2017年4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静园雅集”系列活动第九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国国家话剧院研究员颜榴以“贝克特的目光”为引子，就后现代戏剧展开漫谈。颜榴老师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从事戏剧评论多年，曾在台湾出版专著《京华戏剧过眼录》，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现于国家话剧院做院刊《国家话剧》的主编，并主持开展戏剧教育活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加州大学教授周锡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出席了本次活动。

颜榴老师说，以“贝克特的目光”作

为标题，有两个原因。第一，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在后现代戏剧中具有重要地位。1953年以前，贝克特的主要身份是评论家、小说家、诗人，而剧作家只是一个次要身份；但随着《等待戈多》的上演，贝克特瞬间成为后现代戏剧中具有形象价值的明星式人物，不止写戏剧，还跨界当导演。贝克特非常早就重视视觉传媒，他的黑白照片中，那双鹰一般的眼睛令人难忘——这种目光，正是一种后现代的目光，寻找生活的荒诞、世界的荒诞、人的荒诞。第二个原因是，2014年12月，国家话剧院剧场演出贝克特戏剧《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时，有观众嫌舞台动作太慢

而用英文爆粗口。颜榴老师说，“粗口事件”本身也是一种荒诞，是贝克特后现代戏剧来到当代中国衍生出的一种荒诞，也预示着当下的观众并没有领会“贝克特的目光”的真正含义。

2014年冬，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可以说是一次云集大批高水平外国当代戏剧的饕餮会。在此之后，颜榴老师写了一篇文章《现代与后现代美学，我们抵达了吗？——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巡礼》（《读书》2015年7期），解释当下中国的戏剧与后现代戏剧存在相当大的“时差”。随着近年来外国戏剧愈加频繁地在中国上演，后现代戏剧的问题更加需要梳理，贝克特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既是桥梁，也是坐标。

贝克特与长篇小说《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都是爱尔兰人。乔伊斯与贝克特，是属于在欧洲流浪的形同父与子的两代作家，而贝克特是乔伊斯的忠实追随者，把乔伊斯看成是艺术家的“最高范例”。两人都痴迷于一种“人与世界不协调”的哲学意义——世界这双鞋不适合于人这双脚。世界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荒诞，成为了困扰乔伊斯一代人和贝克特一代人的共同问题。颜榴老师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法国的成功，意义与《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出版的意义能够等量齐观。

但贝克特与乔伊斯的性格特点不尽相同。乔伊斯性格热情，贝克特则天生冷漠。根据传记，贝克特与乔伊斯经常长时间相对而坐，却只字不言。颜榴老师认为，这是个悖论，一个热情的人可能只是为自己

的小家考虑，但一个冷漠的人却怀着对世界的怜悯和悲情。他们两人的第二个区别是，在创作风格上，乔伊斯喜剧性地看待世界，有嘲讽，充满生命力；而贝克特则是带着喜剧的面壳，骨子里是悲剧性的。

语言问题也在贝克特的戏剧创作道路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个契机之下，贝克特开始用法语写作，可谓“破蛹而出”。此前贝克特的英语写作，一直“活在乔伊斯的阴影之下”；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不再有母语中漂亮的修辞，但这种陌生化会导致一种突破性的戏剧效果。《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 1953年上演，5年内被译为20余种语言，观众达100万，是现代戏剧与后现代戏剧的重要转折点。颜榴老师说，如果说现代主义讲的是“人存在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萨特、加缪讲要选择，“要与荒谬作斗争”，那么到了贝克特，则是“虚无的彻底登场”，人生毫无意义，斗争也毫无内容。在《等待戈多》中，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甚至可以说没有人物——只有几个影子凑在一起闲扯……这种“生命的瘫痪状态”，贯穿贝克特后来的所有创作。

贝克特剧作中的人物，都是“自我隔绝的孤独个体”。他们跟人没法交流，特别像一种自我表演的哑剧。贝克特曾说 he 最喜欢的演员是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1889—1977)。颜榴老师觉得，其实他表现的人物更接近一位默片演员基顿(Buster Keaton, 1895—1966)，他是一个“近乎独语的精神病人”，始终陷于“孤独者的独语”的泥潭之中。贝克特剧作的主题，则是“世界的荒谬感与生

命的荒谬感”，充分体现于贝克特晚期的剧作中。例如，在《美好的日子》中，生活就是一个垃圾堆，人在其间是生命的爬虫，但是在杜撰生活的幸福，这个“美好”是打着引号的。颜榴老师指出，荒诞派戏剧的说法归功于马丁·艾思林（Martin Esslin, 1918—2002），他寻找贝克特、尤奈斯库、阿达莫夫、热奈、品特等多人的戏剧与古老戏剧之间的联系从而确认了这类戏剧的价值，而提出荒诞派戏剧（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的概念，表达了人对世界分崩离析的感受，从而让观众能够带着尊严面对真实的人生。

介绍完贝克特其人之后，颜榴老师介绍了三位受到贝克特影响的西方剧作家与导演。第一位是奥地利的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 1931—1989），他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伯恩哈德对世界与时代的概括是：“国家注定是一个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我们麻木不仁。”他的戏剧《伐木》和《英雄广场》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来到中国上演。第二位是奥地利的彼得·汉克（Peter Handke, 1942—），成名作是1966年的《辱骂观众》（Offending the Audience）。此剧中，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他的另一代表作《自我控诉》中，则是两个人从头到尾诉说着自己的冒犯行为。这个戏曾于2009年被中国青年导演搬上舞台。《卡斯帕》也是汉克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一个人如何学习说话、并逐渐成为语言的奴隶的过程。

由此，汉克被誉为创造“说话剧”与“反语言规训”的大师，有学者认为，《卡斯帕》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堪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但颜榴老师认为，与伯恩哈德和汉克相比，贝克特戏剧的影响更为独特与深刻。颜榴老师指出，伯恩哈德和汉克的共同特征是社会批判和庸众批判，但贝克特的戏剧很少指向社会和大众，他的人物是缺乏交流的“独语者”。贝克特并没有针对社会的愤怒，他有的只是冷漠。伯恩哈德和汉克与当权者对抗不合作，他们都站在社会前台，贝克特则更像个隐士。伯恩哈德、汉克的人物都是正常人，但贝克特都是从那些带有疾病的个体即“不正常”的人出发，从哲学意义上审视人与世界的不协调，高度象征化、寓言化，这是伯恩哈德、汉克单纯的社会控诉所没有企及的抽象高度。

受到贝克特影响的大戏剧家，还有美国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 1941—），正是“粗口事件”的对象。威尔逊身兼表演艺术家、装置艺术家、灯光设计师等多重身份，是一个跨越艺术门类界限、地理界限的跨界能手。他的作品以时间长、动作慢、视觉新颖而闻名，还非常擅长舞美，是后现代剧场美学的范例，也是演出贝克特戏剧的权威。

贝克特等荒诞派剧作家与中国的关联，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了中国与现主义戏剧将近三十年的时差。林兆华导演的《三姐妹·等待戈多》把契诃夫与贝克特并置，蛮天才的，近年又组织“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对中国当代的戏剧贡献非常大。1991年《等待戈多》首次在中

国舞台呈现时，还是一种纯粹的“美学冲击”，中国社会并未完全商业化；但近年来，随着商业化的汪洋逐渐淹没当代社会，贝克特戏剧中的哲学意义才逐渐显露出来。一些有海外学习背景的年轻导演，把西方剧作家的作品移植到了国内，其效果还要拭目以待。现在中国研究贝克特戏剧的学术水准以及呈现贝克特的作品还都非常不够。年轻一代对贝克特有兴趣，理解上可能还存在一定距离。

随后，颜榴老师着重介绍了几位后现代戏剧的重要导演。如希腊导演特尔佐布罗斯提倡“看戏要思考”；热爱旅行的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 1925—）一边旅行一边创作出不少神奇的“天然”剧场作品；波兰导演陆帕（Krystian Lupa, 1943—）目前正在排演一出根据中国作家史铁生作品改编的《酗酒者A》；德国导演奥斯特玛雅（Thomas Ostermeier, 1968—）已经在乌镇用前苏联导演梅耶荷德的方法做过工作坊。

颜榴老师所敬重的导演是日本的铃木忠志（Suzuki Tadashi, 1939—），认同他动物性能量的戏剧观以及他将日本文化进行现代化转换的高超功力。她比较推崇美国导演罗伯特·威尔逊与他的合作者，现代音乐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 1937—），认为他们两位是后现代剧场的天作之合。

颜榴老师欣赏三位中青年导演，她指出德国的塔尔海默（Michael Thalheimer, 1965—）的戏剧观与中国当下流行的风潮恰好相反，剧场不是宣扬如何开心，戏剧诉说的永远是痛苦，然后

人想要做出改变。而立陶宛的科尔苏诺夫（Oskaras Koršunovas, 1969—）拥有出神入化的舞台想象力和空间调度能力，他处理经典作品不删减、也不添加时髦的流行语，却有鲜明的当下感，特别值得中国戏剧人借鉴。

观看华裔导演沈伟的作品，被颜榴老师称作是“遇到了美的袭击”，因为如今的戏剧不再是语言艺术，美国某些大学的戏剧系已经改名为Theatre Dance and Performance Art。沈伟舞蹈艺术像诗、舞蹈、词语、图像、声音的渗透。国内的戏剧人与他相比还是有点半生不熟，沈伟的东西比较成熟，他完整而娴熟地掌握了视觉剧场，作品丰富、复杂，还非常美，她希望大家有时间关注这位中国的“准大师”。

根据渠敬东教授的提议，为了帮助听众从感性上建立对后现代戏剧的基本认识，颜榴老师准备了经过剪辑之后的十出精选戏剧的浓缩版视频，结合讲座，穿插播放，包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大鼻子情圣》《李尔王》、《克拉普的最后碟带》、《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哈姆雷特》、《声希》、丹麦的《盐》、波兰的《剖腹产》，以及话剧表演艺术家冯宪珍主演的《美好的日子》等。

对于中国戏剧的后现代化，颜榴老师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中国戏剧存在理念上的差距，这也是威尔逊《克拉普的最后碟带》舞台前观众爆粗口的内在原因。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百年戏剧遗产有三个，代表人物为孙维世（1921—1968）、焦菊隐（1905—1975）、黄佐临（1906—1994），并认识到我们与世界戏剧的差距。

第二是关于“民族化与主体”的争论。颜榴老师说，我们对“民族化与主体”的争论是个伪命题，源于文化的不自信。我们应及早放下所谓油画—国画、芭蕾舞—民族舞之类被民族、地域所禁锢的艺术争论，“好好地练内功”。第三，商业化的侵蚀使戏剧成为一种“美学谎言”。近年来，商业化的冲击导致“伪戏剧”的产生；与此同时，普遍流行于中国的以影视名角票演话剧的明星效应，在西方更是不存在。随着商业追求而不断发展的舞美技术，其被技术笼罩的外壳下，事实上正在发生戏剧内核的逐渐丧失。

颜榴老师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与阐释，绝不是一种无方向、无方法、无目的的开玩笑与小品式的表达，后现代的戏剧人物以及舞台美学其实要比古典戏剧更为艰难。最后，颜榴老师强调了认真领会学习贝克特，包括对戏剧观众的培养的重要性；还要格外注重“诚”和“静”——心诚，不能做后现代的“批发商”；心静，艺术需要自我沉潜，尤其急不得。法国诗人兰波曾说：“唯有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才能走到明天壮丽的城池。”这句话也被颜榴老师收入专著《京华戏剧过眼录》的后记中，喻示着中国当代戏剧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在师生提问环节，颜榴老师强调，中国戏剧的真正探索在1999年左右几乎终结。20世纪末某些戏剧在中国瞬间获得了

巨大的商业成功，导致此后的戏剧工作者开始向商业化转型而逐渐偏离原本的戏剧精神。先前着重介绍的几位优秀的欧洲导演与在美国发展的沈伟都属于60年代后生人，都在真正做戏剧，看他们的作品能够真正体悟到“戏剧内核”的力量。中国现在还是少有人排演莎士比亚戏剧、古希腊悲剧，而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割舍的戏剧对象。当周锡瑞教授问到，美国近期的一部戏票房很好，艺术质量也不错，该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时，颜榴老师回答，美国戏剧与中国戏剧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主流戏剧、商业戏剧与实验戏剧各个层面都全方位的丰富发展，所以出现艺术与经济的双赢不奇怪，而中国戏剧在以上这几个方面的界限都比较模糊，发展也还都比较薄弱，尤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小剧场”模式与“明星效应”：其一，出于“找乐子”的、爆笑式、“小品”模式的戏剧占领了大部分的市场；其二，由于“明星效应”使然，观众对明星的关注度远高于戏剧内核，而某些国有话剧院团的某些明星常常会由于其他电影、电视的演出而“名正言顺”地推掉话剧表演，导致观众不见明星不买票的话剧市场窘境。可见，当下逐渐偏离正轨的中国当代戏剧，依然是戏剧工作者们亟待努力的一个课题。

（撰稿：施朝）

## 10

### 杨浪： 地图的发现



2017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文研院“文研雅集”系列第十期活动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当代著名媒体人、地图收藏及研究者杨浪以“地图的发现”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担任评议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次活动。

主讲人杨浪现任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海航文化控股集团董事长、云南祥鹏航空副董事长、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讲授新闻编辑学），自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

于《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担任高级职务，著有《地图的发现》（北京三联书店，2006）、《地图的发现·续》（北京三联书店，2008）、《老歌的发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等。

杨浪以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为引子——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杨浪说，民初引入现代教育后，史、地分家，但其实离开地理，历史是读不通的。现代教育中历史与地理的隔断，在现代社会中衍生出诸多问题，例如在北京电视台纪念长征70周年的节目中，提到贵州省的乌江，竟扯上了“风



马牛”的项羽。因此，把历史的研究与地理研究、现地踏勘结合在一起，尤为重要；而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判断，尤其是对大场域问题的判断和组织，都必须依靠地图。

地图是拥有空间控制、群体迁徙和流动的前提，是执政的重要依据，是宣示权益的历史依据，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托。地名直接关乎历史地理，关乎历史上群体的迁徙和流动，而战争是群体迁徙和流动的最典型形式。对于地图宣示主权的功能，杨浪举了西藏山南地区的例子。在这片 9 万平方公里的中、印争议领土，中国对外宣称主权，但中国的官方地图上曾经仅仅标出了 6 个地名；经过中科院郝晓光博士的奋力研究，西藏山南地区的 27 个新地名被考证出来，这些地名后被国家民政部所增加。由此可见，地图能为国家主权的宣誓起重要作用。

在杨浪专著《地图的发现》中，杨浪曾对地图有过如此描述：“用线条描绘的

历史，用符号勾勒的现实，用版本积累的震撼，用技术制作的文化。”人类原本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平均身高的“一米七”，看不到广域的事物；而地图的视角，包括将各种地貌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则意味着人类认识的“巨大升腾”。

杨浪从四个方面解释了地图的形制：

第一，人只有言不能达意时才画图，因此图中的信息内涵比文字复杂，比语言清晰，比公式生动。杨浪说，包括艺术作品的非语言产物，其所宣泄、所表达的情感和信息内涵，都远比语言更为丰富和清晰；而一张感兴趣的地图，完全可以“当成一本小说看”。根据国外地图学界的普遍观点，现存最古老的地图，不外乎迄今 2000 年的马绍尔群岛地图、迄今 2700 年的古巴比伦地图、迄今 3500 年的意大利溪谷地图以及迄今 3700—4000 年的苏联南高加索一出土银壶上的图案等几种。而杨浪认为，人类最古老的地图应该在岩画上。

在杨浪展示的几种土耳其地区的岩画中，都标明了水系、狩猎区域等信息；杨浪说，传递这些扎根于生活的植被、狩猎、水系等信息，岩画都是最好的形式，而这些岩画都应纳入地图的范畴。

第二，地图是“上帝的视角”，是俯瞰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需要大的胸怀，其视觉记录也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从马王堆图、放马滩地图到遥至西藏边界的康熙大地图，可以看出，较高的技术手段是制作广域地图的必要条件，这从前提上限制了民间制作广域地图的可能性，需要动用强大的行政组织力量。

第三，对于比较文字记录中的误差，地图是最精确的文本之一。杨浪说，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任何历史文本都是相对不完备的，都是需要修正的；而地图的形式则不同，其精确程度的限制只有技术，基本上没有主观故意。对于地图中那些出于非技术原因的“故意的误差”，很容易找到理由来证明。现今的地图需要不断修测以保证其精确性，但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故意隐藏一些信息，这是另外的话题。

第四，研究历史必须依靠文献，而表空间位置的图在文献中极为重要，不可替代。例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周瑄《琉球国志略》中的琉球国图，能够为钓鱼岛问题提供积极的证据。但由于地图印制传播较文字困难，许多古地图流传不易。

杨浪指出，地图收藏能够改变读书的方式，令我们在读书时建立一种全新的思维习惯：不仅思考历史在时间上的演进过程，而且思考历史事件、人物在空间上的存在方式。杨浪还以平型关战役的历史事

件为例说明，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对历史产生更为微观的认识，如此在读书时，“不但会为其道理、故事而兴奋，还会因为看到了它们是在哪个山岭、道路上发生而兴致盎然”。

随后，杨浪分别讨论了三种地图或与地图相关的故事。荆轲献给秦始皇的地图，足以包住匕首的篇幅与今雄安新区并不大的地理范围似有矛盾，可见其中地理内容之丰富；从一幅日本人 1935 年绘制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的真伪问题展开分析，可以为当时红军长征事件对外传播的历史增添新的内容；用地图的角度分析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题记中出现了一处“东西”相悖的地理信息错误，而《鹊华秋色图》中的水文描绘，结合 78 年前一次黄河改道的历史，还孕育着一个对中国战争史的一个“不说之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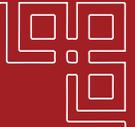
负责评议的许宏老师结合考古学区域系统调查的经验，强调了地图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二里头周边 600 余平方公里的地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平地；但考古学研究者通过对传世地图的利用，可以使当地原始的聚落形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此，地图对于考古学研究非常有价值。另一方面，从地图的功能来看，地理学者也可以显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评议之后，杨浪与与会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并进行了各项问答。

（撰稿：施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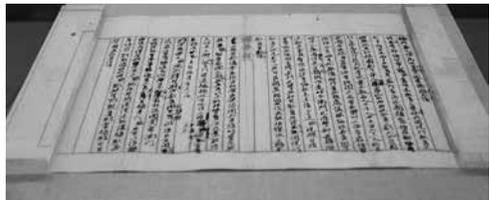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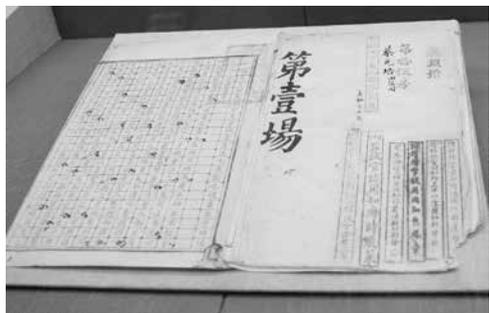
## 专题展览



## "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



蔡元培请求发给出国咨文的呈文



蔡元培 1885 年乡试第一场的考卷

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一百周年，自 2017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29 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蔡元培与北大”主题展览。展览内容贯穿蔡元培从年少走入科场，中年执掌北大到晚年移居香港的人生历程。精选其中展出的部分文献资料，以飨读者。

感兴趣的参观者，可以观看多媒体纪录片，更全面地了解蔡元培先生的一生。

蔡元培出生于商人之家，成长于人文之乡，因“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翁同龢语）而科场得意。

1892 年 5 月 22 日，蔡元培在保和殿

应殿试，获“二甲第三十四名”，赐进士出身。展览陈列出当年的殿试策论对。其中“习形法家言者，使之正方位，蠹华离。习名家言者，使之定考格，条法家。习农家言者，使之录民天，会国用”的说法，可初窥蔡元培兼容百家思想之端倪。

然而，翰林的头衔挡不住蔡元培维新的志向，在不惑之年，蔡元培认为“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自费留学德国，浸润于世界一流学府四年之久。一位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传统文人，成为具有世界眼光的学界领袖。

1912 年 3 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成立，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不久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而辞职，旅居德、法，从事教育、哲学和美学研究。

1916 年 8 月，教育总长范源廉致电在法国的蔡元培：“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抱定“教育救国”的理想，力排众议接受了任命。1916 年 12 月 26 日，大总统黎元洪签署了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他到任后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奠定了北大的思想传统，为中国树立起一个尊重学术的大学样板。

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到北大视事，发布就职通告。1 月 9 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肩负力矫社会颓俗的重任；师生应以诚相待，敬爱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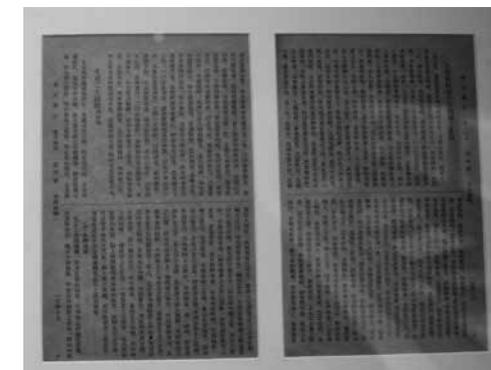
蔡元培认为聘请“积学而热心”之士到北大任教是办好北大的关键。他既尊重辜鸿铭、刘师培等“老古董”，又大力聘请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

1917 年 9 月，蔡元培签发聘请胡适任北大文科教授的聘书。9 月 10 日，胡适到达北京，开启他在北大的十年教学生活。胡适一到北大即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三门课程。

蔡元培认为管理体制是办学的保障。在北大改革时，蔡元培基于教授治校的理念，在北大设立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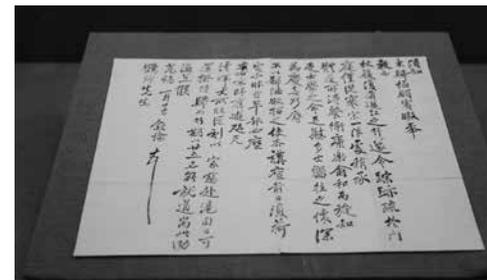
1916 年 11 月 22 日，范源廉致函蔡元培，敦促其早日赴京就职



《东方杂志》第 14 卷第 4 号上刊载的《大学校长蔡子民就职之演说》全文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教授



蔡元培邀请马叙伦到北大哲学系任教，马叙伦欣然接受

会议、总务会四个组织部分。

因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迁至北京。北京大学的一批革新派教授如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宣扬民主和科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

1920 年 4 月，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以洪水比喻新思潮，喻猛兽为军阀，呼吁疏导洪水，驯服猛兽。文章刊发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蔡元培在北大积极倡导科学研究，促进学术繁荣。当时北京大学出版了《国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等多种学术刊物。



北大学生编辑出版的新文化月刊《新潮》，英文名意为“文艺复兴”，于1919年1月1日创刊，由蔡元培题写刊名



蔡元培设计的北大校旗。原文刊载于1920年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1920年3月，《音乐杂志》创刊，蔡元培题写刊名



蔡元培记录在日记中的辞呈

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乘船赴法。在此后近十个月的时间里，游历了瑞士、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走访了包括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牛津和剑桥等几十所大学，详细考察了各学校传统、办学特点、管理体制及专业设置等，并拜访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

然而，蔡元培的校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1917年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蔡元培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1919年5月3日，北京政府命令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蔡元培获悉后转告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学生。于是，4日在北大学子的联合下，天安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到达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火烧

曹汝霖住宅。遭到军警镇压，北大学生许德珩、潘菽、杨振声等20人被捕。

5月9日，蔡元培与各校校长积极将被捕学生营救后，递交辞呈，离京南下，并请蒋梦麟代办校务。经各方的再三敦请，9月蔡元培返京复职。

1923年1月17日，因反对教育总长彭永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蔡元培向大总统呈请辞北大校长职。声明“不再到校办事”，后又决定赴欧。此后，校长一直由蒋梦麟代理。

1927年8月6日，北洋政府大总统令将北京大学等北京国立九校合并成立“国立京师大学校”。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之职由教育总长刘哲兼任。蔡元培校长名义随即取消。1928年蔡元培出任中研院院长。

1929年9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命



1926年胡适致函蔡元培，对北大教授纷纷辞职离去深感忧虑

令“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未到任前，由陈大齐代理。1930年9月19日，国务会议第九十四次会议决议照准蔡元培辞职。12月4日，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免去蔡元培校长之职。

蔡校长的改革，不仅限于北大，也不仅限于教育。在今天的北大校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蔡校长的身影；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我们处处可以听见蔡校长的声音。

(撰稿：周伯洲)



北大校园的蔡元培像



留德时期的蔡元培



中研院院长时期的蔡元培



## 文研回望

## 文研院举行 2017 年春季邀访学者欢迎会



2017年3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春季学期邀访学者欢迎会在静园二院111室召开。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第二期邀访学者高曼士教授、许宏教授、张瀚墨副教授、童岭副教授、袁一丹副教授、李霖副教授、吕博博士参加了欢迎会，首期邀访学者德国图宾根大学汉韩学系助理研究员曹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怀颖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也受邀参加了此次欢迎会。

欢迎会在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的主持下正式召开。首先，她简要介绍了参会的学者，并代表文研院表达了对第二期邀访

学者的热烈欢迎。随后，在座学者共同观看视频，了解了北京大学、静园二院的历史及文研院的基本理念。

之后院长邓小南教授发言，感谢邀访学者对文研院的支持。她指出，邀访学者项目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这一项目的目标与文研院“近者悦，远者来”的主旨不谋而合。邓院长希望文研院真正担负起服务学术、搭建学术平台的重任，更加重要的是搭建起一个服务学者的平台，真正实现文研院“激活思想，涵育学术”的宗旨。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随后发言，他指出，文研院的建立和发展是学者们共同努力的成果。他对文研院的未来和发展充

满信心，希望新一批邀访学者在文研院可以实现切磋学问、建立友谊的目的。

院长助理韩笑向在座学者简要介绍了文研院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文研讲座、文研论坛、未名学者讲座，以及今年将要推出文研读书项目。此外，文研院的日常活动还包括每周例行的内部报告会和雅集/茶叙等活动。他热情地邀请邀访学者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在日常的学术活动中搭建起交流的平台，也希望邀访学者积极贡献自己的想法和学术主张。

第二期邀访学者分别对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进行了介绍。大家纷纷表示，感谢文研院提供此次访问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许宏教授的研究领域为考古学和上古史，他希望学界打破“表扬与自我表扬”的风气，通过学术讨论真正提出问题，让思想的碰撞对学术有所帮助。

比利时鲁汶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系高曼士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的早期现代建筑，不仅涉及建筑史和建筑考古学，还涉及中欧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他的研究基于跨学科和多学科视域，以了解建筑物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促进遗产价值观共享，进而找到保护文化遗产的最佳措施。他希望在文研院访问期间，能够对文研院的跨学科和国际交流做出贡献。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李霖副教授的研究重点是经书，致力于研究《诗经》中经书的话语体系。他指出，看似杂乱无章的“毛诗”内部其实存在着秩序井然的体系，这是汉代经学家在经学理论基础上层垒建立起来的。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副教授的研究方向为六朝、隋唐时代的抄本，尤其是海东的抄本文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老师对礼制变革的驱动力问题的研究颇有心得，以官印的转变为例引发了对于礼制变革的思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瀚墨副教授的研究集中在文献和物质文化领域，他对马王堆的兴趣引发了他对历史地理问题的一些疑问，得到了邓院长对继续追溯研究这一问题的肯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副教授的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的思想与人物、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研究重点是抗战时期日本占领下文人士学者的处境。

第一期的邀访学者代表罗祎楠、常怀颖、曹晋，与大家分享了他们上学期在文研院的访问学习心得和经验，对文研院提供的良好学术环境进行了高度评价及感谢，并对新一批邀访学者在文研院的研究表达了祝愿。欢迎会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撰稿：禹思恬）

##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艾朗诺教授访问北大文研院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于2017年4月2日至12日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院的特邀教授，艾朗诺教授在访问期间参与了“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这一文研论坛，并作了“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的文研讲座。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年生，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19岁师从白先勇先生学习中文，1971年入哈佛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尤以《左传》为主。1976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孔子学院汉学教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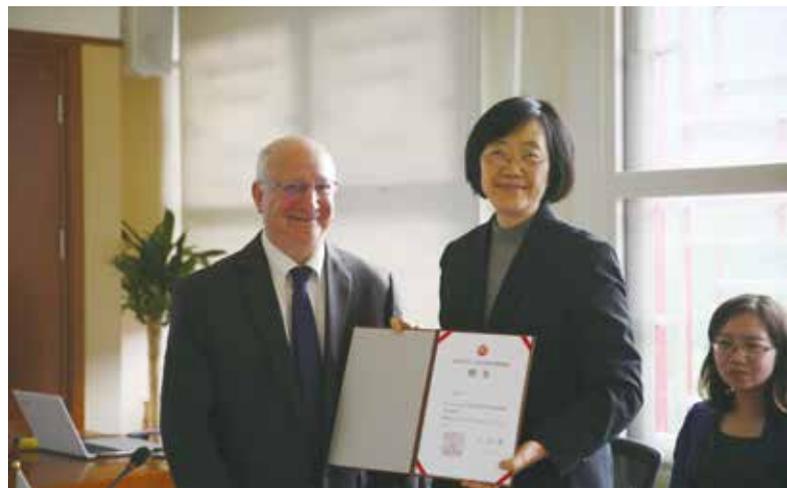
与历史。他曾用英文选译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 (1998) 一书并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北宋文学部分。其代表作还有《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等。

4月5日下午，由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四期“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张剑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东瑶教授莅临并参与讨论。美国华盛顿大学伊佩霞（Patricia Ebrey）、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了此次论坛。

论坛中，艾朗诺教授首先为大家阐释了他报告的主题“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强调了正统与非正统的差异和联系，以及文与史结合的重要性。随后，他聚焦于志怪笔记小说，解读了三个《夷坚志》中的压抑故事并总结“世界古代文化，哪一个不是压抑”，进而提出了“焦虑史”的概念。艾朗诺教授表明自己选择研究非正统文学，

即志怪小说，不是为了解当时的宗教史，而是为了解当时人物的情感、当时人的“焦虑史”。因为人所焦虑的事情很要紧，而且很能体现当时人心中最深切的东西。然而，焦虑史不是思想史，因为它不像思想那么抽象，那

么有知识内容。我们在阅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有事情要说，一方面又不能说得太详细或者太露骨。这或许不是完美的叙述方法，但还是比起完全不提、根本不说更好一些。张鸣教授指出“焦虑史”这一概念的提出让人十分佩服，我们只谈观念史、概念史、思想史等，但是生活是由很多焦虑构成。刘宁研究员赞赏了艾朗诺教授研究的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解，但她也提出正统文学与非正统文学的边界是相对的，是变动的，正统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非正统会随着研究不断加以突破而逐渐成为正统。张剑研究员也赞赏在主流观念忽略的材料中发现历史的缝隙与隐藏的情感。马东瑶教授作为艾朗诺教授著作《美的焦虑》的忠实读者，再一次提出正统文学与非正统文学的边界是变动的，文体之间是有地位高低之分，就像史料的可信度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地位较低的文体是被我们慢慢纳入到正统研究范畴之内的，一般说诗文是最正统的，因此，或许



用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的划分是更加恰当的。

4月11日晚，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担任评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鸣教授出席活动。

艾朗诺教授以苏轼的题跋作品为焦点，从北宋朝廷树立书法模范与对书法历史特定看法的尝试、迅速发展的北宋印刷业、北宋末年的政治党争和新党对作为元祐党一员的苏轼的迫害、北宋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作品商品化四个角度，结合北宋当时的社会现象探讨了苏轼的书法思想。他认为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历经隋唐一直到北宋初年，在苏轼之前业已出现大量探讨书法的文章，体例丰富、内容多样，但并没有专门探讨书法创作的题跋作品，更没有人系统地创作和整理题跋集，因此苏轼



的题跋作品无疑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和思想价值，为我们观察宋代以来文人书法创作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在宋代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影响。然而北宋以来印刷术的发展，随之产生的书本泛滥现象与书法商品化的趋势，也引起了苏轼和许多文人的不安，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人们疏于精读文本，文本也同作者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密切关联。反观当下，书法手稿成为艺术作品与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象征，这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当某一种文化活动受到威胁时，它便产生了新的意义。由此来理解苏轼的题跋、诗歌和文章的创作，在如今文字日趋式微的时代，也能以全新的眼光来发掘书法的别样意蕴。讲演后，朱青生教授评议道：艾朗诺教授的报告对苏轼的书法思想有着深入浅出的探讨，听后深受启发。对苏轼书法观念的探讨，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以书法作品为视角，探讨书法家对自我、对他人、对外物、对世界的体认。张鸣教授随之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苏轼的书法在其生活的年代兼具实用性和艺术价值，二者之间

是否存在区别，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区别。对此，艾朗诺教授认为实用文字和书法创作截然不同，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而难以界定的；考察书法作品并进行优劣之分，是苏轼所处年

代的常态，而实用作品兼具艺术性，这也是一种当时的普遍观念，甚至苏轼作为书法家在撰写信件、公文时，也是有所自觉的。而这一评价方式的新变化相应地引发收集和鉴赏信札的新热潮，甚至一度视书法家的个人信件高于其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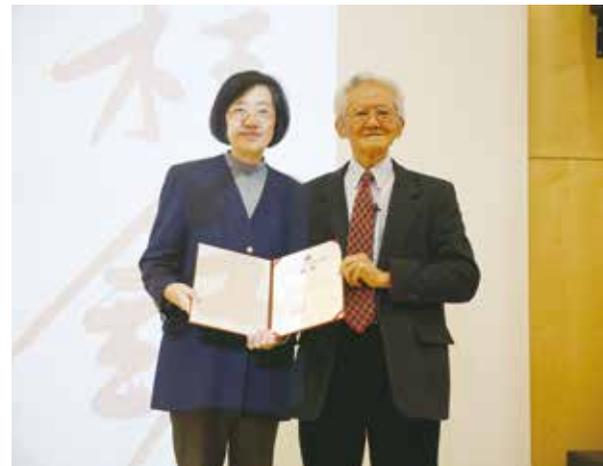
艾朗诺教授通过讲座、论坛、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围绕“艺术与人文”系列议题与校内外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访问期间，艾朗诺教授还与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汉语推广办公室、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的相关人员召开联合工作会议，就斯坦福大学与北京大学的校际交流、孔子学院建设进行了探讨。

(本文于2017年4月19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 著名书画理论家傅申教授访问北京大学文研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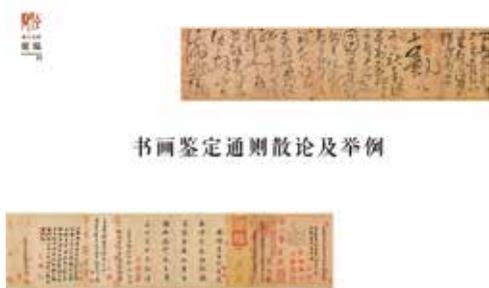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著名书画理论家、鉴定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傅申教授于2017年4月2日至12日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院的特邀访问教授，傅申教授在访问期间参与了题为“书画鉴定通则散论及举例”的“北大文研论坛”活动，并主讲了两场文研讲座，与来自北大校内外艺术史专家、书法研究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傅申，字君约，1937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博士学位。历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耶鲁大学副教授、佛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书

画史与书画鉴定，著有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海外书迹研究》、《张大千的世界》(与陆蓉之合著)等；编有《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蹟集》(与中田勇次郎合编)、《董其昌の书画》(与古原宏伸合编)等。

4月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五期“书画鉴定通则散论及举例”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报告厅举行。傅申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淞教授主持，中国国家博物馆朱万章研究馆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邵彦教授、文研院邓小南院长等参与了讨论。

作为引言人，傅申教授首先和听众们分享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并从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出发，展现自己不同年龄由于生理、年龄、病理等原因而在照片中呈现出不同的容貌，生动阐述了在鉴定心理方面“怀疑事物为假易，鉴定事情为真难”的道理。随后围绕“时代风格与大师”，“个人风格的早晚期演变”以及“书法中的墨迹与刻拓本之间的关系”三方面展开论述。在傅教授的主题发言后，与会学者就该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朱万章研究馆员根据引言提出问题，其中包括美国炒得沸沸扬



扬的新发现的王维的山水画的真伪性一事。对此傅教授回应道：明末的董其昌听说新发现王维的画时，不远千里请人拿过来研究，这种精神很可贵；由于傅教授本人也没有亲眼见识画作，因此也不明确其真伪性，不过现在还没有一幅作品是公认的王维作品，因而这次事件可能有炒作的嫌疑。随后，邵彦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书画鉴定是完全可以学会的，但是需要条件，包括小环境和大环境的影响。过去，私人收藏和博物馆收藏处于良性循环，现在则是争夺藏品，而且越来越金融资本化。此外，在书画鉴定时，不能过多受到媒体引导的影响，而是应查找资料并自主判断。傅申教授很同意邵彦教授的观点，认为解读文字根据什么版本有时很难确定，有时还是根据书法本身去理解更可靠。鉴定书画应该根据合乎科学的方法，但是很多作品都有名家大家鉴定，很多学者在自身不是美术专业出身的情况下转向文化史政治史去诠释。

之后4月7日晚，傅申先生担任“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九期第一场主讲，作了题为“书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的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担任主持并评议。

在演讲中，傅申教授指出：自中国绘画中心南移之后，书画家的交通便以舟行为主。宋代的米芾即有“书画船”，明清以降，文人士大夫几乎人人都有私人游船。在船上创作、鉴赏书画因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画船”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山水画中“水上山水”风格的形成。现在这些传统即将消失，明代钱穀淮安城外所画的情景，已无法再现。隋唐书画家主要在黄河流域，到了明代，书画家主要分布在南方。南方书画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书画船”。关于“书画船”的形制，明代版画上的有所夸张。但中国的书画船历史悠久，也很普遍。如顾恺之的楼船、清明上河图中送别场景的船、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等；还有苏州园林的旱船（在园林水塘中不动的船，怀念行舟的乐趣）、高士齐的书画船、颐和园昆明湖上有石舫等。最后，傅申教授总结道：20世纪中期，全世界独有的“流动画室”——“书画船”的传统，由于生活和交通的革命性改变，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也在全世界消失。艺术总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这一条却永远也不会消失。

4月10日下午，傅申教授主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九期之第二场，演讲主题为“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附论书法鉴定问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尹吉男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出席了活动。

傅申教授首先介绍了对于黄庭坚《砥柱铭》研究的缘起。《砥柱铭》因为于2010年拍出天价而备受关注，而傅教授对

其关注是源于他自博士论文以来一贯的学术兴趣。在对《砥柱铭》作了简要的介绍后，傅教授介绍了海内外所藏黄庭坚真迹，并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作了解说，以确定黄庭坚墨迹的鉴定标准。傅教授随后探讨了黄庭坚《砥柱铭》的鉴定问题。他从“也”字的上钩和利如刀刃的长捺入手、多方楞或另起一笔的折肩、“爲”字从“心”、“糸”部不连笔以及横笔和撇笔的斜度等等黄庭坚书迹的一般特征入手，认为这些是黄庭坚书法个人的习惯，从而证明《砥柱铭》是黄庭坚真迹。在讲座的最后，傅教授探讨了《砥柱铭》的书写年代问题。如同不同年龄的人相貌不同一样，一个书法家不同时期书写的作品会有很大的差别。通过与黄庭坚其他书法作品进行比较，并对黄庭坚所用毛笔进行分析，傅教授认为《砥柱铭》的书写年代应在1094—1095年间。《砥柱铭》为黄庭坚大行楷书书风转变初期的重要作品，对认识黄庭坚的书法特点

具有重要意义。在傅申教授的报告之后，尹吉男教授谈了自己的感想。尹教授认为，傅教授今天一方面回应了自己过去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学界关于黄庭坚《砥柱铭》墨迹本的质疑。书画鉴定之难，在于其绝大多数是传世品，出土的作品很少。傅教授在样本稀少的条件下，全面地考察了黄庭坚《砥柱铭》，非常不易。

访问期间，傅申教授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与校外外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傅申教授讲学活动也是文研院在“艺术与人文”这一核心议题下所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

（本文于2017年4月19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 "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开幕仪式隆重举行

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00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于2017年4月26日至201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蔡元培与北

大”专题展览。4月26日下午，展览开幕仪式在赛克勒博物馆中厅举行，来自校内外多个单位的嘉宾和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莅临本次开幕式，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教授担任开幕式主持人。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首先致辞。郝平书记表示，蔡元培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于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大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为广大北大人所尊敬的“永远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和学术的繁荣，这一思想迄今仍然是北大的学术传统，我们也在发展中丰富着它的内涵。今年是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00周年，事实证明，蔡元培先生的背影从未远去。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以蔡元培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元培学院，致力于倡导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蔡元培先生留给北大的巨大精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北京大学建设的诸多方面，尤其是，蔡元培先生的思想为北京大学探求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明年，北京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20周年，我们将追寻蔡元培先生的脚步，践行北大“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承诺，这也将是对蔡元培先生最好的纪念。

随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致辞。她在致辞中介绍了蔡元培先生的经历同北

大精神的内在联系：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文化再造”构筑了北京大学精神的底色。一百年前，中国的文教制度正在经历从“学堂”到“大学”的艰难转型，是蔡元培先生洞察趋势、力挽狂澜，养成了中国大学的浩然正气。蔡元培先生卓越的建校理念和杰出的育人方向，促进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知识分子茁壮成长。与此同时，蔡元培先生一直怀揣着“面向将来”的宗旨，敦促着北大人不懈探求的步伐。201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即将迎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也正值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0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重温百年往事，缅怀蔡元培校长，将会纯净北大人 的心灵，使广大北大人“抱定宗旨”，“砥砺前行”。

在此之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向大家介绍了蔡元培展览的筹备过程和赛克勒博物馆同蔡元培校长的精神渊源。杭侃教授首先指出了蔡元培先生和北大学子从未间断的精神联系——蔡元培先生的雕像旁永远都摆放着鲜花，这充分证明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学子心目中的独特地位。赛克勒博物馆本次承办“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凭借珍贵的历史资料，较为全面地展现蔡元培校长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历程，是为我们的老校长尽了一份分内的责任。杭侃教授表示，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一流的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愿成为北京大学对外交流和文化展示的窗口。

“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是本年度赛克勒博物馆的重要展览，赛克勒博物馆也将

致力于提供更多精彩的展览，为建设北京大学的校园文化而努力。

此后，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教育学院教授蔡磊珂向大家介绍了“蔡元培与北大”的展览细节。蔡磊珂教授在致辞中提到，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教师，也作为蔡元培先生的后人，她对本次展览的顺利举办心怀感恩。蔡磊珂教授介绍道，本次展览共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展现蔡元培先生的成长过程和求学历程，第二部分主要呈现蔡先生与北大的渊源，第三部分主要介绍蔡元培先生丰富的精神世界。本次专题展览的展品同样引人注目，其中的许多照片是蔡磊珂教授家里珍藏的，以前从未参加过任何一次展览，有些文献资料大家也是首次见到，可以说，这次专题展览必将为观众带来独具特色的视觉盛宴，也将为大家带来亲近蔡元培先生思想的宝贵机会。

随后，上海静安区文化局、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馆向文研院和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赠送书籍，张众局长、杨继光馆长上台赠书，元培学院孙华书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接受了赠书。在开幕式的最后，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演唱了多首与蔡元培先生生平经历相关或与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密切相连的歌曲，为本次开幕式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开幕式结束后，主办方引导观众至展厅参观展览。在观展的过程中，观众们的反馈非常积极，他们纷纷表示，本次展览丰富的展品带领大家走近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经历，进而深入到蔡元培先生思想的



内涵。本次专题展览别具特色的主题设定的布展方式更是为广大观众理解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提供了桥梁，这也正是本次展览的意义所在。

正如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教授在主持时所说的，蔡元培先生的精神一直沉淀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之中。本次“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将令广大观众直接感受到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更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走近蔡元培先生的精神世界。同时，郝平书记在致辞中也指出，蔡元培先生的求知治学和为人处事是本次专题展览所着重介绍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将带给北大学子无尽的思想启迪和人生体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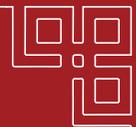
本次展览将于2017年5月29日闭幕，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9:00-16:30（临时闭馆将另行通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诚邀校内外各界人士参观。

（本文于2017年4月27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谢雨新）



## 文研纪事





## 文研纪事

13

2017-02

文研院召开 2016—2017 学年度春季学期第一次院务会议，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飏教授来访，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就两院未来合作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度讨论。

17

2017-02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朱苏力教授在静园二院 109 室，就 2017 年学术委员会年度会议展开讨论。

20

2017-02

“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工作会议在二院召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工作委员刘云杉、教育学院陈洪捷、蔡磊珂等就展览事宜展开讨论，并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实地勘察。

24

2017-02

文研院召开工作委员会二月份月度会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工作委员高峰枫、韩笑、李猛、刘云杉、孙庆伟、邢滔滔、叶炜、张辉、张亚光等对 2017—2018 学年度秋季学期邀请学者的筛选标准展开了讨论，并讨论 2017 年未名学者讲座的工作安排。会上宣布聘任韩笑为文研院院长助理。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与中文系张鸣教授，就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艾朗诺学术活动安排及张鸣教授本人学术活动意向进行交流讨论。

27

2017-02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与李伯重教授就举办 2017 年度“北京论坛”事宜展开讨论。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行政助理团队召开新学期工作动员会。

学术委员李零教授在文研院举办“《剑桥中国上古史》导读”读书课，本课程将为期一个学期。

28

2017-02

静园二院院内玉兰花开始绽放。

01

2017-03

新学期邀请学者高曼士、李霖、吕博、童岭、许宏、袁一丹、张瀚墨入驻二院。文研院第二期邀请学者欢迎会在二院 111 室举行，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第二期邀请学者高曼士、李霖、吕博、童岭、许宏、袁一丹、张瀚墨以及首期邀请学者代表曹晋、常怀颖、罗伟楠参与座谈。

“北大文研讲座”第 25 期暨新学期第一场在二体报告厅展开，讲座由文研院学术委员荣新江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评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

02

2017-03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在二院与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冯金红等就未来合作事宜展开交流讨论。

06

2017-0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埃里克·方纳教授入驻文研院。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杨弘博副院长与台湾逢甲大学李秉乾校长一行举行会晤，就逢甲大学与文研院未来合作事宜展开交流讨论。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杨弘博副院长与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会晤，商谈未来合作事宜。

“北大文研讲座”第 25 期第二场“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在二体报告厅举行，讲座由文研院学术委员荣新江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教授评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段晴教授主持。

07

2017-03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副教授，及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韩茂莉教授等，就居延遗址联合考察并举办历史地理文研论

坛事宜展开讨论。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 111 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许宏教授发表题为“三代、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的报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学术委员李零教授、文研院第二期访问教授高曼士、访问学者李霖、吕博、童岭、张瀚墨、袁一丹等参加会议，并进行交流讨论。

08  
2017-03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在临湖轩与国际合作部夏红卫部长、交流项目办公室主任李昀、专家办公室主任白燕、副主任韩笑开会讨论推进国际学者邀请及开展学术活动等事宜的合作。

09  
2017-03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陈洪捷教授、蔡磊副副教授等就“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相关事宜交换意见，座谈讨论。

10  
2017-03

文研院召开 2017 年度春季在校学术委员会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学术委员陈平原、荣新江、赵辉、朱青生、朱苏力等参与会议。会议介绍了文研院核心议题设置、工作开展和日常管理情况，并就邀请学者工作及 2017 年度春季学期学术活动方案展开了讨论。

11  
2017-03

文研院开展植树活动。

“北大文研读书”第一期“洪子诚教授新著《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在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

院长助理韩笑受邀参加哥大全球中心“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胡适专题展览”开幕式。该展览为 2016 年 9 月由文研院主办的“胡适与北大”专题展览的系列活动之一。

13  
2017-03

“北京论坛”筹备会在二院 109 会议室举行，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伯重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就“历史与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题目进行了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 19 期“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作主题发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担任主持；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研

14  
2017-03

究所王小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王建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路乾博士等参与讨论。

文研院召开工作委员会三月份月度会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工作委员高峰枫、李猛、刘云杉、邢滔滔、张辉、张亚光、周飞舟，就 2017-2018 学年度秋季学期邀请学者候选人展开了筛选及讨论。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 111 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童岭发表题为“贞观年间唐帝国的东亚情报、知识与佚籍——旧钞本《翰苑》注引《高丽记》研究”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及文研院第二期访问教授高曼士、许宏，访问学者李霖、吕博、张瀚墨、袁一丹等参加会议并进行讨论。

北大艺术学院李淞教授等一行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在二院 111 会议室商讨“黄门对话”学术讨论会和“艺术与人文”系列学术活动事宜。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在南阁商讨学术成果出版事宜。

“未名学者讲座”第 13 期暨新学期第一场“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民族主义的一个视角”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 B101 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评议。

16  
2017-03

“北大文研论坛”第 20 期“下鞍进房——游牧民族在中国城市规划上的贡献”在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党宝海及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等出席并进行了交流讨论。

17  
2017-03

“北大文研论坛”第 21 期“汉唐皇帝制度的比较：以皇帝角色与君臣关系为中心”于静园二院 111 室召开。论坛由文研院工作委员叶炜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侯旭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分别发表作主题演讲。

“数字人文研究技能与方法”读书会在二院 201 室举行。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徐力恒先生领读，本课程将为期一个学期。

由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国际合作部、国际批判理论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年度冬季研讨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专场）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张旭东教授参与讨论。

“静园雅集”第 7 期暨新学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室召开。本次雅集题目为“清代版本琐谈”，由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韦力先生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辛德勇教授评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教授、潘建国教授参与并进行交流讨论。

18  
2017-03

“19 世纪美国的历史遗产”学术研讨会在二院举行。此次论坛由“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埃里克·方纳教授及京内外十余位美国史研究学者参加会议并进行交流讨论。

由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国际合作部、国际批判理论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年度冬季研讨班”（青年学者工作坊）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纽约大学 Todd Foley 教授、清华大学谢俊教授、北大中文系贺桂梅教授、东京大学表象文化系武田将明教授参加并进行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 26 期“中世纪行吟诗人——诗歌与爱情的诞生”在二体地下报告厅 B101 举行。法兰西铭文及美文学院终身秘书长米歇尔·赞克主讲，北大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学术委员荣新江教授出席活动。

20  
2017-03

由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国际合作部、国际批判理论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年度冬季研讨班”（青年学者工作坊）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纽约大学 / 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学者王钦、北京大学吴可、北大中文系教授吴晓东、重庆大学邹羽参加会议并进行讨论。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学术委员张旭东与哲学系教授安乐哲在二院 109 室就未来合作事宜展开交流讨论。

21  
2017-03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副院长杨弘博与航天科技集团王巍院士在二院 109 室就未来合作事宜展开讨论。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 111 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高曼士发表题为“中式基督教风格：作为在华本土文化适应手段的建筑”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及文研院二期

23  
2017-03

访问教授陈国球，访问学者童岭、吕博、张瀚墨、袁一丹等参加会议并进行讨论。

“未名学者讲座”第 14 期“帝国图景——亚述浮雕的时空叙述与仪式表达”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 B101 举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担任讲座主持，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担任讲座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学术委员李零、工作委员李猛等皆与会并进行交流讨论。

24  
2017-03

“北大文研讲座”第 27 期“塞尚、科学话语与早期电影”在二体地下报告厅 B102 举行。此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沈语冰教授担任主讲，北大社会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北大艺术学院教授李淞评议。

“洪堡及其精神遗产——纪念威廉·冯·洪堡诞辰 25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静园二院 208 室召开。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编辑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北大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担任召集人。

文研院召开工作委员会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工作委员李猛、刘云杉、邢滔滔、叶炜、张辉、张亚光等就秋季学期邀请学者候选人进行了最终讨论。院长助理韩笑对 3-4 月份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文研院邀请学者茶叙在静园二院 111 室召开，邀请学者针对各自近期的研究计划进行了交流。

“北大文研论坛”第 22 期“洪堡理念与德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论坛由北大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主持，德国洪堡大学教育研究所 Andra Wolter 教授作引言人，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曹卫东参加并进行讨论。

27  
2017-03

埃里克·方纳教授与北大学生交流会在静园二院 111 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参加活动。

28  
2017-03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 111 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香港教育学院讲座教授陈国球发表题为“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的报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文研院二期访问教授高曼士、许宏，访问学者、吕博、张瀚墨、袁一丹等参加会议并进行交流讨论。

29

2017-03

“未名学者讲座”第15期“栖于高山之巅——中国古代的山居形态”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主持讲座，文研院访问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考古与艺术系高曼士（Thomas Coomans）教授担任评议。

“北大文研论坛”第23期“理解当代中国：宪法、政党与国家”在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汪丁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晓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等参加并进行交流讨论。

“唐宋官私目录三题”学术研讨会在二院208召开，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刘蕾、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社科院历史所王天然参加并进行讨论。此次研讨会为文研院“书志与书史”学术系列活动之第一场。

“静园雅集”第8期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此次雅集题目为“明清民国时代的文人歌唱——正本清源话昆曲”，由青年昆曲家、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委、北京理工大学讲师刘昂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活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叶文心来访。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会见了叶文心教授并介绍了文研院五项核心议题。叶教授则围绕值此全球变局时刻，如何推动中国学的发展，谈了她自己的看法。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在二院111室同王南溟等学者，就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与文研院合作事宜展开讨论。

05

2017-04

“北大文研论坛”第24期“拓广唐宋文学研究——文化史中的正统文学、非正统文学与传说”在二院208室召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艾朗诺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宁、张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东瑶教授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吴新峰会晤，探讨首届“新疆民间文化研修班”相关事宜。

“北大文研论坛”第25期“书画鉴定通则及举例”在二院208室召开，文研院特

06

2017-04

邀访问教授傅申担任引言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淞、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邵彦等参加并进行交流讨论。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101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张瀚墨发表题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结合能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早期多幕叙事的例子及其解读”的报告。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文研院二期访问教授高曼士、许宏、孙秀林，访问学者吕博、仇鹿鸣、袁一丹参加会议并进行讨论。

“重新评估李清照”学术论坛在静园二院111室召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艾朗诺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28期“建构世界文学：英国的个案”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伦敦大学女王学院教授Galina Tihanov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秦立彦担任评议人。

文研院邀请学者茶叙在静园二院111室召开，邀请学者就各自近期研究计划、心得进行了交流。

“北大文研讲座”第29期第一场“书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在二体B101报告厅举行，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傅申教授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并担任评议。

“北大文研讲座”第29期第二场“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在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傅申教授主讲，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先生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111召开，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仇鹿鸣发表题为“唐代藩镇变化模式的演化——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二期访问教授高曼士、许宏、孙秀林，访问学者吕博、李霖、童岭、张瀚墨、袁一丹等参加会议并进行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30期“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在二院208召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艾朗诺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担任评议，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出席活动。

07

2017-04

10

2017-04

11

2017-04

12

2017-04

“北大文研论坛”第26期“《高僧传》的文本史——兼谈佛教史文献的性质”在二院208室举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史睿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天、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北京大学哲学系杨浩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出席并参与讨论。

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二院111室举办题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主题与方法（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Theme and Method）”讨论会。

“书志与书史”学术系列第二场“孙过庭生平及其《书谱》——兼论写本与书法”在二院208举行。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发大学毕罗主讲，北京大学图书馆胡海帆担任评议，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史睿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中央美院刘涛、三联书店孙晓林出席了此次活动。

13

2017-04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商务印书馆及蔡元培先生后人商议《蔡元培全集》出版事宜。

“未名学者讲座”第16期在二体B102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娟主讲，社会学系王铭铭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社会学系周飞舟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工作委员李猛出席了此次活动。

14

2017-04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与北大出版社总编一行在静园二院109室就未来合作事宜展开讨论。

昆汀·斯金纳教授座谈会在二院111室展开。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及十余名博士生参与了交流讨论。

“静园雅集”第9期“贝克特的目光：后现代戏剧漫谈”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中国国家话剧院研究员颜榴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活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教授、UCLA中美合作考古班叶娃出席了此次活动。

15

2017-04

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合办的“菊生学术工作坊”第三期“政教相维——近代中国的制度因革与文教转型”在二院208室召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致辞。本次活动为期两天。

“‘抒情传统’的流播与回应”学术论坛在二院111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陈国球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校内外十余名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参加并进行了交流讨论。

17

2017-04

“北大文研论坛”第27期“社会底蕴与田野技艺”在二院208室举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陈家建、冯仕政、黄晓春、李凌静、刘世定、折晓叶、沈原、孙飞宇、孙秀林、王雨磊、闻翔、肖瑛、杨善华、应星、张静、周飞舟等各高校学者参加并进行了交流讨论。

18

2017-04

“北大文研论坛”第28期“从密教中拯救元代宫廷藏传佛教史”在二院208室举行，清华大学中文系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段晴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廖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文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维忠参加并进行了交流讨论。

“未名学者”讲座第17期“儒学视域中的经典塑造——《诗经》中的心性教化”在二体地下B101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孟庆楠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常森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

19

2017-04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在二院109室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人事部部长刘波就文研院人员编制问题展开讨论。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111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吕博发表题为“阮孝绪及其所撰《七录序》——齐梁时代文化发展一瞥”的报告。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高曼士、许宏、孙秀林，访问学者李霖、童岭、袁一丹、仇鹿鸣、徐晓宏等参加会议并进行了交流讨论。

20

2017-04

“北大文研讲座”第31期第一场“古埃及秘传知识、等级与仪式”在二院208室召开。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贝恩斯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主持。

21

2017-04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福建“严复翰墨馆”馆长郑志宇一行就双方合办“严复与北大”专题展览相关事宜进行交流会晤。

文研院邀请学者茶叙在静园二院B105咖啡厅召开，邀请学者针对各自近期研究计划、研究心得体悟进行了交流互动。

24

2017-04

“北大文研讲座”第32期“再会马克思”在北京大学二体B102报告厅举行。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部文化与经济社会学教授默多克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5

2017-04

副教授赵斌主持。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二院 111 室召开，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一丹发表题为“沦陷下的‘表微’之学——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高曼士、许宏、孙秀林，及访问学者李霖、童岭、吕博、仇鹿鸣、徐晓宏等皆莅会并进行交流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 29 期“册封体制学说的再检讨”在二院 208 室举行。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甘怀真担任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张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安泰莅会并参与讨论。

“未名学者”讲座第 18 期“藏译佛殿集成史——文本、问题与方法”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 B101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萨尔吉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评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段晴主持。

26

2017-04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纪念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 100 周年专题展览“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及百余名中外学者、特邀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主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等致辞。

27

2017-04

“北大文研讲座”第 33 期“莫斯论文明——兼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启发”在二体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评议。

28

2017-04

“静园雅集”第 10 期“地图的发现”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著名媒体人、地图收藏及研究者杨浪担任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文研院邀请教授许宏担任评议。UCLA 中美合作考古班叶娃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 31 期第二场“托勒密时期埃及本土贵族的身份表达”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贝恩斯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拱玉书主持。